LEADERSHIP

A N D T H E

大国

领导力

RISE OF GREAT

P O W E R S

阎学通◎著 李佩芝◎译

版权信息

书名: 大国领导力

作者: 阎学通

ISBN: 978752172323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词

献给我的妻子李佩芝

前言

本书源于笔者2005年开始的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从那时起,本项研究取得了包括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在内的成果,如《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在此基础上,本书更进一步形成了理论体系,从而解释在现代全球体系中以及在古代国与国之间地理分离的情况下,崛起国为何能够在独立的国际系统中取代主导国。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给国际关系学者带来了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中国在21世纪初成功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如果没有在某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就不可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制度决定论把现代化、工业化或国家实力的高速增长归因于政府机构或政治制度。制度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实行民主选举制,也没有严格的权力制衡,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是落后的,因此中国在这方面不及美国。鉴于制度主义难以对当前的趋势做出恰当的解释,本书试图通过探索不同类型政治领导的重要性破解这个难题。

借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本书把世界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崛起国 比主导国更有能力进行改革。在国内方面,一国的领导类型可分为无 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而在国际领导类型方面则可分为王 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将政治领导类型视为一个独立变量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用同一个变量来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历史阶段,主导国会衰落,某个国家的崛起会成功,而其他国家的崛起会失败。国家领导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对改革和战略取向有着各自的态度。因此,主导国和崛起国的不同领导类型可以重塑国际格局、秩序、规范、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讨论建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使用的主要概念的定义。第二章将政治领导分为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两类,同时探讨领导类型与战略偏好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基于现实主义的假定,从对外战略、国际格局、国际规范、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引出4个推论。第四章着重论述国际格局变化和世界中心转移的问题。第五章描述国际领导类型与规范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导国建立或改革国际规范的途径。第六章探讨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新的国际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可能性。第七章通过区分体系构成要素变化与体系变化的不同,讨论国际体系的转型问题。第八章用古代邦交史和现代国际史来说明主导国领导变化与国际体系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九章是结论,对本书所建构的理论逻辑做出概括总结。

我感激多位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人。我的女儿阎瑾和我分享了她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从而排除了我对人类先天行为不同于后天行为的一些外行的误解。她在初稿的撰写过程中提供了语言表达方面的帮助。赵玙佳博士对稿件进行了校对。她的工作让本书能按期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交稿。我深深地感谢帕梅拉•洛德的帮助,她通篇编辑了书稿,提高了其流畅性。贺凯教授在语言学方面给了我慷慨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指定的两位匿名评审,感谢他们所做的关于发展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评语和建议以及他们在本书最后修订阶段中提出的有益意见。我也要感谢我的国际学生詹姆斯•安东

尼,他帮助我改进了一些段落。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编辑埃里克·克拉汉和本书编辑凯瑟琳·卡格夫。

我对张锋、孙学峰、周方银、徐进、杨倩茹、刘丰、高程、宋伟、赵可金、邢悦、漆海霞、马燕冰、聂文娟、曹玮、尹继武、杨原、陈玉聃、陈拯和王鹏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都对这项研究提出了意见,有的是私下与我交流的,有的是在2015年12月20日的研讨会上提出意见的。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清华大学上我课的学生提供了稳定的反馈来源。2011—2017年,我有幸教授一门基于该项研究的课程,这让我有机会在一群专心并富有挑战性的受众面前尝试表达我的思想。我还想向那些因我记不起而未提名的人表示我的感谢和歉意。

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佩芝,这本书是献给她的。她在过去36年里对我学术生涯的坚定支持始终不变。她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而且与我分享她对我的著作的想法。她及时的批评使我能够重新斟酌许多有缺陷的思路。

最后, 感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为本书提供的项目资助。

阎学通

2018年5月于清华园

^{1.}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4-20.

第一章 道义、权力和权威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

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话题。在16世纪 形成全球国家体系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先 后成为世界主导国。随着主导国的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偶尔会从一个 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试图追踪和解释为什么在 过去5个世纪里这些大国相继崛起和衰落。

对主导国的兴衰有诸多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研究可以说是保罗·肯尼迪的研究,他将霸权的衰落归因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导致世界中心的转移。当政策制定者界定的全球义务远远超过霸权的防御能力时,就会出现帝国的过度扩张。这此外,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经济上的不足是导致霸权衰落的原因。也就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以保持其主导国地位所需的经济成本超过其财政实力。这然而,理查德·内德·勒博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将霸权的衰落归咎于骄傲自大,认为"违背当时公认的道义规范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的地位、影响力甚至霸权"。

如上所述,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回答"为什么霸权会衰落"的问题,几乎不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崛起?"似乎有理由断言,世界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霸权衰落,同时也是因为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然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崛起的原因及其机制。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从道义现实主义违的角度解答崛起国何以成功这一问题,希望找出崛起国成功取代主导

国的潜在机制。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时,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反转,崛起国将成为新的主导国。换句话说,当崛起国的领导力比主导国和其同时代主要国家的领导力更强且更高效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权力将以崛起国胜过主导国的方式被重新划分。为了系统地探讨政治领导与国际权力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先来厘清道义、权力、实力和权威的概念,因为它们是政治领导的构成要素。区分清楚这些概念后,我们将分析道义对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影响。

- 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515.
- 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6.
- 3.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1.
- 4. 针对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决定论与现代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张峰于2012年将其称为"道义现实主义"。参见Zhang Fe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1 (2012): 95-96。

道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正如詹尼卡·布罗斯特罗姆所观察到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在理论建设中对"道义"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建构主义者通常认为道义会影响政治实体制定的规范,而道义通常又与制定者的身份和理念相关联。因此,他们认为规范和利益是相互建构的,也是互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道义的力量源于自身,所以要用道义论的方法解释学习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及群体性认识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英格兰学派分为社会连带主义者和多元主义者,尽管两者都从规范的角度研究道义,但他们对规范的功能看法不同。聚合主义者将规范视为自变量,而多元主义者则将规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和上述学派不同,现实主义者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道义,这一点经常被误解。

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误解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有关道义在国际事务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论述。摩根索说:"讨论国际道义时要严防两个极端,既不能过高估计伦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能过低估计它的影响,不能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行为也受物质权力之外其他因素的驱动。"建在他提出的六项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中,第四项和第五项是关于道义的。第四项原则表明,政治现实主义承认道义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实主义坚持国际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用来作为国家行为的依据,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来决定其是否适用。一个人可以说'为了正义,不惜毁灭世界',但国家无权以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名义说这样的话。"建第五项原则重申了这一点,指出:"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的道德法律当作普世的治理原则。"建

更糟糕的是,现实主义学说不仅被理想主义者、守法主义者、道德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误解,而且被某些现实主义理论家误解。为了发展一个非常规范的科学理论,肯尼思·华尔兹从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理论中排除了"道义"一词。继他的新现实主义之后,许多现实主义理论者都遵循他的理论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约翰·米尔斯海默是一位杰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他反对把道义纳入理论模型,他说:"应该强调的是,许多现实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道义偏好,并深受坚定的道义信念的驱使。然而,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规范的理论,它没有给出道义判断的标准,而只是试图解释世界

米尔斯海默拒绝将道义纳入现实主义的理论,源于摩根索说过"道义原则不能用于指导行为",但米尔斯海默忽略了摩根索此话的限定条件。摩根索说的是"抽象的普世性的道义原则不能用于指导行为"。 建关于此事,摩根索还说,如果"根据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以道义原则指导行动,是可以避免危险陷阱的。 建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用国家的具体行为与普世性道义准则进行比较,就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普世道义也在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改变。因此,本书将在既定国际体系的相关历史背景下对道义标准进行分析,通过检验下列关系着重分析国家的道义行为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 道义行为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遵守道义标准的程度不同,以及国际领导的类型对国际规范的影响。

道义现实主义中道义的工具性

本书的理论遵循古典现实主义的原则,从国际权力、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国家的道义行为。古典现实主义者卡尔说:"正如在国内一样,政府虽然需要权力作为其权威的基础,但也需要被统治者赞同的道义基础,因此国际秩序不能仅仅以权力为基础,道理很简单,人类终究会反抗赤裸裸的权力。"违同样地,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政策制定方面,道义与权力、实力和利益同等重要。现实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利益的方法有两种: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违本项研究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此本书中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和实例属于前一种。

关于道义问题, 许多理论家是从价值角度去认识的, 而道义现实 主义则从工具角度去认识。例如,布罗斯特罗姆把道义现实主义定义 说:"其实从工具角度认识道义是可能的。这意味着道义可以被看作 国家理性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一部分,这样做是有可能产生特殊结果 的。" 违勒博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 "伦理不但具有重要的工具作 进一步,认为获益于采用道义外交政策是战略偏好所致,而不是国家 利益的算计。道义现实主义强调战略偏好,这基于现实主义者的一个 共识,即国家利益是客观的,是由国家的物质实力决定的。因此,道 义的作用是在应该如何获得国家利益方面影响决策者, 而非在哪些是 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影响决策者。在具体情况下,决策者有时不得不决 定哪些利益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因此,政策制定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做 出战略决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利益的大小是由客观现实而不 是道义决定的。鉴于此,我将道义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理解大国行为 的方法,而道义在大国领导的战略偏好中则是一个要素。一些现实主 义理论忽略国家领导人的道义关注对决策的影响,这正是道义现实主 义与其他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

- 1. Jannika Brostrom, "Moral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wards a 'Moral Realist' Research Agend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 no. 4(2015):1626-27.
- 2. 汤普森和克林顿的评论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ed.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7th ed.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5), xxiii。
- 3. Brostrom, "Moral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26.
- 4.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16.
- 5.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248.
- 6. 同上,第12页。
- 7. 同上。
- 8. 同上,第267页。
- 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1994/1995): 48.
- 10. 《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凤凰大学问》,2013年9月 29 日 ,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anxuetong/#pageTop。
- 11.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235.
- 12.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Concepts, Theories, and Cases in Global Politics,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50.
- 13. Robert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O. Keo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 14.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2.
- 15. 同上。
- 16.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235.
- 17.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35.

- 18. Brostrom, "Moral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32.
- 19. 同上,第1626页。
- 20. 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16.

道义的层次与构成

为了避免任何语义上的争议,我们最好先对"道义"一词进行定义,因为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根据对同一个词的不同理解进行概念方面的辩论,加上人们对"道义"一词通常的理解会更加令人困惑。因此,在讨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之前,有必要澄清国际关系理论中"道义"一词的层次和构成。

以政府道义为标准

本书是依据国家行为讨论国家道义的,而不管这种行为背后决策者个人的动机或信仰是什么,因此讨论的标准绝非任意的。如果国家行为符合普世性的道义准则,它就是道义的,反之则是不道义的。也就是说,确定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道义,需要根据普世性的道义准则进行评估。评估一国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不涉及主观概念,只要求人们回答"是"或"否"。人们回答的结果决定了所评估的行为是否道义。回答"是"的比"否"的多,那么该行为就是道义的。而如果多数人的回答是"否",那么该行为就不是道义的。

判断决策者的行为是否道义,首先要确定用哪一套准则进行判断。这是由行为者的身份决定的。道义判断分为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这例如,一个普通公民有责任为他的家人提供医疗保险。如果他在自身责任之外帮助他人,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他不为外人提供医疗保险,也没人会指责他缺乏道义。这是因为公民个体的行为是根据个人层次的道义来判断的。然而,一国领导人不应只考虑其家庭的福利,因为人们期望领导人制定的政策能够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与此同时,没有人期望一国领导人关心他国国民的医保问题。

对二者期望不同的原因是,对一国领导人的判断是在政府层次进行的。第三个层次的判断适用于诸如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他的任务是为全球人民提供医疗保障,人们期望他能实施有益于所有人的医保政策,而不考虑国界或个别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位领导人的行为就是根据国际层次的道义来判断的。

为了避免纷争,同时因为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专门论述国际关系的理论,所以本书关于道义的讨论特指政府的道义,据此,领导行为将根据公认的有关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行为准则来判断。从古至今,西方人一直普遍认为公共道义与个人道义有区别。在尼布尔看来,个人道义行为与社会群体的道义行为是有区别的,个人道义伴随着个体自我的升华进入群体之后,在更高的层次重新表达这种利己主义。进这种公共道义与个人道义的混合会导致遵循哪些道义准则之争。这种差异可见于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中。一些人认为克林顿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弹劾的理由,另一些人则不认同这种看法。讨论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双方依据的道义准则不同。

谈到"政府道义",我们指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它要求"政府·······阐明其行为可预见的结果"。建南内尔·基奥恩说:"'责任伦理'是一种结果主义道义的形式,不同于康德的义务论方法。"建本书中,政府道义指的是诸如保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履行国际规范的义务、对盟国的战略可信性等概念。政府对它所代表的国家和它所治理的人民的责任是政府道义的核心。例如,许多美国人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无道义责任感更糟",因为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全球领导真空,让中国填补,破坏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战略关系,使美国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推动主要大国在华盛顿出售它们的股票。建

政府道义的普世性

道义除了有层次之分,还有内容之别。讨论道义时我们需要分清 普世道义和民族道义的不同。不同于民族道义(如美国的、中国的或 日本的政治文化准则),普世道义的内容是一个国际体系内所有成员 包括敌对国家的共同道义准则(如爱国、负责任和讲正义等)。因 此,本书用普世的道义准则来判断一国的领导是否讲道义。所以,这 里所说的政府道义是指政府行为遵循的普世道义准则。

由于国际道义是由人类逐渐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普世行为准则的基础都是相同的。例如,《日内瓦公约》在国际争端(即战争)中要讲关心/伤害的概念,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讲的是公平/欺骗的概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这样的战略联盟是以忠诚/背叛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的等级结构是以权威/破坏的概念为基础的,制定《巴黎协定》这种维护地球环境健康的活动是以神圣/堕落的概念为基础的。因为道义是建立在共同的道义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些国际道义准则问题上达成共识。虽然细节可能会

不断变化,但基本价值观不会改变。本书将这些普世的道义基础称为"普世道义"。

然而,在遵守普世性的政府道义问题上存在着性质的不同。国家能较容易地遵循和实践一些基本的道义准则,如与盟国保持良好关系、礼遇国家领导人、确保外交使节人身安全和偿还外债等。但是,一些要求较高的利他道义行为就较难实践,如持续提供外援。由于大多数国家都能遵循最容易的而非较难的道义准则,所以最容易遵守的道义准则比高要求的道义准则对国家行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以容易做到的普世性政府道义准则来判断一个政治领导是否道义,而不是用那些高要求的道义准则来判断。

- 1.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10-11.
- 2.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2), 272-74.
- 3.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0.
- 4. Nannerl O. Keohane, Thinking about Leader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3.
- 5. David E. Sanger and Jane Perlez, "Trump Hands the Chinese a Gift: The Chance f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1/us/politics/climate-accord-trump-"The china-global-leadership.html; David Frum, Death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Atlantic Daily, May 31.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5/mcmastercohn-trump/528609/; Javier C. Hernández, "Turning against Trump: How the Chinese Covered the Climate Pact Exit,"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4/world/asia/chinamedia-climatetrump.html; Joseph E. Stiglitz, "Trump's Rogue America," Project-Syndicate, June 2,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rogue-america-by-joseph-e--stiglitz-2017-06; 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2017): 1-7;

Philip Gordon, "A Vision of Trump at War: How the President Could Stumble into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2017):10-19.

- 6. (1) 关心/伤害:这个基础与我们的长期进化有关,因为哺乳动物具有同理心,能感觉到(并不喜欢)他人的痛苦。(2)公平/欺骗:这个基础与互利主义的进化过程有关。它产生了正义、权利和自治的理念。(3)忠诚/背叛:这个基础与人类悠久的历史有关,如部落能够组建可变换的联盟。它是爱国主义和为群体而自我牺牲的美德的基础。当人们认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即所有人的利益不可分割时,这种理念便油然而生。(4)权威/破坏:这个基础是由我们灵长类等级社会互动的历史塑造的。它奠定了领导和追随者的德行,包括顺从合法权威和尊重传统。(5)神圣/堕落:这个基础是由厌恶和受毒害的心理塑造的。它是宗教观念的基础,即努力以一种升华的、不那么世俗的和更高尚的方式生活。它支持一个普遍的认识,即身体是座寺庙,会被不道德的活动和污物亵渎(这种观念并非宗教传统所独有)。Jesse Graham, Jonathan Haidt, Sena Koleva, Matt Motyl, Ravi Iyer, Sean P. Wojcik, and Peter H. Ditto,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2012): 55-130, http://ssrn.com/abstract=2184440.
- 7. 同上。

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区别

在用英文撰写的国际关系著作中,"power"一词可以同时指社会影响力、物质实力和政治权威,但是这三者的功能差别很大。这是因为"power"在英语中有多种含义,包括控制、权威、能力、实力、力量和影响力。适于是,权力、实力和权威之间的互换性导致人们难以体会这三种领导力资源的功能差别。这也就导致人们无法理解道义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是什么。

权力与实力的区别

"balance of power"这一词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power"既可指"影响力",也可指"实力"。虽然"balance of power"是个常用词组,但国际关系学者对其是指"政治影响力的平衡"还是指"物质实力的平衡"没有达成共识。摩根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他用"power"和"elements of power"分别指代"权力"和"实力"。然而,这种区分仍然不清楚,因为"elements of power"既可以理解为"权力要素",也可以理解为"实力要素"。坦率地说,"power"一词在摩根索的书中仍然含义不清,时而指"影响力",时而指"实力",有时还有双重含义。吉尔平注意到"'power'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是最麻烦的问题之一"。他把"power"定义为"国家的实力",但他仍然不能避免有时用"power"一词表达"影响"的意思。比如他说:"经过一段时间,体系中各国'power'(此处意为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体系中的'power'(此处意为权力)进行重大的再分配。"

现。到2007年,威廉·沃尔福斯的著作还在关注"将作为资源的'power'(此处意为实力)和作为影响的'power'(此处意为权力)混为一谈的问题"。

这种含糊不清成为摩根索论述中的一个理论缺陷。在用"power" 界定国家利益时,他无法区分"power"是一种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power"是指对他国的影响,那么它就是一种国家利益,而如果"power"指的是能力,那么它就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正是由于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和实力的性质差别,摩根索也无法判断道义与"power"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为了避免因"power"含义模糊导致理论上的逻辑混乱,本书对"权力"和"实力"进行了严格区分。在讨论权力时,只指影响力,如警察的权力;在讨论实力时,则指力量,如运动员的竞争力。把权力与实力区分开来,可以避免那种一面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一面把权力视为国家利益的逻辑循环论证。把权力定义为影响力,则意味着权力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而且通常是最重要的利益。国家利益通常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权力通常被视为政治利益的一种,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把实力定义为力量时,实力就成为界定包括权力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基础。建一国在某种国家利益上权力的大小,是由该国与这一利益相关的实力的大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根据一国的综合实力来分析其整体战略利益是什么。

一国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物质实力,也包括非物质实力,特别是政治实力。与国家利益一样,综合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中,政治实力为操作性要素,而其他三项(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要素。也就是说,政治实力具有扩大和缩小其他三个要素作用的功能。如果政治实力下降至零,那么其他三个要素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CC

= (M+E+C) ×P,其中CC是综合实力,M是军事实力,E是经济实力,C 是文化实力,P是政治实力。国家的政治实力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的效率,而国家领导的效率则取决于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执行力度这两个主要因素。当改革方向正确时,执行力度越大,政治实力就越大,而当改革方向错误时,执行力度对政治实力产生负面影响。往改革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又是一个褒义词,含有变化的方向是道义的,与倒退是对立的。鉴于此,改革指的是向积极的方向变化,而朝坏的方向变化则是倒退。

上述公式中的"政治实力"不同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 概念。奈的"软实力"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 策。违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国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在不 使用硬实力的情况下影响他国的行为。然而,事实上,一国的吸引力 是以该国领导的行为而不是以该国文化和政治价值为基础的。因此, 我认为,政治领导力,而非政治价值,才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基于 此,我把政治价值和文化合为一个变量,把外交政策置于"政治实 力"之中,因为外交政策是由政治领导制定的。政治价值提供观念, 但它并不最终决定领导的决策。这一论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美国的 文化和政治价值保持不变,但是美国的软实力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半年 后就大幅下降了。奈可能也意识到了, "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 个概念不足以解释领导力的效率,因此他又创造了"巧实力"这个概 念。他说: "实际上,有效的领导力需要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 资源的主要能力,奈的巧实力实际上就是他的软实力三要素中的外交 政策。由于外交政策既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又被说成是巧实 力, 所以软实力和巧实力这两个概念部分重叠。"巧实力"这个概念 不但未能厘清不同类别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反而混淆了它们。事实 上,如果我们接受了奈的"巧实力"概念,就意味着"软实力"的吸 引力取决于领导对软实力的操作,而不是软实力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这两个构成要素。

从理论上区别权力与实力具有实用价值,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可以避免误判导致的灾难性政策的制定。按综合实力大小可将世界各国分为4个等级: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主导国的主要利益是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崛起国的利益在于扩大其国际权力,地区或次地区大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维护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不是获取世界霸权,小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则是生存。冷战后的历史表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随着它们的实力变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主要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把全球主导权作为其首要利益。苏联解体后的继任者俄罗斯已不具备苏联的实力,因此不再像苏联那样争夺全球霸权,而是把自己确定为欧亚连接部的地区大国。作为崛起国,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2年起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从经济发展转为民族复兴。(注

依据综合实力界定国家战略利益,就为国家利益设定了客观界限。明确的利益界限有助于避免政治家和学者产生不切实际的野心,并能使他们达成界定国家利益的共同标准。以小布什政府为例,"9·11事件"后,它将绝对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目标,并试图根除恐怖主义。由于这一目标远远超越了美国的实力,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未能实现目标。事实上,恐怖主义现在似乎已成为和入室抢劫或偷盗一样的常见现象,看不出未来会有什么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美国有减少外部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威胁的实力,却没有在全世界根除恐怖分子的实力。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超越了它自身的实力,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

同样地,低估敌对国家的实力会导致低估其国家利益的底线,这也会导致政策的失败。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海军力量大致相当,因此维持这些岛屿的现状,搁置争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然而,日本政府低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忽视了中国对这些岛屿主权的维护决心。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对这些岛屿实施国有化。这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国有化做法,于是采取和日本同样的强硬立场,宣布其领海基线和防空识别区,并对这一海域实行海上和空中巡航。这由于日本以其欲望而非军事实力界定其在钓鱼岛的利益,它做出了错误决策,从而也引发中日间的持久对抗。

权力与权威的区别

在英文写作中,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即使学者意识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语义区别,他们仍认为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例如,戴维·莱克说:"简单地说,权威就是合法的统治。也就是说,有权威的统治者有权命令下属采取某种行动,因为命令是合法的,被统治者有义务服从。这样,权威就是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违于是,许多人认为获得了权力就等于有了权威。在中文中,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权力"意味着合法的强制权或强制责任,而"权威"意味着威望或大众的信任。本书将用这两个术语的中文含义来解释政治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权力和权威都是领导者可以用来影响他人的资源,但它们发挥作用的途径不同。权力通过强制的方法迫使他人服从,而权威则靠他人对其信任来使他人追随。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和医生改变人们行为的不同方法就能充分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权力,后者代表权威。驾驶员服从警察,是因为警察有迫使他们服从的权力;患者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他们相信官方证书可证明医生有医学知识。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国际领导。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靠其绝对优

势的军事力量拥有了"世界警察"的主导权。与此同时,欧盟则靠其 21世纪初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比其他国际行为体取得的成就大,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威性领导。

提到领导的权威,许多学者自然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但本书中的权威概念与韦伯的有所不同。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理性型、传统型和魅力型。违关于魅力型领导的基础,他说:"人们服从他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信任,这样的人就称得上魅力型领导。"违这意味着人们服从他不是由于传统或地位的因素,而是因为人们相信他。韦伯认为,理性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分别依赖地位和传统,而不是他人对其领导的信心。然而,地位和传统实际上都是由权力决定的。本书中权威的概念与韦伯的魅力型权威相似,而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因为本书中所说的权威是由追随者对领导质量的信任决定的。

我们之所以把权力的来源定义为势力,把权威的来源定义为追随者的信心,是因为权威可以自动增强权力,而权力不能自动提高掌权者的权威。因此,领导国通过增强物质实力扩大其国际权力是可能的,但在其他国家不接受其领导的情况下,增强物质实力并不能自动树立起领导国的国际权威。领导国国际权威的提升势必会赢得更多的外部支持,这会自动增强该国的国际影响力或国际权力。

我们可就此从战略信誉的角度做进一步的阐述。战略信誉是国际权威的重要内容,通过道义行为获得。战略信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履行对他国尤其是对盟国的承诺。领导国保护盟国和惩罚国际秩序破坏者被视为道义行为。由此,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就意味着其言行一致。当盟国相信领导国的承诺时,就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当领导国的敌人相信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时,就不敢轻易挑战领导国。因此,战略信誉高的领导国享有较高的国际权威和更多赢得外交胜利的机会。外交胜利意味着获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和较大的国际权力。同理,缺乏战略信誉的国家往往会遭遇外交失败。例如,2018年3月,英国指

责俄罗斯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镇毒害了一名原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于是驱逐了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以进行报复。英国的这一政策得到了20多个国家的支持,包括18个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它们集体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建这一集体行动意味着英国的重大外交胜利和俄罗斯的失败。英国后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这起所谓的俄罗斯谋杀案,两名受害者经住院治疗后痊愈。建然而,这一事件说明缺乏战略信誉导致俄罗斯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害。

权威和权力的区别意味着,两个领导国即使拥有同样的国际权力,其中一国也可能比另一国享有更高的国际权威。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国的国际权力增加,其国际权威却下降。例如,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权力持续增加,但是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其国际权威随之急剧下降,特别是在这一借口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之后,美国的战略信誉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害。注

美国国际权威的衰落始于小布什而非特朗普。2008年金融危机使华尔街的欺诈行为曝光于世。于是,标准普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在2011年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降至AA+。建同年,在"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浪潮中,奥巴马抛弃了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盟友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建正如在美国出生的以色列记者赫布·凯农所说,"所有这些背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其盟友中的声誉,甚至连以色列都怀疑华盛顿的战略信誉了"。建这一系列行为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权威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了很多。

这些事件并非证明美国是唯一采取不负责任外交政策的领导国。 事实上,世界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印度 等,自二战结束以来都采取过自毁国际信誉的政策。其中有些国家可 能比美国更臭名昭著。在这里,我只是强调,不论国家有多强大,不道义的行为都会降低其国际权威。

- 1.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 G. and C. Merriam, 1977), 902.
- 2.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3.
- 3. William Wohlforth, "Unipolar Stability: The Rules of Power Analysi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2007, 44-48.
- 4.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50页。
- 5. 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模型中,综合实力(CC)为资源(R)和政治操作(P)的乘积,因此其公式为CC=R×P。政治操作包括作为领导力衡量标准的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力度,所以我们可将其分解为改革方向(α)和改革力度(β)。在该模型中 β 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α 是x,y平面上的矢量,因为只有两个方向:正确或错误。当改革方向正确时,该公式可简化为CC=(M+E+C)× β ,其中 β \in $(1, +\infty)$;当改革方向错误时,该公式也可简化为CC=(M+E+C)× β ,但其中 β \in (0, 1)。
- 6.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84.
- 7. Joseph S. Nye, The Power to L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x.
- 8.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no. 2 (Summer 2014): 166.
- 9. Alexander Neil, "Japan's Growing Concern over China's Naval Might," BBC News, May 28,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9918647.
- 10. Kiyoshi Takenaka, "Japan Buys Disputed Islands, China Sends Patrol Ships," Reuters, September 11, 20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china/japan-buys-disputed-islands-china-sends-patrol-shipsidUSBRE88A0GY20120911.
- 11. "China Ships in Disputed Waters: Japan Coast Guard," Press TV, August 2,2013,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3/08/02/316811/chinaships-in-disputed waters-japan.
- 12.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 13. Max Weber,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325-28.
- 14. 同上,第328页。
- 15. Angela Dewan, "These Are All the Countries That Are Expelling Russian Diplomats," CNN, March 28, 2018, 11:48 GMT, https://edition.cnn.com/2018/03/26/europe/full-list-of-russian-diplomats-expelled-over-s-intl/index.html.
- 16. Julia Jacobo, "Conditions of Ex-Russian Spy, Daughter Improving after They Were Poisoned with Nerve Agent," ABC NEWS, April 6, 2018, 3:59 p.m.,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conditions-russian-spy-daughterimproving-poisoned-nerve-agent/story?id=54288681.
- 17. Marjorie Cohn, "Iraq: A War of Aggression. No WMDs, No Connection to Al Qaeda," Global Research, March 19, 2013,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raqa-war-of-aggression-no-wmds-no-connection-to-al-qaeda/5327548.
- 18. "Angry Geithner Once Warned S&P about US Downgrade: Filing," Business News, January 22, 2014,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1/22/Angry-Geithner-Once-Warned-SaP-About-US-Downgrade.
- 19. Deborah Amos, "Arab Leaders Feel US Abandoned Egypt's Mubarak," NPR, February 9, 2011, http://www.npr.org/2011/02/09/133614346/Egypt-Arab-Leaders.
- 20. Herb Keinon, "Israeli Critics Open Up on US 'Abandonment' of Mubarak," Jerusalem Post, January 31, 2011, 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Israeli-critics-open-up-on-US-abandonment-of-Mubarak.

道义影响与战略信誉

前面的讨论分析了权力、实力和权威三种领导资源之间的差异。 由于它们各自性质不同,因此道义对它们的影响方式也不同。由于战略信誉是最低标准的国际道义,因此领导国要建立国际权威起码得有较高的战略信誉。一个没有基本战略信誉的强国是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权威的。

道义的不同影响方式

道义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权力,这是因为道义行为能增加一国作为领导国的合法性,从而赋予该国更大的影响力。道义也会影响一国的实力,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一国道义水平的高低先对其他事务产生影响,如改变其他行为体对该国支持或反对的立场,然后这些支持或反对逐渐增大,促使该国的实力发生改变。道义对一国的权力有直接的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该国的行为是否符合普世道义准则。

巴勒斯坦可作为一个说明道义行为增加一国权力而未增加其实力的例子。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定居点政策,其做法是符合国际道义准则的,因此巴勒斯坦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政治支持,1955—2013年联合国通过了77次决议谴责以色列。 建巴勒斯坦的道义行为提高了其主权要求的合法性,但没有增加其争取保护领土主权所需的实力。于是,巴勒斯坦的边界依旧很容易遭受以色列的侵蚀。

相反,日本是一个说明不道义行为降低了一国权力但不影响其实力的例子。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行为违背了国际道义准则,因此被认为是不道义的,激起了中国、韩国甚至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愤怒。迁然而,尽管安倍政府的不道义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弱化了日本的国际政治权力,但日本的实力仍然保持不变,而且日本2013年的国防支出还增加了3%。注

道义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取决于这种影响是扩大还是缩小国家实力。坚持国际道义准则能增强一国动员国内外支持的合法性,这就提高了国家的国际权力,从而可转化为其物质实力。这种现象在创建联盟体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1年1月,美国组建强大的多国部队拯救了被萨达姆吞并的科威特,并惩罚侵略者。注美国的决策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领土完整的原则,是符合国际道义标准的。美国赢得了34个盟友,有效扩大了其进行海湾战争的物质实力。

相反,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其行为按国际准则是不道义的。因此,它失去了国内外公众的支持,伊拉克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大幅扩大。这表明,即使不道义行为不损害一国的绝对实力,也会大大削弱其相对实力。

虽然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但道义对两者都有直接的影响。道义对领导国权威的正负影响方向,取决于该国行为是否符合普世的道义准则。道义的行为增强权威,不道义的行为削弱权威。权威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之上的,因此领导国的国际权力与其道义基础呈正相关关系。历史表明,享有较大权威的领导国比权威小的领导国更有可能长期维持其国际领导地位。对于美国国际领导力下降的问题,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史蒂文·梅茨说:"打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通过占据道义制高点,并操纵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薄弱之处是有可能挫败美国

的。·····不过,或许最大的教训就是道义上的含混不清可阻碍美国进步,甚至导致美国瘫痪。" ^注

战略信誉与以身作则

战略信誉属于最基本的国际道义,是领导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先决条件。道义的层次主要取决于遵守道义的代价。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如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就得付出较高的个人利益代价,如做慈善、助人为乐和奉行利他主义。因为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比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代价小,所以前者容易做到,能做到的人也就较多。于是,人们有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人,而不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低层次道义的人。战略信誉属于低层次道义,和不说谎在同一个层次,所以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就不可能得到他国的信任。因此,战略信誉成了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权威的先决条件。

战略信誉是跨越文明、文化、政治和政府这些界限的普世性道义准则。如同守信的人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一样,有信誉的国家也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对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来说,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意味着这个领导国是可靠的。一国通过诚信行为获得他国的战略信任,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权威,最终可转化为更大的权力。关于战略信誉对领导国的重要性,奈说:"软实力依赖信誉。当政府被认为是操纵舆论的且提供的信息被视为搞宣传时,信誉就毁掉了。"建

领导国战略信誉的高低与其国际地位及领导地位的持久性呈正相关关系。历史表明,缺乏战略信誉通常是国际领导地位短命的根本原因。荀子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违荀子的这段话是说,国际权威不能靠强加于他国,而是要他国自愿接受。

领导国的样板作用有助于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其领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身作则,而非发号施令,是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孔子有相关论述: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违换句话说,人们主动以某人为师,是因为他们把他当作榜样。一些早期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也主张以榜样的方式展示道义原则。例如,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美国不是把自己的治理原则强加于人,而是通过美国的样板吸引他人";托马斯·潘恩也说,"美国不应用枪炮和刀剑输出自己实践的那些普世原则,而应通过成功的榜样作用将自己展示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這

这些美国思想家之所以反对强行传播道义,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外交政策有战争危险。然而,这种思想对美国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几乎没有影响了。自威尔逊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思想家试图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改造全世界。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威尔逊式的民主人权观",自一战以来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建二战后,美国开始沉迷于以民主的名义发动战争。美国对非民主国家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这导致某些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把实践普世道义和武力输出民主混为一谈。建这也导致学界很少再区分国际权威和国际权力了。

^{1. &}quot;UN Resolutions Targeting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If Americans Knew, accessed February 15, 2017, http://ifamericaknew.org/stat/un.html.

^{2.} Takashi Oshima, "US Expresses Disappointment at Abe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Asahi Shimbun, December 27, 2013,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 news/politics/AJ201312270048.

^{3.} Bill Sweetman, "Japan Increases Defense Spending," Aviationweek, December 17, 2013, http://www.aviationweek.com/Article.aspx?id=/article-xml/awx_12_17_2013_p0-648057.xml.

^{4.} 王明修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91—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页。

- 5. Steven Metz, "How America's Enemies Might Assess U.S. Weaknesses—and Act on Them," World Politics Review, September 29, 2017,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3264/how-america-s-enemies-might-assessu-s-weaknesses-and-act-on-them.
- 6. Nye, Future of Power, 83.
- 7.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 页。
- 8. 崔高维校点:《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 9. 引自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276。
- 10. 同上。
- 11. William R. Castles,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Affairs 95, no.1 (1932): 47-49; Andrew J. Bacevich, "A Moral Foreign Policy? Get Serious," New Republic, July 21, 2010,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76408/afghanistan-war-obama-bacevich.

小结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直被误解为一种忽视道义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未忽略过道义的作用。本书继承古典现实主义对道义的关注,把崛起国的成功归因于该国有一个按普世道义准则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领导。道义判断可分为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政府道义是指政府对其统治下民众利益的责任感。因此,政府道义是一种公共道义,而非个人道义。国际道义是一种普世道义,而非民族性的道义。

本书将实力定义为力量,将权力定义为影响力。这种区分为划分政治领导的类型奠定了基础。政治领导是操作性因素,它决定着一国综合实力的升降。军事、经济、文化是综合实力的资源性要素,它们作用的大小随着政治领导这一操作性实力的效率大小而变化。操作性实力要素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执行力度。从政治角度来说,改革有讲道义的含义,改革和倒退是反义词。这意味着,如果一国的政治领导能够比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实施更多更彻底的改革,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能比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得快。

明确权力和权威的区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领导持续时间不同的原因。权力的基础是暴力,而权威的基础是他人的信任。两者都是领导力的资源,但后者使他人自愿接受领导,这是前者所做不到的。领导国有可能通过提高其国际权威提高其国际实力,但提高国际实力并不必然能提高其国际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具有较高权威的领导比权威低或无权威的领导能更长久地维护其领导地位。战略信誉是基础的国际道义,因而是建立国际权威的前提。

第二章 领导与战略偏好

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

荀子

- 1. 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xi.
- 2. 依据谁统治和他们为谁统治,亚里士多德列举了6类政府,并论证了这些政府的不同社会效果,相关介绍可参见 Edward Meredith Cope, An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s Rhetoric: With Analysis Notes and Appendices (London:MacMillan, 1867), 210-212。有关强调政治领导作用的现代西方政治著作可参见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杰克逊和卡尔·罗斯伯格研究了领导类型及其对非洲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 "在维护或毁坏如和平、秩序、稳定和非物质安全'政治物品'方面,非洲统治者及其他领导人的行为比任何其他因素起的作用都更重要。" 违这种强调领导力重要性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非洲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样地,本书对国家领导和世界领导的类型划分也并非仅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适用于所有现代领导国的。

政治领导的作用

如第一章所述,本书将政治实力定义为综合实力的操作性变量,将政治领导定义为政治实力的核心成分。因此,政治领导被视为决策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一国实力不变的情况下,该国的领导类型是有可能改变的,且随着领导类型的改变制定出不同的对外战略。例如,2013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新换届的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建这个事例符合玛格丽特•赫尔曼和乔•哈根的观点:"领导人划定一国国际利益和国内利益的界限。他们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做出预测、制定战略并敦促本国政府采取行动。……这种认知有助于政府把握应对国际事务的方向。"建

本书将决策视为集体行动,而不是某个领导者的个人行为,因此本书所说的政治领导是指决策的领导团队,而不仅仅是指最高领导人一人。无论决策的最高领导人有何不同,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一个团队

制定的,甚至独裁体制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团队成员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各自的领导团队仍有类型之别。这些领导团队在二战期间做出的战略决定都是基于团队成员磋商而形成的。

本书对政治领导的分类依据其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或信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 "检验一个政府是不是真的好政府,要看它有没有提供好的管理的能力和倾向。" 适本书创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从制定对外政策的角度对领导进行分类。决策团队成员意见不一是司空见惯的。当就某一问题达不成共识时,他们会推迟对该问题的决策,直到不得不做出决定或重新讨论时再议。赫尔曼和哈根注意到,学者发现过度的集体凝聚力会形成"集体思维",而且会导致权力大的决策者的政策偏好草率地成为决定。 适南内尔·基奥恩指出,"领导这一事务的特点就是最高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持续不断的不对称性,以至最高领导人对追随者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大于追随者对最高领导人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适在出现国际危机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最高领导人承担着维护政府政权的终极责任,危机时,最终决策的权威就会向最高领导人集中。由于领导团队

的政策通常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致,因此在做定性分析时,我们可以将最高领导人作为决策团队的代表。

国家领导的类型

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无政府状态,后者是等级制。因此,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属于两种不同的领导体系,其合法性的程序和领导权的执行都是不同的。国家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是由法律、传统或宗教确定的,而国际领导则是建立在物质实力和其他国家支持的基础上的。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指令在国内实施计划,但在国际事务中,则须通过谈判争取他国同意本国制定的战略,即使对盟国也不例外。例如,中国于2013年发布了全球"一带一路"计划。违当中国政府意识到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之间的差异时,便将该计划在国内称为"一带一路"战略,但在国际上称为"一带一路"倡议。违鉴于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的性质不同,本书将依据不同的变量对两者进行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领导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鉴于研究对象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大国的政治领导,本书以政治标准进行分类。一般来说,政治领导是指一个领导团队,这个团队有能力赢得其他个人、团队或组织的支持,以完成共同的任务。根据这一定义,政治领导的分类标准就应侧重于赢得社会支持的能力。由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等级制的,而后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赢得国内支持的逻辑与获得国际支持的逻辑不同。所以,本书从对外政策角度划分大国的内政领导类型,以领导团队的国家责任感和其履行职责的能力为标准,而对国际领导进行分类的标准则是领导国在特定国际体系中维护国际秩序及其战略信誉的责任感。

国家领导可分为4种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这4种类型是依据两个互动的自变量划分的:一是领导团队对本国国际地位的态度,二是领导团队对可能的政策结果的责任感。这两个自变量各有两个变量值。对国际地位的态度可分为"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两个变量值,领导责任感可分为"负责的"和"不负责的"两个变量值。表2-1展示了基于这两个变量的国家领导分类。

表2-1 国家领导的类型

	领导责任感	
对国际地位的态度	负责的	不负责的
维持现状	守成型	无为型
改变现状	进取型	争斗型

在表2-1中,在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方面,守成型领导和无为型领导都没有任何动机去扩大国家的国际权力,而进取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有强烈的意愿去扩大国家的国际权力。在负责的和不负责的方面,守成型领导和进取型领导能在失败面前承认错误,并愿意相应地调整其政策方向。相比之下,无为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不愿意承认错误,即使其政策已造成灾难,他们仍坚持原有政策而不接受任何批评。根据上述分类,我们可以找到与以下4种领导类型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

- (2) 守成型领导——经济决定论: 这是主张维持现有国际地位的国家领导,其采取的战略意在维护往届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视经济为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相同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一些其他方面是相互冲突的。当决策者无意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并信奉经济决定论时,他们会认为扩大经济收益是维持本国已有地位的最佳战略。和其他三类国家领导相比,此类国家领导最为常见。许多王朝末期的决策者都是这种类型的,因为他们没有获取比前人更大的国际权力的野心。
- (3) 进取型领导——政治决定论: 这是通过适宜的改革提高国际地位的国家领导。此类领导信奉政治决定论,认为政治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他们把国家的兴衰归因于国家的领导能力,而非其他因素。此类国家领导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不多见。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领导者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此类领导的代表。其在位期间(626—649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国际地位,史称"贞观之治"。《贞观政要》是本史书,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根据此书,在其执政的头18年里,他44次向大臣们承认错误,包括承认错误的军事决策,其中4次以书面方式承认错误。注
- (4) 争斗型领导——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具有以军事手段提高国际地位野心的国家领导。这类领导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包括军事侵略在内的暴力效率。许多政权的开国领导者都是这种类型的,例如秦朝(前221—前206年)的开国皇帝嬴政、大蒙古帝国(1206—1259年)的首任统治者成吉思汗,以及后金的第一位统治者努尔哈赤。后金是清朝(1636—1911年)的前身。他们通过战争建立了帝国,这使他们相信赢得更多战争的胜利是扩大其国际权力的唯一途径。

在和平时期,争斗型领导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削弱国家的国际地位。*追美国外交官菲利普•戈登描述了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后的头

- 1.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Prince, Autocrat, Prophet, Ty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3.
- 2.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165-70.
- 3. Margaret G. Hermann and Joe D. Hagan,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Leadership Matters," Foreign Policy, no.110, special ed. (Spring 1998): 126.
- 4.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10页。
- 5. Morris Fiorina and Kenneth Shepsle, "Form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in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ed. Bryan D. Jone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9), 36.
- 6.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eds.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414.
- 7. Hermann and Hagan,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128.
- 8. N. Keohane, Thinking about Leadership, 53.
- 9.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一版。
- 10. 新华社于2017年发布的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条目中的第102条是: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而使用"一带一路"倡议。参见《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版),第12页。
- 11. 漆海霞:《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见《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9年,第63页。
- 12. 同上,第65—67页。
- 13. 吴兢:《贞观政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 14. 全书*处代表此处与英文原版对比有删改。——编者注
- 15. Gordon, "Vision of Trump at War," 10.

16. Suzanne Mettler, "Democracy on the Brink: Protecting the Republic in Trump's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96, no.3 (May/June 2017): 121.

崛起国的领导与战略偏好

鉴于本书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崛起国何以取代主导国的,下面 所举的例子就仅限于崛起国不同类型领导的战略偏好,这样我们就能 控制国家综合实力这个变量,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展示国家领导的类型 对战略偏好的决定性作用。

无为型领导——回避冲突

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倾向于回避崛起困境。孙学峰将"崛起困境"定义为崛起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导致其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战略压力或他国的负面反应。 这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会本能地躲避危险和困难。荀子说: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这所以,崛起国领导回避崛起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是很自然的行为。以中国面临的困境之一为例,一面是中国几乎无法和平统一台湾,另一面是武力统一台湾有引发中美战争的危险。面对这一困境,无为型领导就会以维护台海和平共同发展的政策取代统一台湾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可以避免与台湾的军事靠山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往往缺乏能力抵御急剧增加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降低战略目标,崛起国就能大幅降低与主导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多数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可能会放弃崛起的目标,当然也就不制定崛起战略了。*无为型领导的策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这种策略对治国能力的要求不高;第二,这种策略效果明显,与主导国的紧张关系迅速缓解可证明策略的有效性。在中国,大多数赞

成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人都遵循老子名著《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哲学。注

守成型领导——运用经济影响

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倾向于运用经济或贸易影响他国的外交战略。他们信奉经济决定论,视经济为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将经济利益视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种类型的领导认为,崛起困境源于崛起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所以他们采取扩大与冲突国的经济关系来缓解国际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决定论学者最偏爱的战略是"以经促政"。注

虽然以经促政战略不能像回避冲突战略那样有效减小外部压力和降低战争风险,但它毕竟可以暂时缓解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的效果可以作为守成型领导智慧的证据,从而证明以经促政战略是正确的。不过,人们容易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政策都是促进经济合作的,其实也包括经济制裁政策。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会利用经济制裁对弱国施加影响,并通过解除制裁改善与弱国的关系。实际上,这种策略的效力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

进取型领导——扩大国际支持

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扩大国际支持的战略来实现崛起。领导意味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据此,领导国的追随者越多,其领导力就越大。几千年来,联盟一直是领导国获取国际支持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战略。当然,领导国也必须承担一定的战争风险和保护盟国的代价来维系同盟。为了扩大本国的国际权力,进取型领导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种战略必然会加剧崛起国

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为后者必然会试图遏制前者。面对这种冲突,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将寻求盟友,尤其是在周边国家,以获得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来对抗主导国的压制。

崛起国的一些邻国与主导国为敌,崛起国与这些国家结盟会带来与主导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因此采取这种战略的政府也常常是有着进取思维和能提供强有力领导的政府。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崛起国,但至今还没出现一个愿意采用联盟战略的决策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不结盟原则,结盟战略自冷战后在中国被妖魔化为"冷战思维"。注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学者主张恢复联盟战略。他们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坚定的战略支持者,并认为任何战略都不如结盟能更有效地帮助中国获取国际支持。注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得不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注

争斗型领导——军事扩张

崛起国的争斗型领导喜欢军事扩张。由于在强弱竞争中以暴力获 取利益的战略有利于强者,所以这类崛起国领导的军事扩张多是机会 主义行为,其军事攻击的对象是中小国家,包括主导国的盟友。这种 战略容易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盟友的军事冲突升级,并有引发大规模 战争的危险。

军事扩张的失败风险很高,因此争斗型领导经常缺乏恐惧战争的常人心理。自1989年以来,中国已有30余年没有卷入战争。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段时期中国没有孕育争斗型的领导。一些中国军官主张以军事扩张战略实现民族复兴,他们以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依据,论证军事扩张是攫取国际主导权的唯一路径。往上述分析将崛起国的4个典型的领导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争斗型)与4个典型的战略偏好(回避冲突、运用经济影响、扩大国际支持、军事扩张)

一一对应起来。鉴于本书将对国际地位的态度和领导责任感作为国家领导类型的分类标准,战略偏好的分类标准设定为不同战略对提高国家地位的不同效率。其实,大多数崛起国的领导和他们的战略偏好都是上述类型中任意两类的混合。归纳这些典型的领导类型,是为了预测不同领导类型的崛起国的战略偏好以及某一崛起国不同领导的不同战略偏好。

领导类型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领导类型都可能改变,而且可能在国家资源性实力要素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常见的领导类型转变机制有两种:政权更迭和领导自我转型。

政权更迭是指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变更,这种变更经常伴随着新领导机构的建立。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推翻了中国国民党政府。这是最常见的政权更迭机制。美国总统从民主党人转换为共和党人则是另一种政权更迭机制。这两种政权更迭机制都可能带来领导类型的改变。例如,克林顿于1993年取代老布什为美国总统,美国领导类型从守成型转变为进取型。2001年小布什维克林顿之后接任了总统,美国领导类型从进取型转变为争斗型。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领导类型从争斗型转变为守成型。特朗普在白宫就职后,建立了一个经济争斗型的政治领导,这是守成型和争斗型的混合体。

领导自我转型是指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更迭情况下的领导类型转变。若最高领导人执政的时间短,他所代表的领导不太可能发生类型变化。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执政,到统治后期,统治者的权力或已巩固或被削弱,此时领导类型就可能发生改变。长期执政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变得较冲动,风险意识差,不善于从他人角度看待事物。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的现代研究表明,权力会对大脑产生不利影响。基于

一个世纪以来对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研究,神经学家戴维·欧文和乔纳森·戴维森得出结论:"傲慢综合征是掌权者的一种心理失调,特别是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导人,他们长期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且很少受到约束。"进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和实地考察,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等人发现:"那些掌有大权的领导者有不受控制的行为倾向,其社会观念刻板,容易出错,他们的过激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渗入领导力变化的过程中。"进杰里米·霍格文等一些神经学家坚定地认为,权力与人的共鸣能力为负相关关系,权力大的人往往不愿意充分听取那些权力小的人的意见。进

我们还发现许多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观点在其政治生涯后期发生重大改变。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本是反犹太主义者,但在62岁时,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率先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多次发生战争,但在他71岁那年,他与巴勒斯坦达成了《奥斯陆协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在58岁时,他决定与*中国发展关系。最近的例子是普京,他在2000—2008年担任俄罗斯总统,2008—2012年担任俄罗斯总理,自2012年以来再次担任俄罗斯总统。执政以来,普京逐渐巩固了他在俄罗斯的个人权力。*他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从其第一任期的进取型转变为当前的争斗型。

确定崛起国领导的类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该国的战略偏好,而不是预测该战略能否使该国赢得与主导国的竞争。战略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战略而不是单方的战略。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结果是由多次决策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管子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进这是说在博弈中,一方做出正确战略决策,并不必然决定博弈的结果。威廉森•默里将战略定义为"一个在机会、不确定和模糊主导的世界里不断适应变化的条件与环境的过程"。进基于管子和默

里的洞见,笔者认为,在所有4种战略偏好中,进取型战略使一国崛起的机会最多,但并不能确保成功。

当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是相同的类型时,由于主导国具有资源实力优势,因此它比崛起国有更多的赢得竞争的机会。当两国的领导都是进取型时,主导国将有更多机会巩固甚至提高其国际领导地位,而崛起国实现其目标的机会则较少。获得国际权力与获得国家政权不同。荀子说:"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进受荀子的启发,笔者认为,影响崛起国与主导国战略竞争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它们在赢得国际支持方面的领导力的差别。换句话说,赢得较多国际支持的一方将是竞争的赢家。

^{1.} Sun Xuefeng, "Rethink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and China's Ris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no.1 (2013): 9-30; 孙 学峰: 《中国崛起困境: 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25页。

^{2.}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3页。

^{3.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 人 民 日 报 》 2008 年 3 月 5 日 , 第 1 版 , http://tw.people.com.cn/GB/26741/117733/index.html。

^{4.} 王红续:《新中国的外交价值取向与战略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 第6期,第11页。

^{5.} 谢旭人: 《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005/t20100523_319021.html。

^{6.} 何天天: 《尹卓: 军事集团化有冷战思维,结盟不符合中俄利益》,凤凰网,2014年5月19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519/40363851_0.shtml;《中俄不搞军事同盟原因复杂,港媒称曾有惨痛教训》,搜狐军事,2014年4月22日,http://mil.sohu.com/20140422/n398629853.shtml。

^{7.} 吴旭:《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10日;阎学通: 《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21页;Yan Xuetong,"The Shift of the World Cent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ange

-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0, no. 4 (2013): 232.
- 8. Liu Ruonan and Liu Feng, "Contending Ideas on China's Non-alliance Strateg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2 (2017): 156-58.
- 9. 赵丕:《关于新军事变革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战略研究》2013年第2期,第 11页;张啸天:《大国权力转移的八种方式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国防参考》2015年第19—20期,第 54—57页;马德宝、刘华清:《中国强军之路具有世界意义》,《国防参考》2017年第21期,第32—34页。
- 10. David Owen and Jonathan Davidson, "Hubris Syndrome: An Acquired Personality Disorder? A Study of US Presidents and UK Prime Ministers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Brain: A Journal of Neurology, February 12, 2009, 2.
- 11. Dacher Keltner, Cameron Andersona, and Deborah H. Gruenfeld,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no. 2 (2003): 279.
- 12. Jeremy Hogeveen, Sukhvinder S. Obhi, and Michael Inzlicht, "Power Changes How the Brain Responds to Oth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 no. 2 (2014): 759-60.
- 13.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 14.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 15.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366页。

战略信誉与国际领导

本书将领导国的核心道义定义为在国内实行负责任且仁慈的治理,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战略信誉。领导国提供何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取决于它是否重视其国际战略信誉。据此,国际领导可以分为4种类型: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这4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其领导权时有着不同的偏好。

国际战略信誉

国家领导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际领导则与之不同,主要建立在国家实力和战略信誉的基础之上。国家实力是行为体实行国际领导的工具,战略信誉使行为体具有合法性,从而使其能够吸引到国际追随者。因此,良好的国际战略信誉有助于强国提供的领导成为人们欣然接受的国际领导。根据第一章中有关权力与权威的区别,国际领导的权威是以良好的战略信誉而不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因此,领导国只有保持良好的战略信誉才能享有崇高的国际权威。

国际战略信誉既体现在国际领导的合法性上,又体现在该领导的政治实力上。良好的国际信誉通常会形成更大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作为综合实力的操作性要素,可成倍增强领导国资源性实力的作用。因此,良好的信誉能极大地增强崛起国的综合实力。这个逻辑意味着,即使崛起国的资源性实力远小于主导国,如果它具有良好的战略信誉,它仍能缩小与主导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同理,主导国通过提高自身的战略信誉也能够增强其对崛起国的优势。

国际战略信誉转化为综合实力的增强,这种转化机制是通过盟国的支持实现的。通过提高其战略信誉,同盟的领导国能够获得更多的盟友和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拥有更多的盟友可使同盟的领导国利用更多的物质资源来处理国际困难,此外还减少了竞争对手可利用的国际资源。这样的过程将逐渐改变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当以崛起国为首的同盟在实力方面压倒了主导国领导的同盟时,主导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崛起国取代它的地位。相反,主导国通过增加盟友则能制约崛起国扩大国际支持,从而巩固自己所领导的同盟。这就是为什么盟国的数量经常被用来作为国际战略信誉和政治声誉的关键衡量指标。通过结盟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同盟的领导国建立国际战略信誉的主要方法。

国际领导类型

二战结束时,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际领袖有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和杜鲁门。仔细想想,他们似乎都是不同凡响的。人们认为21世纪没有什么国际领袖,因为国际领导人面临的体系性困境不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国际领导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国际领导人需要决定如何通过参与建立区域和全球机制规划国际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务,以及制定规则和规范,以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未来。

国际领导需要国际追随者,也就是说,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然而,追随不同类型领导的原因不同。因此,国际领导的类型与特定领导所具有的权威水平密切相关。由于战略信誉和一致的行为准则是建立国际权威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变量对国际领导进行分类。战略信誉有两个变量值:守信誉和不守信誉。行为准则的两个变量值是:标准一致和双重标准。这样,我们就有4种类型的国际领导: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见表2—2)。这种分类受到荀子对统治者分类的启发,他将统治者分为三种类型。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进他将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方法也分为三种:"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注本节划分的4种类型实际上是在荀子所说的"霸"和"强"之间加上了昏庸型领导作为一种新的国际领导类型。

表2-2 国际领导的类型

行为准则 ——	战略信誉	
	守信誉	不守信誉
标准一致	王道型	强权型
双重标准	霸权型	昏庸型

(1) 王道型领导:守信誉并政策标准一致的是王道型国际领导。这种国际领导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规范相符且具有战略信誉。在国际体系中,领导国如果实行道义原则,就会被视为王道型领导。也就是说,它以三种方式维护良好的战略信誉和国际秩序:一是按照国际规范行事,以身作则地为其他国家树立良好榜样;二是奖励遵守规范的国家,以推行有益的国际规范;三是惩治违反国际规范的国家,以维护国际规范。违管子对王道型领导和霸权型领导进行了区分,他说:"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违由于王道型领导能够纠正那些扰乱国际秩序的国家,因此以王道型领导为基础的秩序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体系中,西周被公认为一种王道的典型,它持久而稳定地维护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

(2) **霸权型领导**: 守信誉但采取双重标准原则的属于霸权型国际领导。霸权型领导制定对外政策时采取双重标准: 对盟友信守承诺,提供援助,因此值得信任; 对其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因此霸权国的敌手从不期盼霸权国遵守国际规范。在战略信誉和道义行为方面,霸权型领导远不及王道型领导,但比昏庸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好得多。霸权型领导在同盟内部保持战略信誉,但以丛林法则来处理与非盟国的关系。这种做法有助于维护由霸权国领导的同盟内部团结和稳定,但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起着破坏作用。因此,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昏庸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主导的国际秩序相比是相对和平

的,但远不如由王道型领导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平。注齐国是春秋时期的霸权国,它于公元前651年建立起当时华夏体系里最大的同盟(7个诸侯国参加)。在齐桓公的统治下,齐国展示了霸权型领导的行为和战略。注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政府被视为霸权型领导的现代代表。

(3)**昏庸型领导**:既不守信誉又采取双重标准的属于昏庸型国际领导。这种类型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其外交政策原则是随波逐流地附和其他大国。这是一种欺软怕硬的领导,因此在战略上毫不可信。昏庸型领导不承担维护国际规范的责任,其行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和混乱的。由于昏庸型领导的政策不一致,朝令夕改,所以在盟国中没有信誉。这种领导的不可靠性使其所在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倾向于靠自身军事力量维持生存。因此,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成为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781—前771年在位的周幽王是典型的昏庸型领导。为了取悦他的宠妃褒姒,他点烽火台诱骗盟国派兵救援。此后,当敌国真的入侵他的国家时,他的盟友由于被欺骗过,所以都不派兵来救援了。建由于昏庸型领导主导的国际体系没有秩序,所以这种类型的领导是注定要被摧毁的。一些美国学者把特朗普政府视为该类型的领导。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协定》后不久,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的流氓美国》的文章。 注 普利策奖得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竟然称特朗普为中国的"特工"。 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开始蓄意破坏它所创造的秩序。一个敌意的修正主义强权的确已经到场,它就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那里是自由世界跳动的心脏。" 注

(4) 强权型领导:不守信誉但行为标准一致的是强权型国际领导。杰克逊和罗斯伯格说:"强权国家不仅没有法律,而且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其结果是统治者及其代表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建强权型领导按照强权政治的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因此盟友和敌人都不信任它。昏庸型领导和强权型领导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害怕强者,而后者不怕。当领导国的领导地位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恐惧之上时,这种领导国就属于强权型领导,它在遵守国际规范方面没有战略信誉。强权领导的不道义行为强化无序体系的丛林法则,同时破坏其他国家实践的道义原则。当强权型国家成为主导国时,它率先破坏国际道义规则,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于是,道义规范消亡而非扩展,这种由强权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建

以秦朝为例,它是第一个中华帝国,因其暴政而臭名昭彰。公元前221年,秦朝创建了一个由其领导的政治秩序,这个秩序只持续了14年。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秦朝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最爱引用的实例,用以说明为何单靠物质实力不足以维持政治秩序。在现代史上,二战期间由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纳粹政府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被人们普遍视为典型的强权型领导。

虽然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各有4个类型,但它们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这两种领导的性质是不同的。国家领导只为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因此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国际领导既对本国也对国际体系的秩序负责。由于这一根本性差异,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领

导国可能分别有不同的战略偏好。有一种误解,以为能够增强本国综合实力的国家领导必然是好的国际领导。从理论上来说,无为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不如守成型领导和进取型领导那么重视战略信誉,但这并不能确保后两者就是王道型领导。作为王道型国际领导,它得将国际战略信誉推进为国际规范,这就要求国际领导以战略信誉为手段提高其国际权威。

- 1. James M. Goldgeier, "The U.S. Decision to Enlarge NATO: How, When, Why, and What Next," Brookings Review 17, no. 3 (1999):18-21.
- 2. Frum, "The Death Knell fo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 3. "Merkel: 'Europe' s Fate in Its Own Hands,' "Shanghaidaily.com, May 29,2017, http://www.shanghaidaily.com/world/Merkel-Europes-fate-in-its-ownhands/shdaily.shtml.
- 4.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03页。
- 5. 同上,第146页。
- 6.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2011): 241 n 244, n 245.
- 7.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第268页。
- 8. [英] 理雅各英译,杨伯峻今译:《论语·尧曰》,见《四书》,湖南出版社, 1992年,第255页。
- 9.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245.
- 10. 公元前651年,齐国在葵丘与鲁、宋、郑、卫等国的国君举行了会盟,拥有最高合 法权威的周襄王也派代表出席了会盟。该同盟成员国同意永不互相攻击,并在受到攻击 时相互帮助。齐桓公因此成为这些弱国的霸主。
- 11.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et Reflexions Diverses, ed. Jean Lafond, 2nd ed. (Paris: Gallimard, 1976), Réflexion 218, 79, 引自 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17。
- 12.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0—851页。
- 13. Stiglitz, "Trump's Rogue America."
- 14. Thomas L. Friedman, "Trump Is a Chinese 'Agent'," Gulfnews, October 28, 2017, http://gulfnews.com/opinion/thinkers/trump-is-a-chineseagent-1.2003547.

- 15. Ikenberry,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2.
- 16. Jackson and Rosberg, 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80.
- 17.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244.

王道原则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国际领导的类型及其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4种国际领导中,王道型领导和霸权型领导有能力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而昏庸型领导和强权型领导则不能。不过,王道型领导和霸权型领导在提供国际领导的方法上有很大区别。本节将厘清这两种国际领导原则的差异,并讨论如何以王道原则塑造当今的国际秩序。实行王道原则最重要的前提在于领导国的国内意识形态与其在国际上倡导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霸与王的区别

由于"霸权"在现代具有消极的含义,主张霸权原则的人试图找个好听一点儿的词来描述其内涵。中国主张霸权原则的人用"雄才大略"取代"霸权",而美国主张霸权原则的人用"仁慈的霸权"来区

中国古代思想家并没有赋予霸权更好听的措辞,而是根据其统治原则来区分国际领导的类型。例如,管子根据善治的等级对国际领导进行分类,降级排序为:皇、帝、王、霸。进管子认为,"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迁荀子认为,王与霸的区别不在于权力,而在于道义。他区分两者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迁孟子也做出过类似的区分,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迁孟子可能是第一个从负面定义霸权的哲学家,但他对霸权的定义与"仁慈的霸权"的内涵最接近。

王道领导的可能性

的确,王道原则在当今时代成为新国际领导理念的机会不多,当 代世界毕竟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古代的国际体系非常不同。不过,中国 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未来世界的领导可能需要将王道的价值 观用于现实世界。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优势给新国际领导采用王道原则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但仅此还不够。传统意义上,王道原则还要求统治者的内部治理与其外交行为是一致的,即"内圣外王"(国内治理遵循圣人的原则,而对外交往遵循王道原则)。 进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说,内圣外王要求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以人为本。故此,增强王道型领导影响的重要前提是领导国在国内和国外奉行一致的价值观。例如,自由主义在冷战后成为当代主流价值观,这与美国政府实行的国内政策密切相关。这个论点并不否认欧洲政府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是强调领导国的国内政策在维护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中具有关键作用。2017年美

尽管中国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最强大的崛起国,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奉行王道原则。*不过,中国的"千禧一代"与其父辈的政治观念不同,他们政治上思想开放,*这源于他们的现代教育背景和国际经验,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他们的父母处于错误认识外部世界的环境里,而这一代年轻人则不同,从小学习外语,还了解不同的文化。因此,这代人中产生的领导人,可以很容易地理解采取王道原则能让领导国有更多机会保持长期主导地位的逻辑。在任何国际体系中,领导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在实力和相互依存方面都是不对称的,王道原则使中小国家可通过与领导国结盟获得长期安全的好处,这是一种不对等的需求交换。是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对一种新型领导国的国际支持将会更加稳定,也会更加持久。

^{1.}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3, 47-51, 86-88.

^{2.} 同上,第50—51页,第88—89页。

^{3.} 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no.111 (Summer 1998): 26; Eric Koo Peng Kuan, "The US as Benevolent Hegemon," Asia Times, September 23,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I23Aa01.html.

^{4.}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第183页。

^{5.} 同上。

^{6.}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146页。

^{7.} 王常则译注:《孟子·公孙丑上》,见《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 45页。

^{8.} 石永之:《内圣外王新诠》,《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第88—89页。

^{9.} Stephen M. Walt,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June 26,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

- collapse-of-the-liberal 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
- 10. Charles W. Kegley and Gregory Raymond, "Networks of Intrigue? Realpolitik,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Reconstructing Realpolitik, ed. Frank Whelon Wayman and Paul Francis Dieh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185-98.

小结

即使在国力和外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也会采取不同的战略。因此,领导国的政治领导是其综合实力、国际权力和国际权威变化的核心要素。由于国家领导建立在等级权力的基础上,因此决策者能用制度的力量贯彻他们的决定。相反,国际领导是在无政府体系中形成的,因此领导国必须通过与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合作或强制对方的方法实施其战略。从类型上来说,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属于不同的范畴。国家领导可分为4种: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国际领导也可分为4种: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

由于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争斗型的领导分别信奉道家学说、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他们的战略偏好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应对崛起困境的问题上,崛起国的4种领导很可能分别选择回避冲突、运用经济影响、扩大国际支持和军事扩张的战略。4种国际领导通常采用不同的外交战略来维持国际秩序:王道型领导依据国际道义规范制定政策,霸权型领导实行双重标准原则,昏庸型领导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强权型领导依据强权政治原则行事。

然而,4种国家领导的类型和4种国际领导的类型并非一一对应。 能够增强领导国实力的国家领导并不一定是会提供王道的国际领导, 也不一定能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同理,削弱本国国际地位的政府也 不必然是强权型的国际领导。本书中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的分类都是 理想的类型。通过比较这些理想的领导类型,我们可以确定某一类型 领导的主要特点,并预测该类型领导的外交战略偏好及其对国际规范 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国家领导或国际领导是两种类型的混 合体,因此对外交政策的分析应仅以理想的领导类型为参照,而不应 受其限制。 在全球化时代,王道原则具有成为国际领导行为准则的优势。王 道原则可以将某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纳入其核心价值观,从而使王道型 领导成为对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有利的领导,这与传统的霸权和美国 的仁慈霸权不同。王道领导采取的道义原则可增强其追随者对王道领 导的信心。然而,要使王道原则成为为人所普遍接受的规范,领导国 的国内意识形态与它在国际上提倡的政治价值观必须是一致的*。

第三章 关于国际变化的推论

满招损, 谦受益, 时乃天道。

大禹

基于第一章中关于道义、实力、权力和权威的定义,以及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领导类型的作用,本章将阐述一个关于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化的新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该理论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摩根索说:"政治规律的根源来自人类的本性。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试图发现这些规律起,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过。"违因此,如果公元前7世纪霸权国齐国的宰相管子能活到现在,他将完全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斗争。本章的4个推论是基于现实主义假定推导出来的,这4个推论显示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且是演绎逻辑的结论。下文将具体讨论政治领导、国际格局、外交战略、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1.}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4.

国家领导与权力格局的变化

历史曾多次见证这样的情景,主导国几乎在所有可见的领域包括 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技术、教育、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比正在崛起的 国家更为先进,但崛起国戏剧性地缩小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这 种现象为本节提供的启示是,权力从主导国向崛起国转移的原因在于 崛起国领导力的提高和主导国领导力的下降。因此,第一个推论的逻 辑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导致大国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持续几十年 就会导致整个国际格局发生变化。

推论1: 国家领导力的提高和下降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 最终导致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

现实主义假定实力不平衡增长是自然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自然增长是不平衡的,有无数的变量影响个体的增长,其中许多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从统计学上来说,完全一样的增长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会有不同的指纹。国家实力的增长也受不平衡增长规律的支配。随着各国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它们之间的实力结构逐渐变得有利于那些实力增长最快的国家,于是导致世界权力的再分配,有时世界权力从主导国转向崛起国。基于这样的假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推论1。首先,领导是如何影响实力增长的?其次,领导类型对权力分配的变化有何影响?

(1) 国家领导决定国家实力的增长或下降。

在第一章中,我们确立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公式: CC=(M+E+C) ×P。在分解公式中的政治实力时,我们侧重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即政 治领导。之所以特别关注政治领导,是因为它是军事、经济和文化资 源的运用者,这些资源只有在被政府运用时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政治领导作为一种操作性要素,对增强、维持或削弱国家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不仅能够加速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增长,而且能增强这些资源的作用。此外,强有力的领导还能赢得国内外的支持,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并扩大其国际权力。

根据上述逻辑,我们可进一步解释国家实力不平衡增长规律的机制。由于国家领导是资源要素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各国的国家领导效率不同,可从两个方面导致国家实力不平衡增长:一是不同的国家领导效率导致资源性要素以不同的速率增加,二是不同的国家领导效率使相同规模的资源性要素起到不同的实力作用。正如管子所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注

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2017年美国的迅速衰退都支持了国家领导比综合实力的资源性要素更重要的观点。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当苏联政府于1991年年底宣布苏联解体时,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比大多数国家都强大得多。它的解体是国家领导效率降为零的结果,所有资源性实力要素都不再起任何作用。第二个例子,目前的美国政府没有动员国内或国际支持其政策的能力。领导能力的下降削弱了美国综合实力,包括其国际影响力。"据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在37个国家做的一项新调查,相信特朗普总统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人仅为中位数的22%。这与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几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照,当时中位数的64%的人表示对特朗普的前任有信心,相信奥巴马能领导美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追盖洛普民意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2017年年底,在134个国家接受采访的人中,只有30%的人支持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领导,这和奥巴马执政最后一年相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追

(2) 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不一样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

国际格局是指由大国的相对实力及相互战略关系决定的权力结构。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三种典型的国际格局分别为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和多极格局。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格局都是这三种典型格局中任意两种的混合体。由于国际格局是由大国的实力结构和它们的战略关系构成的,因此国际格局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大国实力的兴衰,而且受它们同盟数量变化的影响。注

例如,冷战后国际格局从两极格局向单极格局转变就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一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扩大(国家实力的变化); 二是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瓦解,俄罗斯失去了盟友(同盟数量减少)。从各自发挥同盟领导作用的角度来说,美国在冷战时期做得比苏联好得多。苏联对华约的领导是残酷的,曾多次军事入侵盟国,改变它们的政府,这削弱了苏联的盟国对其忠诚的持久性和可靠性。而同期,美国没有滥用对北约的领导权,也未对盟友使用武力,这有助于巩固北约的集体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苏联不复存在了。两极格局由此变成了单极格局。

华约和北约的案例说明,超级大国提供的国际领导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良好战略信誉的领导国能够建立并扩大牢固的同盟,而战略信誉不佳的国家则相反。春秋时期晋国大臣郤缺曾就领导国的战略信誉与它所领导的同盟的可靠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评论。他说: "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 注

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

大国实力结构是国际格局的核心。这意味着当大国间的实力差距 不发生显著变化时,多数情况下国际格局不会改变。一般情况下,领 导国实力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变化。例如,只要苏联 没有解体,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就无法改变。同样地,只要中国不大幅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冷战后的单极格局就将持续下去。由于权力分配的变化主要是由大国实力的增强或减弱导致的,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实力的级别,以判断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实力大小将国家划分为如下4个等级: 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主导国和崛起国实力的增强或减弱对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的国际格局变化是有影响的,而地区大国和小国的实力变化则没有那样的作用。以下分类使我们能够依据一国的国际地位对其综合实力进行评估,并根据其实力确定其战略利益。各等级国家的特征如下。

- (2) 崛起国:这些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能达到缩小与主导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程度,使它们能够夺走主导国的部分权力。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个崛起国,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和80年代的日本都是崛起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典型的崛起国。崛起国的实力能超过主导国,成为超级大国,美国是这种例子。崛起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但未能超越主导国,苏联是这种例子。崛起国能缩小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但未能达到超级大国的水平,冷战时期的日本就是这种情况。在21世纪的头17年,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大大缩

小。不过,自2017年以来,美国战略失误对缩小中美实力差距所起的作用大于中国实力增长的作用。

- (3) 地区大国:这些国家在地区或次地区事务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它们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的某一局部地区没有竞争者,但在整个国际系统层面仍受主导国的影响。现在,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属于地区大国,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属于次地区大国。尽管某些现代地区大国和古代的主导国所影响的地域范围相似,但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古代的地域国际体系是相互分离的。与古代地区大国不同,现代地区大国对其所在国际体系不产生整体性影响。例如,印度是现代世界国际体系中的南亚地区大国,而古代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是该地区体系的主导国,因为该地区是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在当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几乎没有联系。另一个例子是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使英国脱离了欧盟,虽然这冲击了整个欧洲政治,但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几乎没有影响。注
- (4)**小国:**实力太弱以至在地区或次地区体系中都发挥不了任何领导作用的国家。

特别要注意,所有上述定义都是基于在同一国际体系或者在同一地区或次地区体系中各国相对实力的比较。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绝对实力基本相等,但由于两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同,前者没有后者的那种地区影响力。将加拿大归类为小国是因为它的邻国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它是美国的一个弱邻国,而澳大利亚被归类为大洋洲的地区大国,因为它的实力远远大于大洋洲的所有其他国家。

基于上述对国家实力级别的定义,主导国和崛起国在一个独立的 国际体系中争取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格局,地区大国密切关注其所在 地区的权力格局变化,小国则无意重塑任何层面的国际格局。

- 1.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第270页。
- 2. Richard Wike, Bruce Stokes, Jacob Poushter, and Janell Fetterolf, U.S. Image Suffers as Publics around World Question Trump's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6, 2017), 3.
- 3. Peter Baker, "Souring World Views of Trump Open Doors for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8, http://www.wral.com/souringworld-views-of-trump-open-doors-for-china-and-russia/17268302/.
- 4. 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
- 5.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367页。
- 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0), 239.
- 7. 春秋五霸是指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在不同时期, 这五位霸主分别根据与周朝的共同政治和军事利益利用周朝遗族。根据《荀子·王霸》 中的记载,这五位霸主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 8. "Brexit Impact on China Market Limited: Economists," Xinhua News, June 24,2016,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6/24/c 135464355.htm.

国家实力、领导和战略偏好

本书提供一种二元论理论,既强调政治领导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也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战略包括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国家实 力决定国家的客观利益,即国家的战略目标,而国家领导决定实现国 家利益的方法。故此,外交战略是由这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一方 面,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要求各国决策者根据各国实力审慎地界定本 国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创造独特战略以实 现国家利益的空间(见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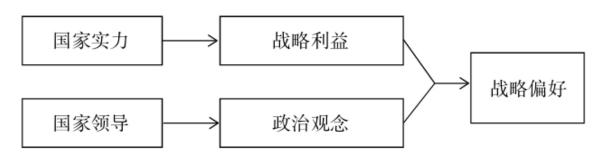


图3-1 国家实力和国家领导对战略偏好的共同影响

本节得出推论2,它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与不同战略偏好联系在一起。从方法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使体系层面和决策层面的理论联系起来,也从理论上体现了资源性实力和操作性实力的客观存在。 注这一推论可以解释为何成功崛起的国家通常都创造新战略,而不是照搬历史上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战略。

推论2: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原则都是自保,但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不同的

国家追求和保护安全利益靠自身实力,其中包括制定合理外交战略的能力。"自保"原则反映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推论2进行讨论:在同一国际体系中,不同的国家领导会采取不同的战略;不同的国际领导会带来不同的国际秩序。

(1) 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实现战略利益。

国家实力是界定国家战略利益的基础,也限制了战略选择。华尔兹说: "无政府体系的单位无法从功能上区分,那么这种秩序的单位主要靠各自执行相似任务的实力大小来区分。" 建因为获取不同的利益需要不同的实力,所以,与大国相比,较小的国家通常将其战略利益定得较低。故此,它们采取的安全战略也不同于大国。以美国、日本和梵蒂冈为例: 美国不仅要保护本国安全,而且要保护其盟友的安全;日本不仅不需要保护他国的安全,而且将维护自身安全的部分责任委托给了美国; 梵蒂冈则将自身安全全部委托给意大利来保护。在无政府体系中,较小国家将保护本国安全的责任委托给较强大国家或同盟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它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确保它们的生存。建

除了国家实力不同,国家领导类型不同也是各国采取不同战略的原因。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即实力相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安全战略。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中等国家,如日本、联邦德国、印度和埃及,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择一方与其结盟,以保护自身安全,但同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就是个例外,它采取了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这一事实表明,政治领导对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至少与国家实力同等重要。当国家实力不变时,政治领导就成了决定性因素。

(2) 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倡导不同的国际秩序。

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崛起国和主导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战争解决它们之间的权力争夺。谢泼德•克拉夫说:"至少在我们所经

历的所有事件中······在文明最发达的文化实体处于经济衰退期时,它们总是遭受到文明相对落后但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文化实体的攻击。" 這吉尔平说: "随着相对实力的增加,崛起国试图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最重要的是重新划分领土。应对这种挑战,主导国会调整其政策以恢复体系的平衡。历史表明,如果主导国的政策失败,体系的不平衡将由战争来解决。" 追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大国都必然会采取进攻性战略来维持它们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他说: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世界政治中很少有维持现状的大国,因为国际体系使国家产生强大的动机利用一切机会以对手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国家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国家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追格雷厄姆•艾利森称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战争是"修昔底德陷阱"。 建上述这些说法意味着只有一种战略可以用来处理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冲突——战争。

推论2挑战这一逻辑,认为大国获得或保持其主导地位的战略不止一种,正如生态系统中的主导物种可凭多种多样的策略获得数量优势,例如单靠繁殖速度(如大鼠)或降低后代死亡率(如人类)。在人类历史上,强国的确普遍采用进攻性战略,但这并非唯一可行的战略。在任何时代,主导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国际规范和军事技术都不同于上个时代。主导国采用新发明的战略会比模仿已有的战略更有效地扩大其权力。在一战之前,欧洲列强通过征服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争夺霸权。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通过兼并邻国实行殖民政策,但失败了。与欧洲列强不同,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通过代理人战争争夺霸权。自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来,美国通过包括挑起贸易摩擦在内的非暴力战略与中国进行权力竞争,这与美国和苏联所采取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结盟战略与不结盟原则

虽然中国这个最大的崛起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否定结盟战略的价值,但笔者仍认为结盟是个有效的道义战略,领导国通过结盟可赢得国际支持并建立权威。结盟是以领导国保护小国安全为基础的公共物品。崛起国通过结盟可提高其战略信誉,扩大其国际影响,从而促进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获得在国际体系中建立自己领导地位的机会。领导地位一旦得以巩固,崛起国就可能建立新的国际规范,改变秩序的性质,以至可能改变整个国际体系。

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认为,结盟容易导致战争,而弱小盟友有可能将同盟领导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实际上,结盟使领导国成功阻止潜在的战争还是被动地卷入不必要的战争,取决于政治领导这个决定性因素。最近一项扎实的关于同盟在战争决策中作用的研究成果,让批评结盟战略的人很不高兴。通过对美国结盟史的研究,迈克尔•贝克利总结道:"总之,经验记录表明,卷入冲突的风险的确存在,但它是可控的,美国的安全政策,无论好坏,都是由美国领导人掌控的,主要是由领导人根据他们对国家核心利益的认知制定的。有时美国在军事上过度扩张,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卷入了盟友的冲突,而是理查德•贝茨所说的'自我坑害'——美国领导人倾向于过大地界

定国家利益范畴,夸大了外部威胁的程度,并且低估了军事介入的代价。" (注)

- 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no. 1 (1998): 144-72.
- 2.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49.
- 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83), 97.
- 4. Sun Xuefeng, "Rethink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and China's Rise."
- 5. Shepard B. Cl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263.
- 6.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87.
- 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21.
- 8.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9. 《中俄联合声明:双方不具有结盟性质,不针对第三国》,网易,2016年6月26日,http://money.163.com/16/0626/08/BQFNAG3800253B0H_all.html。
- 10.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no. 4 (Spring 2015):47.

国际领导与规范的改变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因此由人控制的国家也必然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进进化论可支撑这一假定。进化论认为,动物的行为明显表现出自然选择的力量,这是自我生存的需要,而基于群体利他主义的假设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除了本能外,人的行为也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期许的影响。例如,心理学家发现:那些耳濡目染成年人暴力行为的孩子比没有那种经历的孩子更容易做出攻击性的反应;同样地,长期受虐待的孩子成年后会比同龄人更可能成为施虐者。迁这些研究表明环境在塑造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得出如下推论3。

推论3: 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也是制定国际规 范背后的压力

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有些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制定对外政策, 有些国家按国际规范制定对外政策。其实,在任何国际体系中,每个 国家制定对外政策都是基于既考虑自身利益又考虑国际规范的约束。 既然利益和规范都对国家的决策有影响,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推 论3:利益和规范分别对政策制定有何影响,以及利益如何驱动领导国 建立国际规范。

(1) 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但同时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

我们认为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但不否认社会观念和社会期盼对国家决策也有影响。关于人性的构成,荀子清楚地区分了性和伪。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

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违追求自身利益 是天性。它对每个决策者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它是人类的本能。然 而,根据荀子的说法,决策者因成长环境不同,包括教育背景不同, 他们的社会观念不同,或者说他们的伪是不同的。观念不同会导致决 策者在应对相同的问题时选择不同的战略。

决策者的社会观念可能会从两方面影响决策。一是观念影响决策者的国家利益排序,即在具体情况下,哪些国家利益应给予优先考虑。二是观念影响着决策者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偏好。决策者的社会观念确实影响他们把哪个利益置于首位,以及何种战略最能实现利益,但笔者仍认为客观的国家利益是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其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人的观念。这种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与亚历山大•文特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而文特认为国家利益是由人的社会观念主观建构的。注

(2) 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同样是建立新国际规范的动力。

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意在取代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制定更加自由的贸易规范,保持其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也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对美国不利,但其战略偏好与奥巴马政府相反,它相信保护主义的规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改革现行国际规范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崛起国,因为现行国际规范一般是有利于主导国的。当崛起国大幅缩小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时,它将寻求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改革现行国际规范。改革国际规范需要具备提供相关领域公共物品的实力,因此崛起国通常在其能力超过或至少等于主导国的领域提出改革或创建规范的建议。例如,201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却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储备,2013年,中国启动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其他国际开发银行的主要区别在于贷款没有政治条件。

战略信誉与国际规范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国际关系学者常常强调奖惩机制的作用。然而,这种理解忽略了一个经验事实,即对主导国来说,在良好战略信誉基础上建立新国际规范是迄今为止更有效的方法。对崛起国来说,这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崛起国实行奖惩的物质实力不如主导国。然而,当崛起国获得比主导国更好的战略信誉时,它提出的新规范将比主导国主张的规范对中小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一观点并非否认奖惩机制在建立新规范中的有效性,而是认为以身作则是更具竞争力的创建新规范的机制。这一机制取决于领导国带头遵守它所提倡的规范,也就是说,将自己变成同一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样板。其自身行为与所提倡的规则一致,领导国将会提高其国际战略信誉,从而获得重塑国际规范所需的影响力。

实际上,无论对崛起国还是主导国来说,战略信誉在塑造国际规范中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具体而言,保持良好战略信誉对于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比建立新国际秩序更为重要。一般来说,主导国有可能只凭借物质实力建立一个国际秩序,但它不可能仅靠物质实力长久维持该秩序。国际秩序能够持久的前提是大多数国家遵守国际规范。大多数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现行规范,主要取决于主导国是否遵守它所倡导的规范。因此,领导国的战略信誉与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持久性之间呈正相关。

一个支持上述论点的例子是美国违反控制战略武器的规范。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军控与核扩散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将这一条约作为世界和平的基石。在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考虑过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但是,由于担心此举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克林顿没有批准五角大楼的计划。这一而小布什政府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重视国际战略信誉的价值。2001年执政不久,小布什不仅废弃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还解除了美国1998年对印度非法核试验的制裁。这更糟糕的是,两年后,美国违背诺言,与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印度进行核合作。这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前后不一政策降低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弱化了核不扩散机制,促使朝鲜和伊朗拼命实施核计划。

^{1.}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48.

^{2.} Xiangming Fang and Phaedra S. Corso, "Child Maltreatment, Youth Violenc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ative Medicine 33, no. 4 (2007): 281.

^{3.}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489页。

^{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3-38.

- 5.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Longman, 2001), 64.
- 6.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241-43.
- 7. James M. Lindsay, Maurice R. Greenberg, James M. Goldgeier, "By Focusing Now, Clinton Can Renegotiate ABM Treaty,"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2000, http://www.cfr.org/world/focusing-now-clinton-can-renegotiate-abmtreaty/p6347.
- 8. White Hous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ABM Treaty: President Bush's Remarks and US Diplomatic Notes,"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02_01-02/docjanfeb02; "US Lifts India and Pakistan Sanctions," BBC News, September 23, 2001,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1558860.stm.
- 9. Jim VandeHei and Dafna Linzer, "U.S., India Reach Deal on Nuclear Cooperation,"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02/AR2006030200183.html.

国际秩序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

崛起国和主导国的国际地位变化经常直接影响权力再分配。在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崛起国必然要求得到与其增强的实力相称的国际权力,而主导国则一定要保护其下降的实力难以支撑的原有权力。因此,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这必然严重影响国际秩序。基于这一常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4。

推论4: 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并影响现行国际秩序

权力是建立在上下关系的基础上的,一方获得权力必然导致另一方失去权力,所以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国际权力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 建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推论4:权力的零和性如何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权力斗争如何影响国际秩序。

(1) 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者 都追求体系内的主导地位。

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源于格局变化期间的权力再分配。随着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以及国际领导权从主导国向崛起国的转移,它们之间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在人类不具备去太空旅行或与外星文明交流的能力时,现在的国际体系就是个封闭体系,体系内的国际权力总和为一,国际权力是按各国的相对实力分配的。人类历史上,那些没有实质联系的独立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与现代全球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性质相同。

领导权主要是根据大国实力结构分配的。因此,崛起国试图得到更大的权力,而主导国即使相对实力已下降,仍拒绝与崛起国分享其权力。所以,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维护和改变现有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的斗争。1898—1912年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用来说明结构性矛盾的概念。注

对崛起国而言,结构性矛盾还表现为崛起困境,即外部压力随着 其影响力的扩展而增大。这种崛起困境有点类似于牛顿第三定律, "对于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相等且相反的反作用力"。同样地, 崛起国的迅速增长将对其他国家(主要是主导国)产生强烈冲击,其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些国家不是拼命抵制就是全面对抗。实力增长扩 大了崛起国在海外的利益,从而导致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崛起国 获得的海外利益越多,它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就越多,这些冲突会积累 到战略对抗或战略威胁的程度。新近的一个崛起困境例子是2008年北 京奥运会后出现的"中国责任论"。许多国家(主要是美国)指责中 国不履行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建2010年,中国的GDP(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日本,中国因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这种舆论 急剧上升。

(2) 权力再分配的分歧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

国际秩序是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以非暴力手段按国际规范解决冲突的状态。 这意味着只要没有国家诉诸武力解决矛盾,国际秩序就能维持下去。通过暴力行为恢复秩序同样属于混乱状态。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没有军事垄断,因此任何对现状不满的国家都可能以武力实现其所诉求的利益。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结构。由于人天生渴求权力,无论是主导国还是崛起国,都不满足于国际体系中现行的权力分配。虽然主导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它仍追求更大权力。例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的国际权力,但美国总统老布什仍提出要建立

国际新秩序。这是个主导国夺走对手权力而不是崛起国攫取主导国权力的例子。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国际格局的任何改变都会破坏已有的秩序。由于主导国比崛起国享有更大的国际权力,主导国会强调维持现有秩序的重要性,或更确切地说,强调维持现有的权力分配结构。与此同时,崛起国则主张建立新秩序,也就是要求根据变化的实力结构重新分配国际权力。由于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它们的战略关系构成的,因此比对手拥有更多盟友的领导国有更多机会按自己的意图重塑国际秩序。

有一种误解,认为领导国的道义行为是塑造国际秩序的灵丹妙药,其实可获得良好战略信誉的道义行为并不是万能药。国际秩序是靠领导国的实力和它的道义政策维持的。国家实力是道义行为产生效力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领导国的道义行为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之所以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领导国比中小国家拥有更强的物质实力。没有超强的实力,任何领导国都无法只凭道义行为来维护国际秩序。

国际领导类型与国际体系转型

的定义是"维持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或首要目标的活动模式"。 這根据他们的定义,本书将体系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将秩 序定义为体系的状态。

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享的构成要素,这可能是许多人将这两个概念混淆的原因。作为这两者共享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具有决定具体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规范性特性的功能。例如,根据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原则,国际社会可以建立两套不同的国际贸易规范。国际贸易秩序的规范性质是由国家在贸易中遵循哪种规范决定的。这个逻辑也可用来界定具体的国际体系所发生的规范变化。尽管二者共享同一个构成要素,但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各自都还有两个互不相同的构成要素,这一点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忽视。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还有行为体和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还有主流价值观和机构安排(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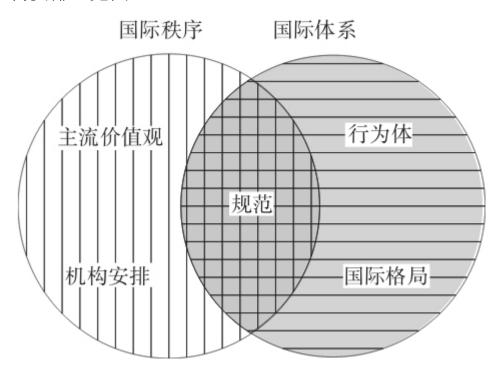


图3-2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区别意味着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可能是有序的或无序的。这同样适用于国内体系,它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遭受内战破坏的。我们可以用机械表和电子表的差异来说明这一点。机械表和电子表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但是如果时间走得准,它们都是有秩序的,而如果时间走得不准,那么它们都是无秩序的。历史上,一个国际体系的秩序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是那个体系能在战争中持续下来,并恢复其秩序。例如,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和现代的主权体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它们有时是和平的状态,有时不是。

国际秩序可分为结构秩序和规范秩序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权力分配的结构,其主要表现为国际组织内的权力安排,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后者是指规范的性质,主要表现在诸如核不扩散等规范的原则上。吴翠玲说:"除了权力分配,秩序的转变还涉及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适不论是结构秩序的改变还是规范秩序的改变,都会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即混乱。一般来说,结构秩序的改变比规范秩序的改变更容易导致暴力冲突。

由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不同的事物,因此它们发生变化的条件不同。当国际秩序从主导国的领导向崛起国的领导转变时,国际秩序通常遭到破坏。然而,国际体系的改变则往往取决于国际领导类型的变化,如果国际领导类型未变,秩序恢复后的体系仍可能保持不变。例如,根据第二章所定义的国际领导类型,二战前欧洲殖民大国实行的领导是强权型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实行的领导是霸权型的。在这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建立了不同的国际规范。二战之前,兼并他国领土是通行的规范,二战后兼并行为被禁止了。《联合国宪章》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

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廷因此,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改变,二战后国际体系由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

图3-3显示的是崛起国的国家领导类型与国际体系可能变化的关系。崛起国国家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它的战略偏好,而战略有两种结果——成功或失败。如果崛起国的综合实力赶上或超越主导国,并且崛起国能够成功改变国际格局,其就有可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型国际领导,并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以便维护其主导的新秩序。当崛起国使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者都发生变化时,国际体系特性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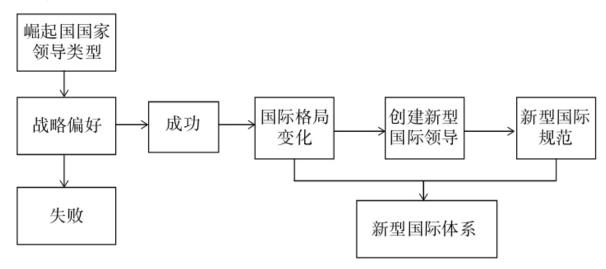


图3-3 崛起国国家领导类型和国际体系的变化

1. Amstutz, International Ethics, 49.

- 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59—361页。
- 3. Michael Fullilove, "Do We Really Want China to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Global Affairs," Brookings, December 3, 2010,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do-we-really-want-china-to-be-a-responsible-stakeholder-in-globalaffairs/.
- 4.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页。
- 5. George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n Presidency of Project, January 29, 199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9253.
- 6.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26 and 111.
- 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 (Beij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8 and 9.
- 8. Evelyn Goh,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
- 9. Article 2, Chapter I,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 10. Yan Xuetong, "Shift of the World Center," 228-30.

小结

本章在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探讨了国际权力转移的逻辑和机制。从这些假定出发,道义现实主义得出4个推论: (1) 国家领导力的提高或下降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 (2)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原则都是自保,但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不同的; (3) 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也是制定国际规范背后的动力; (4) 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影响现行国际秩序。

这些推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可能是部分重叠的。例如,推论1 认为领导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而推论2假定不同的领导具有不同的 战略偏好,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都为自身战略利益实 行自保。推论3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领导国建立 国际规范是为了稳定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而推论4则认为领导 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显然,这4个推论是对高度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抽象认知,通过 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变化归因于崛起国与 主导国的领导类型,从理论上将三个层次的分析联系起来。这三个分 析层次分别为个人层次的领导、国家层次的决策与国际体系层次的格 局和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政治领导的类型在所有4个推论中都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领导决定了推论1中国家实力的增长、推论2中国际竞 争的外交战略、推论3中的国际规范类型,以及推论4中国际秩序的稳 定和持久。 虽然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际规范的类型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但国际秩序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国际体系的转型,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事物。国际体系指的是组成国际社会要素的整体组合,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行为体、格局和规范;而国际秩序指的是体系的状态,行为体是否根据规范和平地解决争端。虽然国际规范是这两者的共同构成要素,但是它只界定它们的规范特征,并不能使它们一样。

第四章 权力再分配与世界中心

夫先王之所以王者, 资邻国之举不当也。

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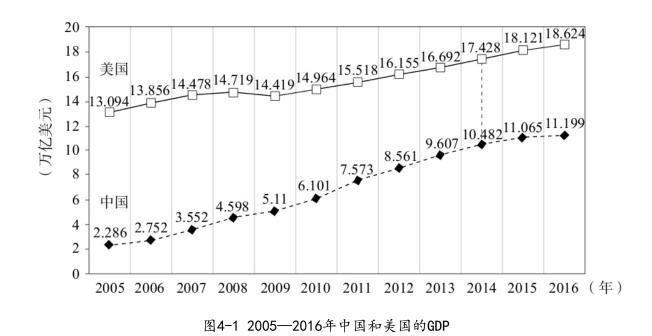
上一章将国际权力再分配归因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领导能力不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出现的两极化可作为说明这一论点的例子。当前的两极化伴随着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虽然两者都源于权力再分配,但发生的条件并不一样。本章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即推动目前中美两极化的关键因素、引发全球冷战所需的条件,以及新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形成的条件。对当前两极化的分析基于推论1,即国家领导力的提高或下降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冷战发生条件的分析基于推论2,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原则都是自保,但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不同的。

领导与两极化

当今世界的两极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获得了与美国同等的权力,而是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向超级大国接近,在即将到来的两极格局中成为一极。尽管中国目前的权力尚未与美国并驾齐驱,但目前国家权力分布状态是,中国比其他大国的权力已经大很多。在一些欧洲人看来,"如今两大领导国(美国和中国)与排名第三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与1950年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相似"。

注

目前的两极化主要源于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得有多快不仅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增长速度,而且取决于美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如果美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和中国的一样,那么它们的实力差距将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因为美国综合实力的基数大于中国。如果这样,两极化就会停止,美国将重获巩固其单极领导所需的实力。然而,如果中国能保持比美国增长快的趋势,那么两极化就会持续下去。未来10年,美国的实力增长率能否与中国相等,取决于两国的政治领导。这个观点与本章开头提到的推论1一致。与美国相比,政治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约束力要小,所以当前两极化趋势有两种可能。如果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进行更多的政治改革,两极化在今后10年将加速;反之,如果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犯更大的战略错误,有更大倒退的话,两极化将停止。如图4-1所示,从2014年起,中国与美国的GDP差距几乎停止缩小,2015年起开始拉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end=2016&locations=US-CN&start=2005。

 的,在我们如今的核世界里更是如此,大国战争的预期代价高得可怕。然而,单极格局的持久性并不是仅凭战争的高昂代价来保证的,恰恰相反,这还取决于第二个因素,即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大国经济增长所采取的战略。" 注

另一方则认为,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并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失去世界第一的地位。戴维·莱克认为: "然而,从较长期的角度来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成为一个与美国相等的超级大国。中国人口多,国土面积大,经济增长快,在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 这一派的论点通常基于经济数据,比如美国无法偿还其国际债务,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当年产生的财富不足以偿还其年终的债务,美国当年的GDP为15万亿美元,年终的债务为16.2万亿美元,比GDP高出1.2万亿美元。 建2013年,奥巴马明确指出,美国的预算在未来10年内不会平衡。 建特朗普上任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美国日益恶化的财政赤字归咎于他的税收政策。爱德华·麦卡弗里说: "特朗普的计划将使债务和赤字大幅增加。" 建那些认为美国正在相对衰落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会利用其债权地位来遏制美国的增长。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的确相对衰落了,但不能从金融角度解释美国衰落的原因。表面上看,美国的相对衰落源于政府的债务政策,但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缺乏在国内实施政治改革的政治领导,这才是美国无法避免中国缩小与其实力差距的关键。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债务都呈现为不断增长。然而,克林顿政府与之不同,取得了显著的财政成就。他执政期间不仅偿还了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债务,而且给美国的财政积累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盈余。建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意味着,美国能否解决债务问题,关键不在市场,而在于政府的领导能力,尤其是政治改革能力。决定中国和美国综合实力增长的关键因素都是政治改革。这两个国家谁能赢得未来10

年的战略竞争,取决于谁能比对方进行更有效的改革。较慢的改革者或强硬的背道而驰者将陷入相对衰落。

导致国家领导类型发生变化的因素很多, 其中落后的国际地位具 有特殊作用。落后的国际地位常常激励一国领导实行改革: 反之,对 本国的国际地位越满意,一国领导的改革决心就越弱。美国面临的问 题是相对衰落, 而非绝对衰落。也就是说, 美国的绝对实力比大多数 大国增长得快,仅比中国增长得慢。相对衰落的性质使美国政府可通 过自己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或与中国之外的大国进行横向比较,轻 易地证明美国的进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将美国2015年的 经济与2010年的经济进行比较,她说: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比以往 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强大了。自从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我们制止了最 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修复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世界贸易崩盘。" **违**特朗普在许多方面与奥巴马不同,但与他的前任一样,他对美国超 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国政府取得的成就充满了自豪感。在访问东亚国家 之后,他说: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东道国都以难以置信的热情好客 和最崇高的敬意迎接我及我们美国代表团。这一崇高的尊重充分显示 了我们的国家是非常好的——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世界上重新树立 的信心和地位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 (注)

当美国的综合实力比中国强得多的时候,任何美国领导都很难像中国领导那样热衷于改革。由于改革会损害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中美两国的改革都面临着阻力。利益集团会充分利用它们的法律权利和社会资源,拼命捍卫它们的特殊利益。因此,具备政治改革能力的领导,一定是有勇气和有能力战胜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这种能力通常来源于政治实践,而不是竞选的唇枪舌剑。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届领导,美国经历了四届政府。然而,中国政府实施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比美国政府多。目前中美实力差距的变化与其说取决于哪国更多地实施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如说取决于哪国政治倒退得少。

虽然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当前的两极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其他大国的领导人的对华和对美政策也在影响着两极化的进程。如果这些大国采取支持中国的立场,两极化将加速,但如果这些大国站在美国一边,两极化则减速。目前,有好几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是争斗型的,如俄罗斯的普京、日本的安倍晋三、印度的莫迪和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他们都倾向于对抗而非和解的战略,选择意外而非常规的政策。这种类型的领导往往会恶化大国的战略关系,加剧大国的战略对抗。因此,这类领导的出现为两极化的加速奠定了合适的基础。

- 1. Øystein Tunsjø, 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181.
- 2. Susan E. Reid, "Who Will Beat Whom? Soviet Popular Recep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9, no. 4 (2008): 885-904.
- 3.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1994):62-78.
- 4. Nye, Future of Power, 202.
- 5. Robert Kagan, The World American Mad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131.
- 6. Nuno P. Monteri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 7.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82.
- 8. "American Federal Budget Deficit Persists for a Fourth Year, Breaks \$1 Trillion," United Morning Paper (Singapore), last modified July 29, 2012, http://www.zaobao.com/gj/gj120729_001.shtml.
- 9. "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 Proposes to Achieve a Balanced Budget within Ten Years," Southern Daily, March 14, 2013, A09.
- 10. Edward J. McCaffery, "Trump's Massive Tax Cut—for the Rich," CNN, September 28, 2017,

- http://edition.cnn.com/2017/09/27/opinions/trump-taxplan-opinion-mccaffery/index.html.
- 11. Fareed Zakaria, "The Debt Deal's Failure," Time, August 19, 2013, 14.
- 12. Th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f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Rice on th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February 6, 2015,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2/06/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rice-2015-nationalsecurity-stra.
- 13.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His Trip to Asia,"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f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5,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11/15/remarks-president-trump-his-trip-asia.

两极格局不等于冷战

在当前的两极化趋势下,许多人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将导致世界重回冷战,特别是如果中国放弃不结盟原则,像美国一样实行结盟政策,世界会变得和20世纪下半叶一样。建这种理解是将"两极格局"与"冷战"混为一谈。两极格局是指实力相当的两个大国各自在国际上有一些追随者,而冷战指的是通过军事对抗进行的意识形态竞争,其最主要的形式是代理人战争。历史表明,两极格局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情况:战争、冷战、和平。

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两极格局后不久便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建这个例子展示了战争中的两极格局。公元前579—前546年,晋国和楚国是中国东周列国时期的两大霸权,形成了诸侯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经过80多年的军事对抗和多次战争,这两个大国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其中包括这样的条款: "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建两极格局形成后,这份和平条约建立了一个表面的联盟,使它们的关系不再那么暴力了。这一事例表明,两极格局既可以是战争状态也可以是和平状态。

冷战的形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双方拥有核武器,可以防止美苏战略竞争升级为直接战争;意识形态竞争是战略竞争的核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交往。如今,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冷战都难以形成。核武器在防止中美直接战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就像当初在美苏之间的作用一样。中美的核心冲突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对抗,同时这两个大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战略竞争。下面我们详细讨论一下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不同于冷战的原因。

(1)对核武器的深刻理解,使中美两国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冷战初期,很多人还不知道核武器形成的相互威慑功能可以拯救世界。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谢林在研究核武器与有限战争之间的关系时,区分了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性质。建从那时起,战略家开始逐渐意识到核武器相互威慑的功能,到80年代,这种专业知识成为常识。核武器防止了二战后爆发世界大战,也防止了美苏间的直接战争。尽管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加速了反导系统的发展,但反导系统的改进并没有破坏核威慑的功能。美国的反导系统比任何国家都先进,尽管如此,在与核大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方面,美国还是非常谨慎的。例如,乌克兰政府自2014年年中以来一直与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志愿军作战,美国虽然强烈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奥巴马政府在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毁灭性军事装备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建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国会考虑通过一项法律,以避免特朗普违反宪法规定,未经国会同意就进行预先策划的此类袭击。建

中国和美国都对核威慑战略有着深刻的了解,虽然它们继续其核 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现代化,但都知道在核战争中获胜是不可能的,都 知道以核战争进行争霸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由于核扩散增加了代理 人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它们甚至不愿为了战略竞争而承担进 行代理人战争的代价。今后10年,中美军备竞争将主要体现在武器现 代化上,而军备竞争引发中美直接战争的危险并不大。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还会抑制它们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中美代理人战争的危险将小于当年美苏之间的战争。

(2)美苏对抗的核心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中美在21世纪的竞争核心则是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对抗与政权的生存息息相关,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常常引发生死之争,当初美苏都把对方公开定义为邪恶国家。物质利益的战略竞争,包括国际权力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但它关乎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并不危及政权生存。因此,从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直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中国和美国都不愿将对方公开定义为敌人,而宁愿维持非敌非友或假朋友的关系。建当两国战略竞争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时,其中一方便可利用这种假朋友关系调解双边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它认为中国主要是个经济竞争者,还不是个意识形态竞争者。建意识到互相定义对方为战略竞争者会导致冷战,中国政府故意低调处理这一问题。只要中国自我控制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世界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冷战。

如果把美苏之间的战略竞争比作拳击比赛,那么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可以比作橄榄球比赛。前者主要依靠蛮力,而后者虽有身体碰撞,但较少依靠暴力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 进没有人能断言冷战再也不会发生,但未来10年内爆发的风险不大。尽管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会在其总统任期内发动新的战争,但战争的对象国可能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中国也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卷入军事冲突,但是中国和美国进行直接战争的风险微乎其微。

(3)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从而使新冷战不太可能爆发。许多人同意华尔兹的观点,即法德的经济相互依赖没能阻止一战的发生,因为这表明在极度痛苦的战略对抗中,大国几乎不考虑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违因此,他们认为,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不能防止

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战争。这然而,这些人忽视了全球化和双边相互依存的区别。两者都会使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双方产生敏感性,但是全球化降低了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的脆弱性,这与双边相互依存是相反的。罗伯特•基奥恩说:"相互依存的脆弱程度取决于各个行为体能否找到相对合适的其他选择以及替换的代价有多高昂。"这全球化为经济相互依存的国家创造了可供选择的替代市场,并降低了企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成本。在全球化时代,当相互依存的国家受到原经济伙伴的经济制裁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市场。例如,2012年钓鱼岛争端引发了中日政治对抗,日本企业很快将其投资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2013年1—6月,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猛增了88.7%,达到9986亿日元,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则比上一年下降18%至4701亿日元。注

苏联解体后,民主化和市场化创建了全球市场。东欧国家的民主 化导致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体,从而将东西方两个市场变成了一个 全球市场。市场化打开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封闭的市场。除了朝鲜和古 巴等少数例外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向外国资本和产品开放了国内市 场。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已成为中国和美国获取外国市场及自然资源 的两个主要手段,用这两个手段积累财富比战争更有效。

(4)除了全球化,计算机技术也有利于防止21世纪发生新冷战。由于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技术成为积累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工具,同时降低了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故此,中美不需要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发动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流行,到90年代互联网成了"日用品"。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类的发明能力与生产能力,以至人类的生产能力超过其消费能力。中美两国具有最强大的技术发明能力,能创造出足够多的新产品用于贸易,以换取它们所需的所有自然资源。因此,它们都不需要用军事力量去控制自然资源所在的地区。在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

题不再是生产力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而是人类无力消费掉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球产能过剩"问题。

- 1. 毕方圆:《曲星:中俄不能结盟,否则会爆发新冷战》,环球网,2014年12月6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2/5229619.html; Richard A. Bitzinger, "Warring Ideas: Yan Xuetong's Awful Concept of a Chinese Military Alliance," Asia Times, February 16, 2016, http://www.atimes.com/article/warring-ideas-yan-xuetongs-awful-concept-of-a chinese-military-alliance/。
- 2.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28.
- 3. 胡志挥英译,陈可炯今译:《左传(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7—608页。
- 4. 《世界知识年鉴(1989—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714页。
- 5. 同上。
- 6.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57-66.
- 7. James Warren, "Obama Tones Down Talk of Military Aid for Ukraine, but Won't Rule It Out Either," New York Daily News, February 9, 2015, 2:06 p.m.,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politics/obama-tones-talk-military-aidukraine-article-1.2108681.

- 8. Michael Eisenscher, "Donald Trump, Congress, and War with North Korea," Counter Punch, November 21, 2017,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7/11/21/donald-trump-congress-and-warwith-north-korea/.
- 9.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no.3 (Autumn 2010): 280-85.
- 10.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1043812.pdf.
- 11.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2 (2012): 124-27.
- 12.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8-43.
- 13.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 New York: W.W.Norton, 2014), chapter 10.
- 14.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13.
- 15. "Will an Integrated ASEAN Region Challenge China?" Knowledge@wharton, January 15, 2014,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will-an-integratedasean-region-challenge-china/.
- 16. Megan Slack, "Our Dependence on Foreign Oil Is Declining," White House Blog, March 1, 2012, 9:30 a.m. EST,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2/03/01/our-dependence-foreign-oil-declining.

世界中心的构成条件

随着金砖国家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的建立,特别是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关于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讨论越来越多。目前的两极化使地缘政治进一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而,关于地缘政治中心究竟会向哪里转移,各种看法大不相同。例如,一位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并且从北方向南方转移,进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朝着亚洲移动。建201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回答墨西哥记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提问时说: "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建关于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看法如此不同,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区分权力再分配与格局变化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缺乏判断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客观标准。

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界定标准

依据一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导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导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建虽然他的论点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很受欢迎,但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支持他的观点。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统治了东欧,但德国战败了并被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苏联在冷战期间控制着东欧,但它并没有因此强大到足以统治整个世界,而是后来解体为15个国家。同样地,欧盟吸收了东欧国家,但这并没使欧盟更强大,反而削弱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建2016年欧盟的分化趋势暗示的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从欧洲

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靠北约东扩成为在东欧最 具军事影响力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 原因,形成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 体,两极格局还会持续下去。此外,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普京执政 后,美国对东欧的军事主导权并没能使美国获得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管 控权。

世界中心不是由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位于中心地区的国家的实力决定的。具体而言,一个地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国家的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有一个或多个国家,其物质实力水平(特别是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水平)是第二等级国家所达不到的。物质实力使那些国家有能力领导世界,政治实力使它们成为其他较弱国家效仿的样板。第二,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应该是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历史表明,领导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极力控制它们自身所在的地缘政治中心区,另一方面是权力竞争从地缘政治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当领导国所在地区没有权力竞争时,该地区成不了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故此,第一种竞争是一个地区成为地缘政治中心的基本条件,而第二种竞争则是第一种竞争的延伸。

二战结束前的150年里,欧洲一直是公认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在这期间,欧洲列强竞相争夺海外殖民地以及对欧洲的统治权。因此,欧洲既是全球竞争对手的所在地,也是大国争夺统治权的竞技场。例如,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争夺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它们的战略竞争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在欧洲的侵略扩张也造成了这个地区的战争。同时,非洲是一个殖民大陆,欧洲列强不断争夺对它的管控权。然而,由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不在非洲,因此非洲无法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的全球主导地位,是苏联的崛起拯救和恢复了欧洲国际政治中心的地位。(注

冷战期间,美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全球体系中的主要战略敌手。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的所在地,欧洲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竞争最激烈的焦点地区。故此,欧洲才能在冷战期间保持其国际政治中心的地位。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富尔顿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建正是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竞争核心地区在欧洲,所以这道"铁幕"是横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降下的。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外,北约和华约的所有成员国都在欧洲。一方面,这一现象意味着欧洲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另一方面,欧洲也是美国与苏联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

以上对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的分析,也可应用于对古代独立的国际体系中地缘政治中心的判断。尽管现代全球体系和古代国际体系有许多差别,但它们的性质都是无政府性。所以,几个最强大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地缘政治中心,它们的所在地作为它们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强化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两极化与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

美国在冷战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中都是全球最强大的 竞争者,但欧洲在这两个时期被视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于是,人们 误以为,无论世界格局是两极还是单极,只要美国能保持最强超级大国的地位,欧洲就将继续是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然而,目前中美两极 化的现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的。

美国的地理位置是不变的,它既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也是一个大西洋国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今后10年它仍可能是最强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将继续是超级大国,其地理位置又不变化,因此美国难以成为目前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

因素。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不应作为分析中心转移方向的主要变量。把美国作为一个常量控制后,我们可以比较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变化,这个变化才是决定未来10年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关键变量。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和美国都经历了实力的相对下降,但它们各自对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影响是不同的。今后10年内,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改变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一个全球竞争者,美国无疑仍将是东亚地区的主要战略玩家。然而,欧洲国家的相对衰落已将其全球影响力降至不及一些东亚国家的水平。"亚洲之家"主席格林勋爵说:"欧洲已从自我定义的世界中心退回到15世纪以前的样子——广袤欧亚大陆的一个角落。"建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再加上东盟、韩国的GDP总和已大于欧盟和俄罗斯的GDP总和。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军事支出反映了近似的情况。据报道,2016年欧盟28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为1990亿欧元(约2388亿美元)。建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防预算支出为1460亿美元,建日本和韩国的国防预算支出分别为440亿美元建和360亿美元建

此外,欧洲可能失去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还有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和俄罗斯)有足够强的实力成为世界级的竞争者,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东亚新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并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总而言之,驱动当前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原因是欧洲大国和中国的实力地位换位。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其实力迅速增长,使国际格局从一极向两极转变,这不仅导致权力再分配,而且推动了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之快令人振

奋,但未能使东亚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除了当时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依然存在外,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二战后日本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崛起是单纯基于经济增长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以来,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建立在综合实力之上的。中国的崛起不仅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而且明显缩小了与美国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差距。因此,中国已成为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利益的首要战略威胁。 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符合作为美国全球竞争对手的条件。因此,现如今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东亚而不在欧洲。

中国的崛起为东亚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也 使该地区成为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区。如前所述, 一个地区成 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全球性大国争夺对它的主导 权。2010年,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重返亚洲"战略,后来改名为"亚 太再平衡"战略。美国这一战略意味着东亚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性大国 战略的地理范围将向新的世界中心收缩,这样美国就可以应对当前来 自东亚真正崛起国的挑战。因此,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目的是维护其 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影响和优势。此外,美国从中东撤军和在 东亚的军事扩张都显然证明东亚正在成为新的世界权力中心。中国是 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 面对这一现实, 美国担心失去它在东亚的主导 地位。近年来,在与中国同行的私下谈话中,美国的战略家一再声称 美国是个东亚国家,不能容忍被排挤出东亚。即使特朗普政府从经济 角度界定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当今时代,除了东亚,它也不可能将任 何其他地区定义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利益地区。虽然出于彰显与奥巴 马政府不同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创造出"印太"一词,但在《2017年 国家安全战略》的"地区战略"一节中,关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排在任何其他地区之前。建

战略竞争领域的演变

为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战略竞争既包括经济竞争,也包括军事竞争。中国现在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最多,但在军事实力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2018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约7000亿美元,进而中国的年度军费开支还不足美国的1/3。由于缺乏现代战争的作战经验,中国实际的军事能力还赶不上俄罗斯。换言之,用数字表达的军事能力,或者说根据军事资产所做的货币价值衡量的军事实力,并不一定等于按真正的攻防能力衡量的物理军事实力。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相对较小,军事差距依然很大,因此两国经济竞争将远远比军事竞争激烈得多。

 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 适国际战略家和政策分析家开始研究崛起国在世者的思想,这表明该崛起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崛起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世者的观念,而不是取决于那些早已过世者的观念。

- 1. 《阿报文章: 2011年: 世界处在十字路口》,新华网,2011年1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2/c_121009347.htm。
- 2. 熊欣、李木子: 《全球经济决策权力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和讯网,2010年9月8日,http://news.hexun.com/2010-09-08/124834325.html。
- 3. 引自唐伟杰: 《中国外长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中国新闻网,2010 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31/2438006.shtml。
- 4. Halford John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42), 106.
- 5. 相关讨论参见 Tanja A. Börzel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Coming Together or Drifting Apart? The EU's Political Integration Capacity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4, no. 2 (2017): 278-96。
- 6. Lefton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London:Prentice-Hall, 1966), 457.
- 7. 引自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47页。
- 8. Lord Green, "As the US Falters and Europe Declines, Look East to See the Futu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3, 2017, http://m.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21297/america-falters-and-europe-declineslook-east-see-future.
- 9.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Defense," Eurostat, March 2018,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defence.
- 10. 陈岩: 《今年军费增长7.6%》,新浪新闻,2016年3月3日,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3-05/doc-ifxqaffy3628549.shtml。
- 11. Kirk Spitzer, "Japan Approves Record-High Budget, Focusing on Defense, Economic Recovery," USA Today, March 29, 2016,

-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6/03/29/japan-government-defense-budget-economicrecovery/82376314/.
- 12. "South Korea Government Defense Expenditure," Countryeconomy.com,
 https://countryeconomy.com/government/expenditure/defence/south-korea.
- 13.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www.dtic.mil/drtc/tr/fulltext/u2/1043812.pdf, 25, 46.
- 14. Robert S. Ross and Øystein Tunsjø, "U.S.-China Relations: From Unipolar Hedging toward Bipolar Balancing," in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and Politics in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017), 59.
- 15.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6.
- 16. 同上,第65页。
- 17.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8. 关于权力转移和霸权周期的理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参见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 Manus I. Midlarsky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23-54;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5。
- 19. Aaron Blake, "Trump's Menacing United Nations Speech, Annotate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9/19/trumps-menacing-united-nations-speech-annotated/?utm_term=.3d65e546ccf8.
- 20.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York: Basic Books, 1990), 34.
- 21.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
- 22.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 23. 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出版。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小结

中美两极化是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缩小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的领导效率差别。克林顿政府之后,美国经历了三任领导,但没有一任像同期中国政府那样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低效的领导使美国基本上无法阻止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随着争斗型领导在多数大国盛行,两极化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加速进程。

未来几年内,两极世界很有可能正式形成,不过中美战略竞争将 与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的方式不同。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 的性质是相同的,但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 小,两国将进入全面竞争,但仍不太可能进行直接战争,其主要原因 是它们都拥有核武器。由于全球化、计算机技术的提高以及中美意识 形态对抗不太可能,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冷战的可能性不大。

领导国的权力再分配促成了国际格局的转型,但不一定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该地区至少有一个具有领导地位的战略竞争者。第二,该地区必须是至关重要的,以至掌有这一地区的主导权是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先决条件。第二个条件推动了相互竞争的领导国争夺那个地区的控制权。如今,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所引起的权力再分配正在改变冷战后的格局,即从单极格局走向两极格局。巧合的是,这种两极化同时伴随着欧洲的衰落。因此,当前推动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引擎是中国崛起和欧洲衰落的结合,而非美国的相对衰落。

第五章 领导与国际规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

由于国际规范的变化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有一种被误导的倾向,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领导国对新国际规范的形成所起的主导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本章将主要讨论在国际体系中国际规范是如何伴随领导国的外交行为而变化的。对这一观点所做的分析是建立在本书推论3之上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也是制定国际规范背后的压力。也就是说,主导国建立或维护有利于其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意愿是其改变国际规范的动力。由于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具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因此不同类型主导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有可能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可能加剧国际冲突。鉴于领导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对新规范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它们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建立新规范的。

有关领导与规范变化的早期研究

早期研究领导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主要是研究决策理论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学者从政治领袖的个人特点、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角度研究对外决策。他们有关领导者类型的一些结论有助于讨论这个问题。例如,理查德·斯奈德和他的同事将领导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驱动型,另一类是原因驱动型。进对于这两种类型的领导者,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前者有意识地创建或改革规范,后者则无意识地创建或改革规范。追笔者同意领导类型在改革国际规范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但本书没有使用他们对国际领导的分类,因为这一分类无法解释为什么同类型的领导人对同一国际规范会采取相反的做法。以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小布什为例,他们都是典型的目的驱动型领导。约翰逊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限制与非法核国家进行核合作,而小布什却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不是该条约缔约国的印度进行核合作。追本章将依据第二章中的国际领导类型来分析领导类型与规范变化的关系。

研究国际规范的理论家普遍赞同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的观点,即领导国的变化是国际规范性质变化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新国际规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领导国提倡新的规范,二是大多数国家遵循这种规范,三是这种规范被内化或社会化为指导国际行为的普世原则。建这个分析模型是有用的,但其辩证分析的方法使自变量和因变量无法区分。这种方法一方面说人们的观念变化改变了国际规范,另一方面又说国际规范建构了人们的国家利益观念。进为了避免观念在理论建设中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的缺陷,笔者将探讨领导国行为变化与国际规范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国

际领导类型是自变量,而国际规范类型是依据领导类型变化的因变量。领导国有选择性地推进某些规范是因为这些规范有利于维护它们的利益,它们不会接受那些好的但不利于它们的规范。因此,不同类型的领导国会主张不同的规范。为了避免判断的主观性,本书将以领导国的行为作为判断领导类型的标准,依据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判断领导国行为对国际规范的影响。也就是说,领导国的行为发生在国际规范变化之前。

 国领导接受主导国提倡的规范并将其体现于政策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规范在那个国家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政策制定者是被说服的、被强迫的还是被改造的,他们对新规范的接受都仅能表明社会化进程的开始,而不是已经社会化的结果。

- 1.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ed. Richard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rev. ed., 21-15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9.
- 2. Dougherty and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59.
- 3. "目的驱动"是指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制定政策。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国家落入共产党手中,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扩大美国对中东的控制。
- 4.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887-917.
- 5. 同上,第891页,第896—897页。
- 6.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 (1990): 290.
- 7. 同上,第290—292页。
- 8. Amy Gurowitz,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Actors, Immigrants, and the Japanese State," World Politics 51, no. 3 (1999): 413-45.
- 9. Ikenberry and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290.

领导类型与规范类型

我们假定领导的两个核心职能是提供方向和施加影响。基于这一假定,本节将讨论国际领导对国际规范类型变化的影响,以及国际领导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路径。为了认清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讨论领导类型与规范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通过领导国与其他国家互动形成新规范的机制。

国际规范的分类

为了了解不同国际领导对国际规范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先看一下4类领导的不同行为,这4种领导的类型是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既然国际领导的类型是指领导国决策的指导原则,那么就可以根据领导国的外交政策判断其国际领导的类型,就如同一个人是否随地吐痰可反映其对公共卫生的态度。一个领导国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供不同类型的国际领导,因此我们需要根据领导国在某个时期内的主要行为来判断该国的国际领导类型。

在分析国际领导类型和国际规范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时,需明确国际规范的定义,其重要性与给国际领导下定义同等重要。斯蒂芬·克拉斯纳说: "规范是依据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原则。" 建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将国际规范定义为在独立的国际体系中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原则。这一定义包含暴力行为和非暴力行为的规范。 建这一定义同时还强调,主导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在被大多数国际成员国接受之后才能被视为国际规范,因为只有这样,这些规范才是通行的,才足以影响大多数国家的行为。

国际社会具有自然和社会两个属性,这意味着国际规范与这两个属性都有关系。这一现实要求我们根据基本的对外行为来区分国际规范的类型,这些对外行为要么源于国际社会的自然属性,要么源于其社会属性。荀子说:"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建借用荀子对大国对外行为原则的分类,我们可以将其修改为4种国际规范:强权政治规范、恃强凌弱规范、双重标准规范和道义规范。这4种规范分别来自4种不同类型的领导:强权型、昏庸型、霸权型和王道型。强权政治和恃强凌弱的规范根源在于国际社会的自然属性,双重标准和道义的规范则源于人类社会后天的社会属性。道义和强权政治两类规范产生于领导国行为的一致性,而双重标准和恃强凌弱两类规范产生于领导国行为的不一致性(见表5-1)。

表5-1 国际规范的类型

体系属性	行为	
	一致	不一致
社会	道义规范	双重标准规范
自然	强权政治规范	恃强凌弱规范

在天性的驱使下,强权国家遵循的是强权政治原则,也被称为适者生存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强权型领导的行为体现在其所奉行的规范中。强权政治规范是指通过强制手段(主要是军事力量)获得国家利益的原则。16—19世纪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体现的就是这种原则,它们的所作所为依据的是当时的征服权和占领权的原则。建强权政治规范是建立在人的天性基础之上的,在没有更为进步的社会规范约束的情况下,强权政治规范就成为普遍的国家行为原则。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类似,第二定律说:"孤立系统的熵永远不会降低。"在人类的自我实现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任

何社会交往的自然状态都会趋向混乱。孔子认为,通过军事力量加强 国家安全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 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违换句话说,人类本 能地以暴力为自我保护和追求利益的手段。

恃强凌弱规范经常源于昏庸型领导的行为。昏庸型领导也是由天性驱使的,但没有政治原则,他遵循恃强凌弱的原则,即霸凌弱者但惧怕强者。在拥有比其对手更强的物质实力时,这类领导国经常欺负其他国家,不在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信誉。然而,面对强硬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昏庸型国家都会因怯懦而避免与它们发生冲突。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理由是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这可能对叙利亚人民构成威胁。然而,同年8月朝鲜进行了核试验,特朗普政府却不敢对朝鲜做出任何军事反应。

道义规范是指国家所遵循的在某个具体历史时期以合法手段获取利益的原则。例如,截至1997年,165个国家签署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建该公约禁止各国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用来指导外交政策的道义原则是以文化教育为基础的,当大多数成员国为了和平解决争端而接受这些原则时,这些原则便成了规范。当道义规范被削弱时,强权政治原则会自动恢复为支配国家行为的规范。与强权型领导和昏庸型领导不同,王道型领导国遵循道义原则,基于国际社会的社会属性,这些道义原则被公认为进步的礼仪。

在国际关系史上,双重标准规范比其他三种规范更常见。由于国际社会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强权原则和道义原则常常同时影响国家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霸权国对付敌国时运用强权政治原则,而对友好国或盟国则实行道义原则。既然这种做法在国际体系中非常普遍,那么我们就将这种情况定义为双重标准。例如,冷战时

期,美国很少批评其盟国沙特阿拉伯糟糕的人权纪录,却对其敌国古巴的类似行为实行制裁。

建立国际规范的机制

领导国的行为决定了它们的领导类型,同时它们的行为会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它们所采取的行为原则。当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原则时,这种原则就会社会化为国际规范,如图5-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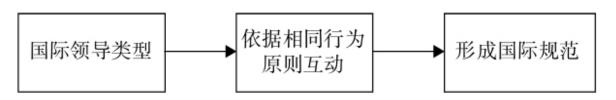


图5-1 国际领导类型与国际规范的形成

在分析国际领导类型与国际规范的关系时,我们将前者视为自变量,后者视为因变量。国际领导类型变化后,通过领导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国际规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领导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干预变量,是中介,领导类型是通过这一中介改变国际规范的。干预变量可以起常规互动的作用,这会加强现有的国际规范,但也能起非常规互动的作用,那就会导致新规范的出现。

领导国只有通过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互动,才能影响国际规范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15世纪之前世界上有几个相互独立的国际体系,就是因为不同大陆板块上的国家之间缺乏互动。进故此,同时期的不同体系的国际规范是不同的。互动是一个机制,国际规范是通过互动建立的。然而,这并不能确保体系(不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内的所有国家都按相同的行为原则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出反应。

为了理解领导国与其他国家互动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我们需要区分常规互动和非常规互动。符合现行规范的行为属于常规互动,而违

反现行规范的行为属于非常规互动。常规互动能加强现行国际规范, 非常规互动则能改变现行国际规范。国际规范类型的改变是通过国家 间的非常规互动实现的。

要理解领导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是如何影响现行规范的,还需要区分国际规范变化的机制及其结果。文特认为,国际规范内化有三个路径:强制、奖励及合法性。这然而,这种分类混淆了国际规范内化的机制和结果。内化是指有意识的行为变成下意识行为的过程。因此,为了获得奖赏或避免惩罚而遵守规范的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不是下意识的行为。所以,强制和奖励都不是内化的结果,其所体现的是内化过程中的奖惩机制。相比之下,基于合法性的行为才是下意识的行为,体现的是内化的结果,而非内化的机制。

基于上述区别,我们认为,领导国运用其影响力建立新国际规范的最有效方法是促使其他国家赞同,而非强制其他国家服从。领导国的以身作则,可促使其他国家相信遵守其行为原则会对自己有利,这能有力地促进其他国家赞同领导国的行为原则。吉尔平说:"国际体系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靠霸权国的威望和道义领导来维持的。"建在此,笔者用三个机制取代文特的三个路径,并认为所有类型的领导国都是通过这三个机制改变国际规范的。这三个机制是:榜样-效仿机制,领导国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供其效仿;支持-强化机制,领导国奖励那些采取同类行为原则的国家;惩罚-维护机制,领导国惩罚那些违反这些原则的国家。当大多数国家将其行为原则转变为与领导国的行为原则一样时,这种行为原则就演变为国际规范了(见图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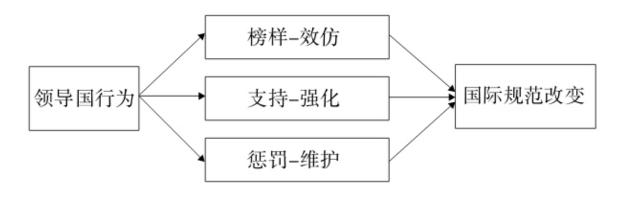


图5-2 领导国改变国际规范的机制

榜样-效仿机制的作用是先使较弱国家信服而后效仿领导国的行为原则。领导国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大的国际权力,这一事实使其他国家相信,领导国的行为原则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它们愿意效仿领导国的行为原则。而且,领导国的样板作用对其互动对象和旁观者有相同的影响。春秋时期,郑国的大臣郑子家曾写信给晋国卿大夫赵宣子,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廷一般来说,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时,领导国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很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遵循道义原则,而若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则可能使其他国家遵循强权原则。前者将道义原则内化为规范,后者将强权原则内化为规范。榜样-效仿机制是巩固现行规范还是建成新的规范,这取决于领导国的行为原则是否与现行规范相一致。

榜样-效仿机制与伊肯伯里和库普钱提出的规范性劝说机制不同。规范性劝说机制在追求奖励和躲避惩罚的本能心理行为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以身作则靠的是较小国家自愿选择是否效仿这种行为原则。换言之,当领导国采取以身作则的领导方式时,它尊重其他国家的自愿选择,并允许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在没有强制威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是否跟随领导国的主张。以身作则与规范性劝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前者要求领导国亲身实践其所提倡的规范,后者则只是说服其他国家遵循某种规范,领导国自身并不必然也遵循这种规范。例如,美国违

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印度进行核合作,但它成功说服其他国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对朝鲜的核试验实施了制裁。

支持-强化是这样一种机制,即领导国通过支持其他国家采取与其所倡导的原则相一致的行为,从而强化其他国家对这一原则的信仰。例如,二战后,美国一贯支持以色列军事攻击其邻国,这一政策强化了以色列对强权政治原则的信仰。另一个例子是冷战后美国在支持其他国家分离主义运动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原则,即支持非西方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但不支持西方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一政策鼓励了其他西方国家在分离主义问题上实行与美国一样的双重标准原则。如果领导国支持其他国家符合现行国际规范的行为,该国际规范就会得到加强;如果领导国支持其他国家违反现行国际规范,支持一强化机制则能使新国际规范取代现行国际规范。

惩罚-维持机制是指领导国对违反其倡导的行为原则的国家采取惩 罚政策。领导国惩罚一个违反现行国际规范的国家, 能起到以增加违 反行为的成本来维护现行国际规范的作用,同时有鼓励其他国家按照 这些规范调整自己行为的作用。例如,1990年伊拉克武力吞并科威 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 原则。 (生)针对这种违反规范的行为,美国于1991年1月发动了海湾战 必须遵守相关的联合国公约。这样的惩罚有助于从两个方面维持现行 国际规范,即防止一些国家信仰与现行国际规范相悖的行为原则,同 时增强它们关于现行国际规范的意识。然而,如果惩罚的是没有违反 现行国际规范的国家行为, 那么领导国的惩罚政策则会削弱其他国家 关于现行国际规范的意识,并使它们更信仰与现行国际规范相悖的原 则。例如,美国因古巴采取的政治制度与其不同,对古巴实行了长达 半个世纪的贸易禁运。这一政策导致拉丁美洲国家质疑基于《联合国 宪章》的不干涉规范, 因此它们对任何发生政变的南美洲国家都采取 军事干预的原则。

上述三个机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领导国之间以及领导国与较小国家之间的常规互动和非常规互动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领导国的行为原则与现行国际规范一致,就形成常规互动,反之则形成非常规互动。前者会加强现行国际规范,后者则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规范。

- 1.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Stephen Krasn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 2. 一些学者将"行为规范"视为对非暴力合作的信仰,笔者则认为将所有国家间的暴力互动都排除在"行为规范"概念之外是不恰当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国进行的军事行动合作有可能符合国际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 3.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146页。
- 4.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8年,第1542页。
- 5. 戴德:《大戴礼记·用兵》,见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 6. Laura Smith-Spark and Barbara Starr, "US Investigates Possible Russia Role in Syria Chemical Attack,"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7/04/07/world/syria-military-strikes-donald-trump-russia/.
- 7.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第728页。
- 8. Buzan an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190-240.
- 9.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68.
- 10.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34.
- 11.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第386页。
- 12. Chen Weihua, "UN Puts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China Daily, March 3,2016,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6-03/03/content_23722823.htm.
- 13.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7页。
- 14. 《世界知识年鉴(1991—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国际规范的类型转变

前两节分别提出了四类国际规范和三个建立新国际规范的机制。本节将运用这些类型来讨论国际领导类型和国际规范类型变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本节还将依据实例讨论国际规范演变的方向。

由国际领导塑造的规范类型

(1) 当国际领导是强权型时,其行为往往会削弱道义规范,促使 其他国家遵循强权政治的原则。强权型领导国经常支持或鼓励其盟国 对敌国采取争斗的立场,这客观上强化了它们对强权政治原则的信 仰。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当强权政策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时,强 权型领导甚至可能以强权行为应对其他国家的道义行为。这样的行为 给坚持道义原则的国家带来严重伤害,从而在客观上弱化其他国家对 道义规范的信仰,促使它们增强采取强权原则的倾向。

(2) 昏庸型国际领导的恃强凌弱行为导致阴谋和欺骗成为规范的行为。昏庸型国家是不负责任的国际领导,恃强凌弱的原则使其对外政策行为前后不一。这与霸权型国家的双重标准原则不同。霸权型国家重视盟国对自己的战略信任,昏庸型国家则很少顾及与盟国的战略关系。由于昏庸型国家缺乏战略信誉,其他国家(包括其所谓的盟友)都不信任它。《左传》中写道: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适昏庸型国际领导不讲战略信誉,而其他国家的实力比它弱,战略利益比它少,于是其他国家就更不会严格履行承诺。在战略信誉无法维持的环境里,战略阴谋和欺骗就会成为流行的国际规范。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时期(前476—前406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国承担过体系领导,多数大国都属于昏庸型。因此,恃强凌弱原则成为当时华夏体系内大多数国家遵循的规范。在陷入内战的国家里,经常盛行着恃强凌弱的规范。例如,民国初期(1911—1928年)军阀混战,2011年以来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一个处于内战中的国家是个无政府体系,这与国际体系的性质相同。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的社会体系中,行为体主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驱动的。

(3)如果国际领导是王道型的,它的行为将符合道义原则,有助于以道义规范取代强权政治规范。领导国的道义行为可使其他国家相信,遵循道义原则有利于国家实力的上升和国家的繁荣。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建这句话意味着,推行道义规范是成为王道型国际领导的必要条件,当然这并非充要条件。王道型国家的基础是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的物质实力并实行道义外交政策。要建立或维持道义规范,领导国需要有能力奖励遵守道义原则的国家,惩罚违反道义原则的国家。故此,奉行道义原则的领导国需要以合法的武力方式建立和维护道义规范。

本书第一章从政府层面对道义下了定义。因此,王道型国际领导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或维持国际道义规范是正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把道义定义为正义的目标而不是非暴力的战略,促进道义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王道领导的军事行为合法化。《吕氏春秋》是春秋后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写道:"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建有一个古代案例可说明这种观点。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第一位王大禹对三个少数民族部落发动了战争。 建墨子是反对一切战争的中国古代和平主义者,连他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建

(4)霸权型国际领导实行双重标准原则,其他国家也照例以道义原则对待盟国,以强权政治原则对付敌国。虽然霸权型国际领导的道义行为有助于推进与盟国互动的道义原则,但也促使双重标准原则成为国际规范。所以,霸权型国际领导为了保持霸权,就得采取道义政策在盟国间建立起战略信誉。正如公元前529年鲁国大臣子服惠伯所说:"夫盟,信之要也。"违为了巩固和扩大同盟,霸权国需要遵循道义原则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霸权型国际领导增强道义规范的机制与王道型国际领导的机制一样,即胡萝卜加大棒。

以强权政治原则为指导的霸权行为,则会促使其敌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从而使强权政治原则成为霸权国与敌国之间的规范。例如,苏联解体后,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切希望加入西方阵营,并按照西方国家遵守的国际规范行事。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利用叶利钦按西方规范行事的机会,向东扩张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以进攻的方式回应俄罗斯对西方规范的向往,这削弱了俄罗斯对西方规范的信任。故此,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恢复了以强权政治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建2008年,格鲁吉亚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南奥塞梯问题,当时北约成员国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俄罗斯不仅出兵格鲁吉亚,而且支持南奥塞梯建立共和国,支持阿布哈兹脱离格鲁吉亚。建

霸权型国际领导所遵循的双重标准原则是由其与盟国和敌国的关系决定的,因此与规范变化的方向没有冲突。通过榜样-效仿、支持-强化、惩罚-维持三个机制,其双重标准行为促使其他国家在决策中也采取双重标准原则,对盟国实行道义原则,对敌国实行强权政治原则。例如,西方国家容忍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不能容忍伊朗的核项目。双重标准行为是与国际体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一致的普遍现象。事实上,双重标准原则不仅适用于霸权型国际领导与其盟国和敌国的不同关系,而且适用于与其相同和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是由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区分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规范。这个条约已被广泛接受,成为核军控领域的全球规范。建

国际规范的演变方向

国际规范类型的变化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这是个关于国际规范演变方向的理论问题。文特把国际规范分为三种类型:霍布斯文化型规范、洛克文化型规范和康德文化型规范指的是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规范,康德文化型规范指的是朋友之间的合作规范。建文特认为国际规范是单向演变的,他说:"在本章结论里,我会讨论随着时间推移产生进步的问题,我认为,虽然不能保证国际时代会朝着康德文化型规范前进,但至少它不太可能倒退。建

文特的线性历史观既缺乏历史证据,也违背了理论逻辑。如果我们只看二战结束以来的欧洲历史,国际规范的演变方向可能支持文特的观点。但是,如果观察更长时间和更广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规范并不是朝着一个进步的终端演变的。先秦时期华夏体系国家间规范的变化是个古代例子。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的主要规范是争霸,当时是禁止兼并他国的。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这一规范便被兼并的规范取代。现代案例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建立了洛克文化型规范,但后来被霍布斯文化型规范取代,而这种规范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冷战结束以来,按照现代标准,美国所提供的国际领导也表现为类型的随机变化。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都展示出了不同的行为原则。克林顿和奥巴马所采取的多边主义遵循的是双重标准原则,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是一种强权政治原则,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属于经济恃强凌弱原则。奥巴马的外交原则是向克林顿政府外交原则的回归,而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外交原则表现为历史的倒退。

国际规范的变化可分为程度变化和类型变化两种。当国际领导的 类型没有变化时,国际规范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程度变化才能出现类 型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一种规范的类型可以保持主导地位长达百年甚 至更长时间。然而,如果认为所有国际规范的类型变化都是程度变化 的结果,那就错了。回顾一下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领导类 型突然变化之后,国际规范的类型会迅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观察 漫长的世界史,以便判断领导类型在国际规范的程度变化和类型变化 中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当崛起国取代前主导国的领导权时,国际规范是有可能发生类型变化的,因为新的领导国可能提供一种不同于之前的国际领导。多数国际领导的转换的确不会改变领导类型,那是因为崛起国和前主导国多是同类型的国家。然而,当新领导国的类型不同于前主导国的类型时,国际规范类型就有了突变的机会。例如,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取代欧洲列强成为全球的领导国。与一战和二战时期的欧洲强权型国家不同,这两个霸权型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都采用了双重标准的原则。美国于1949年建立了北约,苏联于1955年建立了华约,从而把世界分成东西方两个阵营。这为了争夺优势,美苏双方都采取了支持自己盟国和攻击对方盟国的战略。它们的外交政策快速将双重标准原则变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规范。

^{1.} 李维琦标点:《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1988年,第12页,第122页。

^{2.} 同上,第180页。

- 3. 同上。
- 4.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第191页。
- 5.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03页。
- 6. 林品石:《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 7.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册),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 31页。虽然对于夏朝是一个部落还是一个国家存在争议,但对夏禹王与中国西部三个 苗族部落之间战争的记忆并没有任何质疑。
- 8. 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 9. 李维琦标点:《国语·战国策》,第49页。
- 10. 俄罗斯战略形势评估课题组:《俄罗斯强势崛起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2期,第19—24页。
- 11. 朱峰:《俄格冲突的国际政治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1期,第6—12页。
- 12.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第227页。
- 1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49-250.
- 14. 同上,第257—258页。
- 15. 同上,第250—251页。
- 16.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2页,注62。
- 17.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第155页,第 637页。
- 18.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94页。

小结

国际领导的4种类型分别是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它们相应创建的国际规范是道义规范、双重标准规范、恃强凌弱规范和强权政治规范。一种新型国际规范的形成,往往是新领导国与其他国家互动使之内化和社会化的共同结果。非常规互动是指新国际领导与其他国家依据不同于现行规范的行为原则进行互动,这种互动促进新型国际规范的形成。常规互动会巩固现行规范,而不会引起国际规范的类型改变。非常规互动并不一定是战争,国际领导权的和平转移有可能伴随着国际规范类型的和平改变。不过,战争通常能比领导权和平转移更迅速地改变国际规范的类型。无论权力转移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崛起国与前主导国之间的领导类型差别是导致国际规范类型变化的原因。

形成新型国际规范的机制有三个:榜样-效仿机制、支持-强化机制和惩罚-维持机制。在这三个机制中,榜样-效仿机制在新国际规范的形成中起着最根本的作用,因为任何主导国都无法建立起它自己不予以实践的国际规范。支持-强化机制和惩罚-维持机制是通过诱导或强制的方法使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所倡导的规范行事,这两个机制在新规范的社会化和内化方面发挥的作用小于榜样-效仿机制。另外,榜样-效仿机制还能促使其他国家自愿遵循主导国采取的行为原则。要使新的行为原则社会化,即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前提是将其内化。因此,对主导国建立新的国际规范来说,以身作则是比其他两个机制更为有效的方法。

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国际领导类型转变不如相同类型国家间的权力 转移那么频繁,而且转变的方向是朝着更好的领导还是更差的领导也 是不确定的。因此,国际规范演变方向是非线性的,国际规范类型的 每次转变取决于崛起国与前主导国类型是否相同。以往的历史表明国际领导类型和国际规范类型的变化是随机的。虽然以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现行国际规范已经维持了20多年,但它面临着将来被或进步或倒退的新型国际规范取代的可能性。无论自由主义规范在可见的未来是否会改变,任何类型的国际规范都不可能永远不变,这一点是确定的,而规范演变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第六章 国际主流价值观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在第三章中区分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两个事物时,我们已经谈到国际主流价值观和国际规范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由于国际规范是依据国际主流价值观制定的,所以前者的性质将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国际秩序的规范特性也因此随着主流价值观和规范的变化而变化。当崛起国所提倡的价值观不同于前主导国的价值观时,价值观冲突就成为崛起国和主导国两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本书的推论4是,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影响现行国际秩序。本章将依据推论4分析价值观竞争。下面有关价值观竞争的讨论将集中于当前自由主义价值观面临的挑战、即将到来的争夺地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竞争,以及王道价值观现代化的可能性。

价值观的挑战与竞争

纵观20世纪的历史,没有任何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能保持其国际主流地位超过30年。相反,不断有新的现代意识形态获得这种主导地位,如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然而,所有这些现代意识形态对现代国际体系影响的主导地位都没有儒家思想主导华夏体系的时间长。冷战期间,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和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全球性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当时国际秩序的规范特性。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影响了整个国际价值体系,以至冷战后时代被视为自由主义秩序的时代。然而,随着21世纪20年代行将结束,其他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不断上升,动摇了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

自由主义的衰落

由于对自由主义原则既定目标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者提倡的观点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含义各有不同。在美国,自由主义曾是与罗斯福总统倡导的新政中的福利国家政策相关联的,建而在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中也有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思想。建在欧洲,自由主义通常与政府责任和承诺的社会福利有关,而在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曾经被共产主义统治过的国家,自由主义通常与社会主义有关,因此一般称为社会自由主义。建在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指的是西方民主,在经济上指的是市场经济。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任何国家的自由主义一般都肯定平等、自由、民主、民权、世俗政府、国际合作,以及支持这些理念的相关方案。自由主义首次成为显赫的政治运动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先是在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流行起来。20世纪上半叶,西方自由主义从欧洲民主国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主要因为民主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它们拥有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国成为事实上的自由主义的最主要倡导者,其霸权实力使美国自由主义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能影响国际规范变化。《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二款可证明这一点,该款反映了联合国的方针: "发展国际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

冷战期间,由于自由主义被看作直接反对共产主义东方压迫的西方意识形态,所以自由民主政府使整个西欧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这使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得到加强。随着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在与苏联主导的东方阵营的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自由主义成了冷战后的国际主导意识形态。西方世界的胜利使许多人相信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卓越的。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到达了终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使之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注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与很多其他意识形态发生竞争,如保守主义、世俗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等。与福山的预测相反,如今自由主义再次面临新的挑战。2016年,反建制主义的势头兴起。在美国,反建制主义表现为特朗普主义;在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反建制主义被称为民粹主义。违虽然自由主义政党仍在许多国家掌有政权和影响力,但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沉重地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全球地位。

在英国和美国,大众在意识形态上都出现严重分裂,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那种主导地位。

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衰落的根源与其在非西方国家衰落的根源不同。在西方国家,导致这种衰落趋势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主政府未能有效地恢复国内经济,致使民众不满。面对民主政府的低效问题,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政治理论家福山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给予了批评。注《大西洋月刊》负责政治文章的高级编辑尤尼·阿佩尔鲍姆警告称:"随着民主在国外的退却,其矛盾和缺点在国内也已暴露出来,其对后代们的吸引力日益下降······美国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骄傲自满。民主实践是脆弱的,这种实践持续不下去了。"注

例如,美国的年轻人对美国民主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達在二战前出生的人中,超过70%的人高度评价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价值,而在1980年后出生的人中,这一比例下降至不足1/3。 建美国的情况不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衰落。例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于民主价值观的代沟与美国的相似。 建一项对欧洲"千禧一代"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2%的人选择民主作为他们5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之一。 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断试图改革自由主义,以至现在有些人将他们的政治理想称为"自由进步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自称为"进步自由主义者"。 建

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崛起国慢,再加上前者的外交政策是双重标准,这导致非西方国家中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失去影响力。在经济方面,与西方政府相比,全球的"千禧一代"比其长辈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其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更倾向于持肯定的态度。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制定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对国家的未来进行巨额投资,这使他们日益倾向于非民主的政府形式。2011

年,几乎半数的全球"千禧一代"认为,强人领导比民主议会和民主选举更为可取。注

此外,人们对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外交政策的印象,使自由主义变得更难流行。例如,西方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在该地区促进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一致。尽管沙特阿拉伯政府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君主政体,具有毫不遮掩的不民主的性质,但因为它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美国就一直坚定地支持它;相反,自2011年所谓的叙利亚起义以来,美国一直反对叙利亚的世俗政府。此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还扩展到支持沙特阿拉伯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干预,这表现为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用军事力量镇压也门和巴林的反政府武装。"阿拉伯之春"运动承诺将阿拉伯世界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结果却是建立新的独裁政权,而非自由民主的政府。注事实上,定量研究显示,美国军事干预和经济干预都更有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外国的人权,注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东地区更可能是衰落而不是兴起。

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竞争

自由主义正在失去其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地位,这给其他意识形态创造了竞争影响力的机会。下一个国际主流价值观有可能来自一个比美国取得更大政治和经济成就的国家。展望未来10年,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有潜力缩小与美国综合实力差距的国家,差距小到足以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如今,民主国家的民众把中国看作一片充满机会并有上行经济实力之地,如同当年欧洲人看待美国一样。这因此,许多国家的民众担心当前的自由主义秩序被按中国价值观建立的新秩序取代。这里斯蒂安·雷乌斯—斯米特确实说过:"权力向东方转移使人们恐惧那个非西方大国会试图以其自己的价值观和常规重塑国际秩

序。" 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自乔治三世以来,一个非西方和非民主的国家将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将如何行使其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权力? 它会接受战后秩序的文化、规范和结构吗? 我认为这是21世纪上半叶唯一的核心问题,这不仅仅是亚洲而是整个世界的核心问题。" 违

2017年,中国政府宣布了在2035年之前大幅增强其软实力的计划,公开表示中国的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建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政府宣扬其官方意识形态并发挥全球影响力的愿望。行动上,2017年10月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向国外派遣了约30个国际宣讲团,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介绍其纲领与主张。建然而,中国的意识形态情况是复杂的。首先,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普通民众的世俗价值观不一致;其次,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被说成是指导国内政治生活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同于适用于外交政策的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之,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有如下4种意识形态竞争其影响。

- (2)经济实用主义是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政治改革后中国政府和大众最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随着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在中国经济繁荣成为人们判断意识形态合理性的标准。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为经济实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虽然中国政府自2013年以来不再把经济增长视为第一优先,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经济是综合实力的基础,因此拥护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的思想。在中国,经济实用主义的合法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即经济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实用主义与史蒂夫•班农所代表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在外交政策制定上,二者都是从经济角度界定战略利益,并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往来
- (3)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党总书记时期是中国最流行的意识形态。那时,自由主义指导着各领域的改革,主要是模仿美国的模式。如今,自由主义只流行于知识分子之中。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虽然停顿了,但其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在冷战后仍有影响力,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韬光养晦,这一原则反映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力下降;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自由主义对外交决策就没什么影响了。2013年,"奋发有为"取代"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原则,这标志着自由主义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终止。注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出于实用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对其政策有任何影响。只要中国继

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会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4) 传统文化派虽然不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影响力在中国普通 民众、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都显现上升趋势。传统文化派并不只是指 儒学,而是指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流派的集合。虽然中国古代思想流派 之间存在分歧,但每个学派都强调政治领导与战略信誉在巩固和维持 领导地位中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所有流派都认为霸主的对外政策应 该优先考虑其战略声誉。故此,古代"王道"思想促进了决策中的仁 义价值观。建传统文化派提倡以身作则的策略,因为领导具有示范效 果,所以传统文化强调领导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形态鼓励中国承担更 多的国际安全责任,特别是承担为邻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责任,以提高 其国际战略声誉。

虽然传统文化派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传统文化派的学者和中国政府都一致认为,应该用中国传统政治智慧而不是任何源于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外交政策。例如,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白皮书,该文件明确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详明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是客观因素,"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则是主观因素。这份官方文件反映了中国政府考虑以传统政治价值观指导外交政策的意向。中国政府在2013年将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从"韬光养晦"改为"奋发有为",但是它仍保留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指导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例如,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领导人依据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解释了新的外交政策,如"亲、诚、惠、容"。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再次使用这4个汉字。注

除了前面提到的外交政策方针的变化,中国还将其外交姿态从普通国家调整为大国,这表明政府对中国实力地位的看法改变了。在

2013年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变化:"中国外交的特色,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着宝贵精神财富。"注

不管这些与人为善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在实际政策中得到应用, 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至少在口头上宣称要以这些思想为指导,而且中国领导人政策演讲稿中普遍引用中国古代警句。由于经济 实用主义在普通民众和官僚之中很有影响力,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中国 传统价值观与经济实用主义混合为一引导中国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1.}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1933-1935,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3), 186-88.

^{2.} Jamie Peck, "Remaking Laissez-Fai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 no.1 (2008): 3-43.

^{3.} Susanne Soederberg, "From Neoliberalism to Social Liberalism: Situating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 within Mexico's Passive Revol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8, no. 3, (2008): 104-23. 另见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1, no. 4 (1995): 447-72。

^{4.} Clause 2, article 1 of Chapter I: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http://www.un.org/en/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retrieved on September 11, 2017.

^{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16 (1989): 4.

^{6.} Jeffrey Tucker, "Trumpism: The Ideology," Beautiful Anarchy, July 14, 2015, https://tucker.liberty.me/trumpism-the-ideology/.

- 7. Tony Blair, "Is Democracy Dead? Tony Blair: For True Democracy, the Right to Vote Is Not Enough,"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14, www.nytimes.com/2014/12/04/opinion/tony-blair-is-democracy-dead.html; Francis Fukuyama,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merican Interest, December 8, 2013,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2/08/the-decay-of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
- 8. Yoni Appelbaum, "Is the American Idea Doomed?," Atlantic, November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11/is-the-american-idea-over/540651/.
- 9. Catherine Rampell, "Trump's Good Political Timing: Younger Americans Are Shunning Democrac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onald-trumps-good-politicaltiming/2016/08/15/21a0e264-6301-11e6-96c0-37533479f3f5_story.html?utm_term=b45d52ca32bd..
- 10. Appelbaum, "Is the American Idea Doomed?"
- 11. Neil Howe, "Are Millennials Giving Up on Democracy?" Forbes, October 31,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neilhowe/2017/10/31/aremillennials-giving up-on-democracy/#759224152be1.
- 12. 同上。
- 13. Keith A. Spencer, "A Wrestler Called 'The Progressive Liberal' Is Riling Appalachian Crowds, but the Sport Is a Mirror for Politics throughout America," Salon, June 30, 2017, https://www.salon.com/2017/06/29/theprogressive-liberal-wrestler/; Randall Smith, "Liberal Progressivism's Presumption," For Public and Tradition, July 5, 2017, http://angelqueen.org/2017/07/05/liberalprogressivisms-presumption/; Justin Campbell, "Liberal or Progressive? Can' t Ве Both, "Spectator, September https://www.spectator.com.au/2017/09/liberal-or-progressive/.
- 14. Howe, "Are Millennials Giving Up On Democracy?"
- 15. Mark L. Haas and David W. Lesch, "Uprising in the Arab World: Tyranny, Anarchy, and (Perhaps) Democracy," in The Arab Spring: The Hope and Reality of the Uprisings, ed. Mark L. Haas and David W. Lesch (Boulder, CO:Westview, 2017), 1-10.
- 16. Seung-Whan Choi and Patrick James, "Are US Foreign Policy Tools Effective in Proving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3 (Autumn 2017): 350.

- 17. Appelbaum, "Is the American Idea Doomed?"
- 18. Peter Harris, "China in British Politics: Western Unexcept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3 (Autumn 2017): 242.
- 19. Christian Reus-Smi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no. 4 (Fall 2017): 881.
- 20. Kevin Rudd, "The West Isn't Ready for the Rise of China," New Statesman, July 11, 2012,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internationalpolitics/2012/07/kevin-rudd-west-isnt-ready-rise-china.
- 2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
- 22. 侯露露:《发展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人民日报》2018年2月2日, 第3版。
-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4版。
- 24.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第247页。
- 25. Robert Kuttner, "Taking Bannon's Economic Nationalism Seriously,"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21, 2017, http://prospect.org/article/takingbannons-economic-nationalism-seriously.
- 26.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165-70.
- 27. 陈向阳、张新民、蒋庆、白雪:《王道与现今中国之外交:改造务实王道外交 古为 今 用 》 , 凤 凰 网 , 2011 年 4 月 15 日 , 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wangdaoluntan/shendu/detail_20 11_04/15/5769768_0.shtml; 孙茹:《推进"王道"外交正当其时》,《环球时报》,2013 年 4 月 1 日 ,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1/3486363.html。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24页。
- 29. 钱形:《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 26日,第1版。

- 3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 5版。
- 31. Wang Yi, "Exploring the Path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10 (Autumn 2013):14.

战略信誉的贬值

当前,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呈衰落之势,中国国内的多种意识形态处于竞争状态,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出现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的世界。只要特朗普政府继续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同时无法使美国的实力增长快于中国,那么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战胜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恢复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除非中国采取王道原则,否则中国也不太可能提供一个为全世界所接受的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目前,最大的可能性是,没有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其他的主要意识形态争夺在某一地区或某类国家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国家的分类是多样的,有些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有些是按政治制度或文化相似性划分的,有些则是按经济规模划分的。

没有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

第四章分析了以中美为首的两极化趋势,中美两国将继续扩大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这种趋势意味着,除了美国和中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力用一种新意识形态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从集体的实力角度说,除非美国和中国合作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像弗雷德·贝格斯滕提出的"G-2"或尼尔·弗格森提的"中美国"(Chimerica),适否则任何集团都不具备以一种新意识形态取代自由主义全球影响力的潜力。根据推论4,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零和关系,因此无法想象它们能联合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尽管特朗普政府推行反建制主义,但反建制主义几乎不可能在西 方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成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更不可能了。 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大大削弱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它还没有盛行到足以压倒自由主义的程度。虽然多数美国人还是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来区分他们的政治身份,但是美国人现在也越来越倾向于以自由派或非自由派来区分。这种现象意味着自由主义仍然是反建制主义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由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在美国取得绝对优势,所以在国际上就更不可能了。阿佩尔鲍姆说:"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世界的楷模了,它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在国内,左翼批评人士反对美国担任特殊角色的观点;在右派中,民族主义者力图以文化而非原则来界定美国的身份。"

反建制主义不仅在美国内部分裂了美国人,而且破坏了西方的政治团结。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者将国际条约和协定视为和平与安全的必需品。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多边的自由主义机制为基础,建立了其世界领导地位,而多边自由主义机制主要依赖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在反建制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一个又一个地退出此类机制,如《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及最近废除的与伊朗的核协议。这些政策疏远了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使美国无法借助西方国家的集体支持来建立一套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竞争和美国内部的意识形态竞争具有类似的作用。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的意识形态竞争也会使中国在未来10年里无法为世界提供一种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大国建立影响全球的意识形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这种意识形态在国内是政府和人民都信仰的。中国目前有4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但任何一种都无法获得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也是党的十九大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建中国政府认识到,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广一种意识形态,首先需要在国内将这种意识形态培育成大众实践的价值观。因此,中国政府试图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建立一种普世的意识形态。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 适在党的十九大的小组讨论会上,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将这一想法概括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 适然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不一致的,前者主张和谐,后者主张斗争,所以将两者融合起来并非易事。

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一些国家的政治文化能使其愿意接受大国提出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一些国家很可能会仿效中国的经济政策,但是不太可能仿效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根据中国2018年修改后的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建这种判断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模式取得成就的前提,非共产主义国家仅仅照搬中国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取得同等成就的。目前,包括中国的邻国在内,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很少国家的在野共产党有获得国家政权的潜力。

中美两国不但缺乏建立全球性意识形态的能力,而且两国政府对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犹豫不决。中美两国都知道意识形态对抗是冷战的核心原因,因此迄今为止双方都有意限制竞争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做法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做法完全相反。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称:"我们不会试图用武力推行我们的生活方式。"往在国际媒体把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为中国要向世界推广其模式后,中国政府迅速宣布"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往

由于美国和中国都无力在未来10年中提供一个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未来的两极世界将可能与冷战时期不同。这个两极世界将不是两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而可能是万花筒式的多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是地区主导地位或对某类国家的影响力。例如,什叶派和逊尼派将竞争在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将竞争在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主

要是在欧洲国家争夺选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继续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竞争;国家主义和公民主义将在发展中国家竞争大众的支持;共产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将在共产主义国家竞争影响力;宗教和世俗主义将在政教合一国家争夺权力。

缺乏战略信誉的个人决策

未来10年,由于中美两国既不可能独自也不可能合作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国际秩序的规范特征将可能由大国决策的共同特点来塑造。随着当前自由主义的衰落,不仅出现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且在一些大国出现了个人决策的现象。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注意到:"一批强人已经当选统治者,显然其中许多人是非西方人,包括日本的安倍晋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以及俄罗斯的普京。"建虽然特朗普没有列在这个名单里,但他实际上应排在第一位。强人统治浪潮与自由主义的衰落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这还需进一步研究,不过,显而易见,这些领导人倾向于个人决策而非集体决策。

由于个人决策机制现象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中都出现了,因此我们应该从领导层面而非国家或制度层面来分析个人决策机制的特点。在个人决策机制中外交政策也是由一个领导小组而非一个人决定的。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的核心区别突出地体现在机构可行性研究和决策的次序上。前者在决策之前进行可行性研究,后者则相反。个人决策的次序常是,最高领导人和少数心腹磋商后先做决策,然后责成相关机构研究执行该决策的最佳方案。这种类型的决策会削弱国家的战略信誉,并从多方面增加国家间的相互猜疑。

(1) 一国前后不一的政策会降低其他国家对该国政策和承诺的信任。由于缺乏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个人决策机制必然比集体决策机

- (2)政策激进的国家总是怀疑政策较理性的国家,不愿意进行合作。集体决策允许政府职能部门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最终的决策经常是根据不同的政策建议做出平衡的综合决定。相反,个人决策没有这样的调和余地,因为最高领导人不屑技术官僚们提出的不同见解。缺乏专业人员参与决策,就很有可能做出激进的决定,对之前激进政策的调整政策则可能也是激进的。例如,虽然印度总理莫迪在2015年5月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签署了24项协议,建但在2017年6月,他突然派部队越过中国和不丹的边界,阻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道路建设。建这一激进的决定导致中国和印度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军事对抗。从此,中国的对印政策就变得较为强硬。多数采取激进外交政策的大国总是怀疑其他国家的合作倡议,采取恐吓的策略应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春季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冲突中相互威胁要进行贸易报复。建
- (3) 大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国家间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 个人决策的根源在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这一利益压倒了国家利益。当维护国家利益有损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时,他将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保护其个人权力。例如,2016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

未遂政变后突然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他确信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 這一国的国家利益较容易被其他国家判断,而一国最高领导人对其个人权力的思考则较难被其他国家了解,因此由领导者个人利益驱动的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低于由国家利益驱动的外交政策。当多数大国盛行个人决策机制时,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会导致各国措手不及,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互猜疑和不信任。

阴谋与秘密外交的普遍化

第五章以一些历史案例说明国际规范是有可能向强权政治方向倒退的。鉴于阴谋思维开始显现,未来10年世界似乎将再次出现国际规范的倒退。在当前的两极化过程中,这种阴谋思维将表现为不执行国际规范、违反协议,以及不遵守国家间的承诺。自2017年以来,朝鲜核问题一再显示了相关各方在此问题上的阴谋心态。

特朗普的朝核政策在军事解决和外交谈判之间摇摆不定。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出席韩国平昌2018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将绝不与朝鲜代表团进行任何交流。在开幕式上,彭斯不与坐在旁边包厢的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打招呼。他后来说:"我认为在那种场合,美利坚合众国不应该对那个不仅是独裁者的妹妹而且是领导宣传工作的人给予任何表情或关注。"建事实上,彭斯在平昌安排了一次与朝鲜代表团团长的秘密会晤,但朝鲜后来放弃了这次会晤,这使彭斯一回国就遭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严厉指责。建

中国的朝核政策也有点儿令人难以理解。2017年4月初中美海湖庄园峰会后,中国支持美国提出的对朝制裁措施。中朝原本不太和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018年1月,《环球时报》公开批评金正恩威胁用核武器摧毁美国。进两个月后,中国在3月却突然公开邀请金正恩访问北京,《环球时报》也180度大转弯,宣扬要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建

中朝峰会后,中国媒体援引金正恩的话: "如果韩国和美国以善意回应我们的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半岛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违与此同时,朝鲜媒体用英语播出了一部40分钟的专题纪录片,却没有提到无核化。 违由于双方对峰会的报道都没有实质性内容,媒体对峰会做了各种猜测。

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也采取了前后不一的政策。例如,俄罗斯在2017年12月22日投票赞成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几天后,俄罗斯向朝鲜走私石油的油轮被扣。

根据第五章讨论的榜样-效仿机制,领导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行为 具有榜样作用,将影响较小国家的外交行为。中国古人注意到弱者会 效仿强者的行为,他们将其编成东施效颦的故事。如今,领导国这种 前后不一的政策,会促使国际社会形成推崇搞阴谋的风气。大国的外 交行为是不负责任和不可信任的,国际社会就会盛行秘密外交而非公 开外交,崇尚搞阴谋而非对话,倾向进行制裁而非谈判,采取贸易保 护主义而非自由交易原则,推崇政治欺骗而非战略信誉,采取军事霸 凌而非战略威慑,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

大国政策缺乏可信性将削弱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化的意愿。大多数国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或威胁,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分配应对这些问题和威胁的责任。当领导国对全球治理不认真负责时,它们就没有信誉,较小的国家也就不会相信参与全球治理可以受益,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多边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其目标。于是,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小国将比以往更加珍视自己的主权。这是很有可能的,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组织都已普遍出现权力分散的现象。

^{1.}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8-06-

- 01/partnership-equals; Niall Ferguson, "Not Two Countries, but One: Chimerica," Telegraph, March 4, 2007, 12:01a.m. GMT, https://www.telegraph.co.uk/comment/personalview/3638174/Not-two-countries-but-one-Chimerica.html.
- 2. Appelbaum, "Is the American Idea Doomed?"
- 3. Payman Yazdani, "Prof. Baker: US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pportunity for China, Iran," MEHR News Agency, October 25, 2017, 10:36. a.m., https://en.mehrnews.com/news/128939/US-withdrawal-from-intltreaties-opportunity-for-China-Iran.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 3版。
- 5. 同上,第4版。
- 6. 覃贻花: 《王岐山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四川新闻网,2017年10月20日,http://china.newssc.org/system/20171020/000825735.html。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网,2018年3月22日, http://sz.people.com.cn/n2/2018/0322/c202846-31369478.html。
- 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p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 9.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 主 旨 讲 话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政 府 网 , 2017 年 12 月 1 日 , http://www.gov.cn/xinwen/2017-12/01/content_5243852.htm。
- 10. Kishore Mahbubani, "How Strongmen Coopted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opinion/strongman-world-democracy.html?mcubz=0&_r=1.
- 11. Keren Yarhi-Milo, "After Credibil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68-69.
- 12. "24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during PM Modi's Visit," NDTV.com, May 15, 2015, 10:34, https://www.ndtv.com/cheat-sheet/24agreements-signed-between-india-and-china-during-pm-modis-visit-763246.

- 13. Steve George and Anish Gawande, "China and India in War of Words over Bhutan Border Dispute," CNN, August 25,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7/03/asia/bhutan-india-border-dispute/index.html.
- 14. Joe McDonald, "China Retaliates against Proposed US Tariffs by Targeting\$50B in American Soybeans, Other Goods," NBCDFW.com, April 4, 2018,3:57 a.m., https://www.nbcdfw.com/news/national-international/China-VowsSame-Strength-Measures-Against-US-Tariffs-478730033.html.
- 15. Efe Tanay, "What's behind Turkey's Sudden Rapprochement with Russia?," Russia Direct, August 10, 2016, http://www.russia-direct.org/opinion/whatsbehind-turkeys-sudden-rapprochement-russia.
- 16. Sandy Fitzgerald, "North Korea Media Mocks Pence for Not Interacting with Delegation," Newsmax, February 17, 2018, 1:02 p.m., https://www.newsmax. com/newsfront/north-korea-vice-president-mike-pence-olympics-kim-yojong/2018/02/17/id/843971/.
- 17. "North Korea Canceled Planned Meeting with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elegraph, February 21, 2018, 1:38 a.m.,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2/21/north-korea-canceled-planned-meeting-us-vice-presidentmike/.
- 18. 《比赛谁的核按钮大,世界本不该这样》,《环球时报》,2018年1月4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1/11495595.html。
- 19. 《传承友谊是中朝共同受益的大战略》,《环球时报》,2018年3月28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3/11704002.html。
- 20. 张樵苏:《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新华网,2018年3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28/c_1122600292.htm; Harry J. Kazianis, "The North Korea-China Summit: Did Kim Ask Xi for Help with His Trump Meeting? Here's What May Have Happened," Foxnews, March 28,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3/28/north-korea-china-summit-did-kim-askxi-for-help-with-his-trump-meeting-here-s-what-may-have-happened.html.
- 21. Christopher Scoll, "N Korean Media Coverage of Kim's Trip to Beijing, in English," Asia Times, March 31, 2018, 4:43 a.m., http://www.atimes.com/article/n-korean-media-coverage-kims-trip-beijing-english/.

22. Nicole Gaouette and Elizabeth Joseph, "UN Adopts Tough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CNN, updated 13:27 GMT, December 24,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12/22/politics/un-us-north-korea-resolution/index.html; "Russian Tankers Have Smuggled Oil to North Korea, a Breach of U.N. Sanctions," NBC News, December 30, 2017, 5:53 a.m.,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russian-tankers-have-smuggled-oil-north-korea-breach-u-n-n833531.

超越自由主义

上一节分析了自由主义的衰落以及个人决策机制在大国的盛行,这两个现象体现了国际价值观的倒退趋势。不过,任何类型的国际领导都不可能是永久性的,这就使进步的国际领导有机会在未来出现。当前的中美两极化意味着两件事,即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将两国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可建立起一种比自由主义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雷乌斯-斯米特提出,国际规范是根据相关原则建立的,相关原则并非都是同一类的,可以是不同类型原则的组合。进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具有全球性影响,而中国正式宣称要用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来指导其外交政策,所以"千禧一代"的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可能学习对方的价值观建立一种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因此,本节将讨论关于自由主义的三个价值观(平等、民主和自由)与中国的三个传统价值观(仁、义、礼)进行结合的可能性。

仁与平等的融合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社会规范,仁之精髓为治理原则,呼吁国家领导人同情和关怀人民。因此,它用于管理不对等的人际关系,如强者对弱者的关系、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从而减少由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差异引起的社会冲突。由于国际体系的成员按实力分为不同等级,不讲仁的平等原则势必使实力较弱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这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就会不断争打,以获取平等权力。

通过将平等与仁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使公平成为一个普遍的全球性的价值观。比如,"先到先得"是个绝对平等的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上公交车能有座位,但这对年老或体弱的人是不公平的。依据公平的规范,无论是否排在队伍前面,身体好的人都要把座位让给那些更需要座位的人,这样就解决了后来的弱者无座位的问题。奥运会拳击比赛规则也是个人们熟悉的例子。为了确保平等,已有的规则是,被击倒的运动员在裁判数到10的时候还站不起来被判为失败。然而,为了确保公平,要根据体重将拳击手分成不同的等级,这样给不同体重等级的拳击手平等的获得冠军的机会。在这个

例子中,将拳击手进行重量分级是裁判员根据选手在比赛中所表现的 技能做出公平判断的前提。

义与民主的融合

义是包括儒家、道家和墨家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哲学流派共同的道德准则。义虽有宽泛的内涵,但其核心是指正直、合理、得体的行为。孟子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建换言之,只有选择正义的路才能实施仁慈。义和民主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政策的结果,而后者强调政策的合法性。艾利森说: "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是政府唯一的正义形式:政府的权威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在中国通常不是这样,人们一般认为政府是否有政治合法性要看其执政效果。" 建事实上,许多非正义的结果都源于合法化的政策。例如,建立联合国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由大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主导的机构。这些大国会利用否决权破坏联合国的民主规则,以实现其特有的非正义目的。

义的原则要求形式和结果都得是正义的,这有助于抑制主导国的非正义行为取得合法性。把民主和义融合起来,可以推广义的价值

观,有助于保证国际组织的决议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其结果是正义的。当两者整合为一时,正义便树立起来。例如,在冷战期间,多数国家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实施了制裁。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通过的决议支持这种制裁,这些制裁行为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反对种族隔离具有正义性,符合义的原则。民主与义两者相结合,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制裁行为不被视为干涉内政。注

如果将正义和民主进行比较,正义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是比民主更为有用的价值观。同时,正义并不排斥民主,而是通过民主获得支持。事实上,正义可以把民主作为手段,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同时还可防止产生不正义的后果。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关于正义的原则:一是自由平等,二是机会均等和差别待遇相结合。原则二旨在实现以公平价值观为基础的正义,但这单靠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建因此,除了用民主程序来保障主导国行为的合法性外,还需要按照义的原则对决策进行评估,以确保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正义的。例如,由于全球化是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促进共同发展,就得优先考虑正义原则,而非民主原则。单凭民主原则只能确保每个国家,不论其财富多寡,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各自的发展方式。相比之下,正义的原则呼吁消除或者减轻贫富两极分化,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当于其GDP 0.7%的经济援助。建

礼与自由的融合

体系中,都存在个体自由与群体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垄断暴力可以在国内体系中执行社会规范,但如果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也用暴力维护其利益,暴力冲突和混乱就必将盛行。因此,各国的自由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平衡问题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礼是文明的基础,在推动人类生活进步方面,礼的社会重要性超过了自由的原则。人类珍视生命的意义,所以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不是追求自由的程度之别,而是人追求自由是为了有意义的目的。礼有助于引导人类行为文明,从而增加人类生命的意义。没有文明约束的自由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向动物世界的自由倒退。荀子说:"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进中国文化将乱伦和虐待老人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视为禽兽的恶行。人类的文明在于区分社会善恶的能力。例如,所有的动物都有排便的自由,但是人类的文明禁止人像动物一样随地大小便。人类因为文明不断进步,而其他动物却永远处于未开化状态。东西方的礼仪在习俗和仪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遵守礼仪是共同的社会规范。

虽然控制自然资源是崛起国和主导国权力之争的一部分,但是在21世纪,创新已经成为积累财富的最主要方法,这极大地减少了控制自然资源的需要。因此,中美两国建立一些文明规范,以和平方式竞争全球主导权是可能的。在历史上,世界权力的转移常常伴随着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是国际社会不文明的典型表现。依据文明的价值观建立国际规范将有助于减少包括崛起国和主导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在建立新国际规范的过程中,将文明的价值观具体化,不仅能超越自由主义,而且能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1.} Reus-Smi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855.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 7, and 8.

^{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Human Natur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268.

^{4.} 具体定义请见John E. Roeme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27。

^{5.} Rosan Smits et al., "Revolu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tate, Factions and Violence in the New Libya," Conflict Research Unit,

- Clingendael Institute, September 2013, 40-55, https://www.clingendae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Libya%20-%20Revolution%20and%20its%20discontents.pdf.
- 姚天冲、于天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社会科学辑刊》 6. 2011 99-101 年 第 1 期 第 页 http://wenku.baidu.com/view/75135a8dd0d233d4b14e6989.html。《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3款规定,"附件二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 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支付议定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为履行第十二条第1款规定的 义务而招致的全部费用。它们还应提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需要的资金,包括用于技术 转让的资金,以支付经议定的为执行本条第1款所述并经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同第十一条 所述那个或那些国际实体依该条议定的措施的全部增加费用。这些承诺的履行应考虑到 资金流量应充分和可预测的必要性,以及发达国家缔约方间适当分摊负担的重要性。"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 7. 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 8.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第953页。
- 9. Graham Smith and Corinne Wales, "Citizens' Jurie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8 (2000): 52.
- 10.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1997):155-83.
- 11. Peter Taylor, "Iraq War: The Greatest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Living Memory," Telegraph, March 18,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q/9937516/Iraq-war-the-greatest-intelligence-failure-in-livingmemory.html.
- 12.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86.
- 13. 同上,第85页。
- 14. 韩晓明、青木: 《美媒: 叙利亚战争导致了21世纪最严重的人道灾难》, 环球网, 2017 年 4 月 6 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4/10430595.html。
- 15. 王常则译注:《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183页。.
- 16. Graham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7, 84.
- 17. Franscis Njubo Nesbitt, Race for Sanctions: African Americans against Apartheid, 1946-199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9.

- 18.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60-61.
- 19.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ugust 2016, http://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6/01/ODA_OECD-FfDO_IATF-Issue-Brief.pdf.
- 20. 见Steve Paulson et al., "The Moral Animal: Virtue, Vice, and Human Natur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52,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nyas.13067/epdf。
- 21. Charles Horton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422-23.
- 22.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载姚有志、阎啓英主编:《中华三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 23. 陈克勤: 《〈穆斯林的无知〉风波的背后》, 《光明日报》, 2012年9月22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2-09/22/nw.D110000gmrb_20120922_5-08.htm?div=-1。
- 24. 林丰民:《〈查理周刊〉事件及其诱因》,《学习时报》,2015年1月12日,第A2版,http://www.cssn.cn/fx/fx_rdty/201501/t20150114_1479355.shtml。
- 25.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73页。
- 26.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81.
- 27. 同上。
- 28.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5.

小结

国际主流价值观对建立国际规范具有指导作用。依据这一准则,自由主义衰落不可避免地会使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同时使在美国指导下建立的当前的国际规范受到挑战。拥有30年的主导地位之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与其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美国的反建制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东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流行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当前国际格局两极化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力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未来10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众多不同意识形态竞争的两极世界,这些意识形态将竞争地区的主导地位或竞争对某一类国家的影响力。目前,个人决策机制在大国中流行,这导致了历史倒退趋势的出现。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将更偏好秘密外交而非公开外交,更偏好搞阴谋而非对话,更偏好进行制裁而非谈判,更偏好贸易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原则,更偏好政治欺骗而非关注战略信誉,更倾向于军事霸凌而非战略威慑,更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各国将比以前更重视主权和特权,而不那么欢迎全球治理和区域化。

虽然未来10年可能是一个规范秩序倒退的两极世界,但在中美两国的"千禧一代"掌握国家权力后,他们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先进的领导。目前,美式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仍然大于其他意识形态,中国的崛起将增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国际影响。这两个因素为将中国传统的仁、义、礼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相结合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它们成为现代化的公平、正义、文明。最终,将这些价值观融合起来,是有可能使之成为不同国家人民都接受的普适价值观的。

第七章 国际体系转型

故可以有夺人国, 不可以有夺人天下。

荀子

虽然"国际体系转型"的说法在国际关系论著中经常出现,但是有关国际体系转型的定义很少。事实上,这个短语被人们用来随意指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范或国际行为体的变化,而并不是指整个体系的变化。这种不加区分的使用在学术上混淆了体系变化和体系构成要素变化,也导致体系变化的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历史表明,崛起国的成功往往带来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或国际规范的变化,但大国成功崛起只是偶尔带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带来国际行为体类型变化的现象则更为少见。故此,本章将先区分体系变化和体系构成要素变化,再分析国际领导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由于体系转型涉及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领导类型这些因素的变化,因此本章以第三章讨论的4个推论为基础分析体系转型问题。

构成要素变化与体系转型

由于没有公认的体系转型的判断标准,国际关系学者对冷战后的国际变化有着相互对立的见解。一些学者把这种变化称为"国际体系转型",另一些学者则称之为"国际格局变化"。2006年,资深政策研究员和外交官杨成绪先生强烈主张,冷战后带来了权力格局的改变,而非体系转型。建其实,国际体系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唯一区别只是格局不同。国际格局从两极变为了一极,但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仍然与冷战时期相同。由于有些人将目前的两极化误判为国际体系转型,这种误解又出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实力差距明显缩小,国际格局出现了两极化趋势。有些人把这一格局变化视为国际体系转型,甚至把它称为"500年来的第三次大转型"。建然而,这样就无法对当前的变化是国际体系整体发生了变化还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做出合理判断。

构成要素变化不等于体系转型

国际关系文献中有许多论著是关于国际体系的,包括中国先秦的 五服体系、17世纪前东亚的朝贡体系、1648年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19世纪欧洲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然而,这些国际体系并不是依据一个公认的标 准来界定或分类的,而是根据大国之间的历史事件主要是权力转移来 界定或分类的。回顾一下戴维·辛格、华尔兹、文特,以及巴里·布 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等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体系的不同解释,我们会 发现人们对"国际体系"这一概念的认识是存在分歧和争议的。

华尔兹把体系定义为"一组互动的单位。在一个层面,体系包括 了一个结构,结构是体系层面的构成要素,这个要素使单位能形成一 个组合体,而不仅仅是聚到了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体系包含了互动 规范也是体系的构成要素, 因为单位是按照体系内的一套规范进行互 动的。罗伯特•芒德尔和亚历山大•斯沃博达说:"体系是一个不同 实体的集合体,通过有规律的互动,按照某种控制的形式统一起 来。" (注)国际体系的各种实体单体包括国际行为体, 主要是国家, 而 控制的形式可以包括非正式的国际规则和正式的国际法。斯坦利•霍 夫曼将一套权利和规则视为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影响 的一套制度结构, 这套制度结构为当时规划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对外关 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作为国际体系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参 见图3-2)。虽然对于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已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 应该用这三个构成要素中的哪一个对国际体系特征进行分类这一问 题,还没有共同的学术标准。故此,学界就缺乏一个判断国际体系是 否发生了转型的共同标准。

许多学者把国际格局的变化(主要是大国实力结构的变化)看作国际体系的转型。这例如,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的变化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转型。这然而,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主要国际行为体都是民族国家,国际规范都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规范。在国际体系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中,只是国际格局从两极变成了一极。如果将国际格局变化等同于国际体系整体的转型,那么区分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除了语义方面的考虑外,不能把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混为一谈的最主要原因是,将构成要素变化等同于体系变化将导致研究人员无法区分部分和整体。

吉尔平意识到构成要素变化不等于整个体系变化,他根据国际体系三个构成要素的变化来区分国际体系中的三种变化:"体系变化"是指体系中行为体的性质变化,"有关体系的变化"是指体系的控制形式的变化,"互动变化"是指体系中行为体互动的变化。建吉尔平书中的"体系变化"、"有关体系的变化"和"互动变化"分别等同于本书中的行为体变化、格局变化和规范变化。进他把有关体系的变化和互动变化定义为体系内部的变化,但是把体系变化即行为体变化定义为国际体系的性质变化。进他说:"国际体系的性质是由最主要的实体——帝国、民族国家或跨国公司决定的。"建然而,他把行为体变化定义为体系性质变化,这同样混淆了构成要素变化与体系变化,就像把格局变化当成体系变化一样混淆了部分与整体。

比较一下学术界所说的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有助于我们理解构成要素变化与整个体系转型之间的关系。表7-1是学界常说的一些国际体系及其行为体、格局和规范的一览表。在该表中,行为体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而不是所有国家,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影响国际体系的性质。

在表7-1中,一些连续的国际体系,其构成要素的类型都是相同的,如反法兰西联盟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然而,另一些连续的国际体系,其构成要素的类型却有一个或两个不同,如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些学术上所称的国际体系是否都有独立性,因为有些很可能是上一个国际体系的延续。仔细观察表7-1中三个构成要素的类型变化与体系转型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判断体系转型的客观标准。仔细阅读该表,我们可以发现三点。

表7-1 学术命名的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

国际体系	国际行为体	国际格局	国际规范
华夏			
西周 (前 1046—前 771 年)	天子国和诸侯国	一极	分封
春秋 (前 770—前 476 年)	天子国和诸侯国	两极、多极	争霸但禁兼并
战国 (前 475—前 221 年)	君主国	多极	兼并
秦朝 (前 221—前 206 年)	帝国	一极	兼并
欧洲			
罗马时期 (前 27年—公元 395 年)	帝国	多极、两极	兼并
中世纪 (约 476—1453 年)	教皇国和王国	多极	教权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648—1791 年)	帝国和民族国家	多极	主权
反法兰西联盟 (1792—1814年)	帝国和民族国家	多极或两极?	干涉内政
维也纳体系 (1814—1913 年)	帝国和民族国家	多极	干涉内政
伊斯兰地区			
后哈里发时代 (8—14世纪)	城邦国	多极	兼并
奥斯曼时期 (14—16 世纪)	帝国	一极	兼并
全球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919—1939 年)	民族国家	多极	占领与兼并
雅尔塔体系 (1945年—)	民族国家	两极	不干涉,不兼并

第一, 行为体类型的改变并不必然带来体系转型。1648年签订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可以看作民族国家的起点, 但这种行为体变化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只局限于欧洲。和约签订后,欧洲的国际行 为体经历了从城邦、王国、君主国、帝国向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然 而,国际关系学界很少依据欧洲行为体的变化对《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之前欧洲的国际体系进行分类。事实上,该和约之所以成为欧洲 体系转型的标志,不仅是因为出现了民族国家,而且是因为主权成了 欧洲的主导国际规范,即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违在该表中我们 还可以发现反例,即行为体类型没变而国际体系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例如,波斯帝国于1908年结束,清朝于1911年结束,在欧洲持续了几 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王朝都 的国际行为体。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 系看作二战前和二战后的两个性质不同的国际体系, 这意味着在两个 体系之间发生了一次转型。如果我们认同此看法,即这两个体系的性 质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国际体系转型与行为体类型改变没有 必然关系。

第二,格局转型并不必然标志着体系也转型。国际格局有三种基本类型:单极、两极和多极。例如,在13世纪,南宋王朝和金国对立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元朝大一统的单极格局,但当时的国际体系保持了帝国体系特性而未转型。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之所以把权力再分配视为体系转型,主要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历史上有些国际体系转型是没有格局转型的。在表7-1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例子,例如在中国古代史上,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的格局都是多极,就像欧洲的国际格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前后都是多极格局一样。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国际体系都经历了转型,这证明权力格局转型必然带来国际体系转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 3. Buzan an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37-47.
- 4.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0.
- 5. Robert A. Mundell and Alexander K. Swoboda, eds.,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343.
- 6. Stanley Hoffman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tate of War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 Stanley Hoffmann (New York: Praeger, 1965), 88-122.
- 7.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81.
- 8. 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6—39页;刘鸣、黄仁伟、顾永兴:《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9页;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6页。

^{1.} 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转自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

^{2.} 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2页。

- 9. 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3页,第6页,第7页, 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9页。
- 10.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40.
- 11. 他将国际体系的控制格局分为三种形式:一个强国控制的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和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均势。同上,第29页。
- 12. 同上,第41—42页。
- 13. 同上,第41页。
- 14. 如果认为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都是同一类型的,那是错误的。例如,春秋时期东亚的华夏地区,周朝作为一个天子国,与秦、楚、齐、晋、韩、鲁、赵、魏等诸侯国共存。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曾与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撒克逊王国、乌登堡公国、巴登大公国、黑森酋长国、安哈尔特公国、美因茨选帝侯国和不来梅自由城等多种类型国家同时存在。现在,美国是个民族国家,而沙特阿拉伯是个君主国,梵蒂冈是个教皇国。
- 15.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 16. Stavrianos, World Since 1500, 322 n 431, n 457, n 472.
- 17.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体系转型的条件

表7-1表明,国际体系中的单独一个构成要素转变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故此,按照逻辑我们需要弄清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能否引起体系转型。结果表明,以国际体系中任意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体系转型,就能比较一致地解释表7-1中各类国际体系的转型了。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型与至少两个构成要素同时转变相关。

由两个构成要素变化带来的国际体系转型

在表7-1中,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体同时转变具有相关性。从春秋到战国的体系转型中,主要行为体从天子授权的诸侯国变为独立的君主国。与此同时,国际规范也从禁止兼并变为认可兼并。在欧洲,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国际体系转型,经历了国际行为体从帝国到王国的变化,同时国际规范发生了从兼并到教权或分封的变化。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化,见证了国际行为体从王国到民族国家、国际规范从教权到主权的变化。 〕上述三个案例中,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都发生了类型变化,而国际格局保持不变。

在表7-1中,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同时变化 具有相关性。从西周到春秋的国际体系转型,经历了国际格局由一极 向多极的变化,国际规范由分封向争霸的变化,但当时霸权争夺还是 禁止兼并的。现代的典型案例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权力再分配使国际格局从多极 转变为两极,国际规范从先占和兼并的原则转变为不干涉和不兼并的 原则。这两个案例表明,在国际行为体不变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是有可能发生转型的。在第一个案例中,主要国际行为体未变,仍是天子国和诸侯国;在第二个案例中,民族国家仍为主要国际行为体。

最后,在表7-1的下列国际体系转型中可以发现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类型同时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国吞并了其他6个君主国,秦国统治者的称谓从"王"改为"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随着国际行为体从君主国转变为帝国,国际格局也从多极转变为一极。于是,华夏体系从君主体系转变为帝国体系。在伊斯兰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体系转型。自8世纪中叶起,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开始衰落,分裂成多个城邦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格局从单极转变为多极。这两个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变化带来伊斯兰世界的体系转型。14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伊斯兰国家从城邦变为帝国,后来在伊斯兰世界里又出现了另外两个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格局由多极向单极转变。建上述国际体系转型是在国际规范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国际体系盛行的都是兼并原则。

存在争议的案例与判断原则

在表7-1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体系的划分是存在争议的,如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反法兰西联盟体系和维也纳体系。这三个体系有着不同 的国际规范,但它们的行为体类型和格局类型都是相同的。根据体系 转型至少需要两个构成要素同时变化的标准,这三个体系不应被视为 三个特性不同的国际体系。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欧洲列强组成反法 兰西联盟对革命的法国发动了7场战争,这是个两极格局,不同于维也 纳体系的多极格局,同时其国际规范也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秘密 外交原则转变为反法兰西联盟体系下的普世和平与正义原则,国际规 不过,关于1648—1913年的欧洲国际体系也许还可以下另一种定义。在通常情况下,与国际格局或国际规范的类型转变所需的时间相比,国际体系转型所需的时间长得多。由于反法兰西联盟只持续了25年,所以可以把它归类为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动乱时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这样就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三个连续的国际体系视为同一个体系。事实上,在前现代的帝国和王朝的世界里,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持续200~300年是常见的。将这三个连续的时期归为一个国际体系也符合国际体系转型的标准,即至少两个构成要素同时发生转变。

诚然,"两个构成要素转变"的假设尚未得到彻底的检验。在穷尽对历史上所有国际体系转型的检验之前,还难以就构成要素转变与体系转型的关系得出严格的结论。因此,我们还不能断言只要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的两个发生转变,体系就必然转型。上述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逻辑框架,基于这一逻辑推导出了判断国际体系是否转型的三个原则。第一,如果三个构成要素都发生类型转变,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转型。第二,当国际体系三个构成要素中的两个发生类型转变,国际体系的性质极有可能转型。上述例子可用来支持这个原则,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第三,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一个发生转变时,国际体系不太可能转型,如我们所见,许多基于单一构成要素变化划分国际体系类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基于国际格局变化划分的。这是典型的把体系的部分混淆为整体的逻辑错误。

^{1.}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页,第27页,第45页;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24页。

^{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4—25页。

^{3.} 同上,第89页。

政治领导与体系转型

历史表明,国际格局转型快于国际规范转型,而国际规范转型快于国际行为体转型。例如,在20世纪,国际格局经历了从多极到两极再到单极的变化,而国际规范只经历了一次转型——从强权政治变为双重标准,但在同一时期国际行为体保持未变,仍是民族国家。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转型频率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国际体系转型经常伴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转型,而不是国际行为体和其他两个构成要素之一的同时转型。由于国际行为体转型通常需要几个世纪,因此本节将只分析由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变化引起的国际体系转型。

我们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家领导类型之间的关系,在第五章中讨论了国际规范变化与国际领导类型之间的关系。根据前面的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领导是导致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变化的关键因素。尽管我们还不清楚政治领导是否对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变化有直接影响,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政治领导在国际体系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原因有两点。第一,体系转型需要至少三个构成要素中的两个发生转变,且这二者之一不是国际格局就是国际规范。第二,历史表明,国际体系转型比国际行为体转型频繁得多。这意味着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的转变比国际行为体转型更多地带来国际体系转型。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转型又都是由领导国的政治领导变化引起的。

在国家层面,崛起国和主导国的国家领导类型在改变国际格局中 共同发挥着作用。崛起国领导通过持续的改革能够比主导国更快地提 高其国家实力,当主导国的领导未能阻止任何崛起国缩小它们之间的 实力差距时,国际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在国际层面,国际格局的变化 使崛起国成为新的主导国,这一新主导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与之前主导国完全不同的新型国际领导。国际领导类型的变化形成了新型领导,这就很可能建立起与以往类型不同的国际规范。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都发生转型时,原有的国际体系将转变为新型国际体系。图7-1描述了从领导国的领导类型的变化到国际体系转型的4个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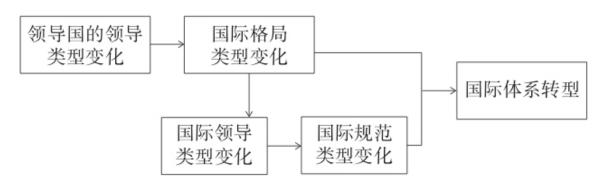


图7-1 新型国际领导和国际体系转型

(1)第一步是领导国的领导类型变化,无论是崛起国还是主导国的领导类型变化,都可能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实际情况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任何独立的国际体系中都会有一些或者很多国家,因此国家领导的变更是经常发生的。然而,在这些领导的变更中,只有少数的领导变更会导致其国家实力明显增长或衰落,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带来明显的实力变化。假定在完全随机的条件下,一国领导的变更对该国实力产生的影响是三种不同结果中的一种——迅速增长、停滞或衰退。只有当主导国领导变更导致其国家实力急剧衰落,崛起国领导变更促使其国家实力迅速增长时,国际格局才会发生类型变化。这种特殊组合出现的概率仅为1/9,而且只有在假设完全随机的情况下才会如此。历史上,促使崛起国迅速强大的领导和导致主导国急剧衰落的领导都是较少的。因此,在现实中,这两种领导变更同时出现是非常偶然的,概率甚至小于理论上的1/9。这就是为什么崛起国中只有很少数能成功取代主导国的地位,以至崛起国取代主导国的现象要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才会发生一次。

许多人把国际格局的变化归因于崛起国的成功,但在现实中,主导国的衰落对于国际格局变化与崛起国成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管子说: "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 建管子认为,在争夺国际主导权的竞争中,他国领导的无能与本国领导的英明是同等重要的。笔者认为,主导国的领导变更比崛起国的领导变更更可能改变国际格局,因为一国领导破坏本国实力比增强本国实力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崛起国建设成为超级大国的时间比一个超级大国毁灭自己所需的时间更长。例如,秦朝的第二个皇帝胡亥,在他统治的短短三年里(前210—前207年)就彻底毁掉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1985年,苏联领导发生更迭,这导致苏联于1991年年底解体,国际格局也由两极转变为一极。然而,在这6年里,美国的绝对实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关于美国在21世纪的衰落,勒博说: "现代现实主义各流派所做的分析,使其信奉者看不到美国的影响力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急剧下降的原因。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美国在证明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2) 第二步,由国际格局变化产生的新国际领导可能与之前的类型不同。国际领导转型少于国家领导转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规范转型不如国际格局转型那么频繁。虽然国际格局转型不必然与国际领导类型变化同时发生,但在某些情况下同时发生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从二战前的多极转变为两极。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苏联和美国取代了西欧列强和日本成为领导国。不同于二战前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领导,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互动基础上提供了霸权主义领导。

子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这个转变使美国成为唯一 的全球领导,但它所提供的国际领导仍然与冷战期间它和苏联提供的 领导相同。

(3)第三步是新型国际领导按照其倡导和实践的新价值观改革国际规范。为了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其所获取得的领导权,新领导国倾向于建立新的国际规范,通过这些新规范巩固世界秩序并保障其持久的主导权。新规范既是其领导权的基础,又是使其外交政策合法化的工具。例如,美国在一战后拒绝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这使其被排除在世界领导机构之外,因而无法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二战后美国创立了联合国,加入了领导机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从而把国际规范从殖民主义型转变为霸权主义型。这一步构建了国际体系转型所需的两个要素之一。

新国际领导建立的规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性质上与以前规范不同的,另一类是只在内容上与以前规范不同的。例如,二战后联合国制定的规范属于第一类,因为这些规范强调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禁止兼并的原则,这与先占原则相反。相比之下,一战后国际联盟制定的规范属于第二类,因为它在性质上与19世纪的规范相同。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依据权力再分配原则签订的海军军备控制协议就是与以往军备控制规范相同的规范。注

(4) 第四步是国际格局转型与新规范的建立相结合,两者共同带来体系转型。这最后一步体现了本书有别于其他理论对国际体系转型的解释,即国际体系转型只有在其至少两个构成要素转型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而单一构成要素的转型是不会带来国际体系转型的。根据这一标准,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已经持续了70多年。这个体系不仅经历了冷战延续下来,而且有可能至少再持续10年。这是因为虽然目前最强大的崛起国中国的崛起将塑造一个新的两极格局,但中国尚不具备在未来10年里建立起新型国际规范的能力。

此外,中国政府也无意改变雅尔塔体系。例如,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针锋相对,一再向日本政府强调维护二战后体系的重要性。2014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建鉴于中国官方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同一事物,这表明中国政府认为雅尔塔体系尚未结束,中国政府也无意改变这个体系。

特朗普政府可能加快当前国际格局从单极向两极的转变,但若无中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尚无力将现行国际规范变成它所偏爱的新型规范。中国和美国各自可能都有能力削弱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规范的效力,但是它们都无力推翻这些规范。因此,只要民族国家继续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未来10年里,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很可能共同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雅尔塔体系可能延续下去,不会转变为新型国际体系。

- 1.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第268页。
- 2. 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311.
- 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38—443页。
- 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 5.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56页。由于人们误以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含义相同,因此在中国政府文件里,这两个词汇通常是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的。

小结

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是国际体系的三个核心构成要素。将部分变化混淆为整体变化是普遍现象,正是由于这种混淆,许多人将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变化误当作体系转型。既然国际体系包括上述三个构成要素,那么国际体系转型就需要其中至少两个构成要素转型。单一构成要素转型可能导致体系秩序混乱或改善,但它不能使体系发生任何的类型转变。

国际行为体类型变化比国际格局或国际规范类型变化所需的时间都长。因此,历史上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类型变化的现象多于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国际体系转型都是由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者同时发生类型变化带来的,由国际行为体和其他两个构成要素之一的同时类型变化带来的体系转型较少。由于国际格局类型变化比国际规范变化频繁,因此国际体系转型通常始于国际格局变化。

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类型变化分别与领导国的国内领导类型和 国际领导类型的变化紧密相关。于是,国际体系转型也必然受到政治 领导类型变化的影响。对国家领导来说,破坏本国实力比增强本国实 力容易,因此主导国的衰落往往比新领导国的崛起对改变国际格局起 的作用更大。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可能会加速目前国际格局的两 极化,并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但雅尔塔体系可能经历这些变化之后继 续存在下去,而不会转变为新型体系。

第八章 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案例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

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变化,包括国际行为体类型、国际格局类型、国际规范类型和国际领导类型的变化。前文我们对国际领导类型与国际格局、国际规范、政治价值观和国际体系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章将通过历史案例展示领导类型是如何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本章选取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全球性的案例来说明本书的理论论点。这些案例在多方面各有不同,如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大小、历史和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这样大的差异有助于说明前文提出的理论论据的适用范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与全球现代史的差异巨大,如果能准确地找出这两种历史中发生的体系转型的政治相似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推断,这些政治相似性势必有一定的社会规律。正是这些相似性构成了本书建立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案例

本小节将用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先秦时期来说明领导国在塑造国际体系的格局、规范和性质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三个时期是从西周到春秋的过渡、接下来战国的出现,以及后来秦国的崛起。其中,领导国的政治领导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量。这期间的每个时期中,领导国的政治领导都有多次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只带来了国际规范或国际格局的类型变化,而没有带来国际体系整体特性的转变。

西周时期没有发生体系转型

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的国际领导类型从王道型转变为霸权型再转变为强权型。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国际体系中指导国家间互动的国际规范从道义规范转变为双重标准规范,而后转变为强权政治规范,最终转变为恃强凌弱规范。在此期间,大国的类型保持不变,即天子国和许多诸侯国,并且单极格局一直持续到该时期结束。

商朝灭亡后,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左右建立了周朝。这标志着 西周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开始,进所谓的"五服"规范是当时指导诸侯 国之间交往的传统原则。这些国际规范起源于商汤王统治时期,在公 元前17世纪的"景毫之命"大会上,商汤王建立了"侯、甸、男、 采、卫"的五服规范,为各诸侯国所遵守。迁周武王对此进行修改, 重新命名为"甸、侯、宾、要、荒"的五服规范,并严格执行这些规 范,后继的周朝统治者成王和康王也是如此。迁当诸侯国不遵守五服 规范时,武王、成王和康王先根据五服规范检查自己的行为,并修改 不足之处,然后对违反五服规范的诸侯国发出警告,对警告后仍不改

周昭王于公元前995年继位。住此后,周朝的统治者不再严格遵守五服规范,不断对体系周边地区的部落发动战争。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周穆王于公元前965—前964年对居住在西北周边荒服地区的犬戎部落发动的战争。根据五服规范,这些部落只需不定期地朝拜周天子,不必四季都向周王进贡。祭公谋父试图劝谏穆王不要以犬戎没有进献四季贡品为借口对其发动战争,按照五服规范,犬戎没有这样的义务。祭公谋父警告穆王,战争将带来严重后果。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发动了战争,凭借周朝雄厚的军事实力赢得了那场战争。然而,这场胜利严重破坏了关于周朝与西北周边部族(荒服)关系的规范,犬戎部族也不再朝拜。往穆王在位期间,违反了与荒服部族关系的规范,但仍然继续遵守适用于侯服和宾服诸侯国的公约,它们的文明与周朝相似,因此周穆王没有对这些诸侯国发动战争。然而,对犬戎部族的敌对行为使中国古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规范从道义规范转变为双重标准规范。这种变化是霸权型国际领导取代王道型国际领导的结果。

公元前877年,周厉王继位后,不仅违反了与不同文明的边远地区部族之间的规范,也违反了与相同文明的诸侯国之间的规范。按照当时"共享山泽"的国际规范,沼泽地是周朝及其分封的诸侯国共有的。然而,周厉王却对其王室成员独占这些地区的违反规范行为不加制止。这激起了一些诸侯的叛乱,以保护他们的沼泽地。进到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继位时,周王朝的国际领导已经演变成强权型,不再遵守与诸侯国相关的规范,对有共同祖先的鲁国也是如此。周宣王甚至违

反长子继承制的规范,要求鲁国公立幼子戏为王储。鲁国人愤怒之下杀了戏,宣布长子伯御为国君。周宣王为此在宣王三十二年(前795年)向鲁国宣战。虽然周王朝取得了胜利,但与诸侯国的关系恶化,整个华夏体系的冲突不断。建因此,体系的主导规范逐渐从双重标准规范演变为强权政治规范。

国际体系向春秋时期转变

正是由于国际格局从单极转变为多极,加之国际规范由恃强凌弱规范走向双重标准规范这些变化,西周体系才向春秋体系转变。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周时期没有霸权争夺,但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争霸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进一些西方学者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差异。他们认为,周朝实力的下降是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要因素。卡列维·霍尔斯蒂认为:"在周朝后期,法规、传统和神话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法规、传统和神话本应是用来调节政体与独立国家实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做法并不适合于封建秩序的神话和习俗。在一个许多强大的、雄心勃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存的体系中,这些规定是不合时

代的。相反,各主要国家制定或形成了一些反映该体系政治和军事特征的规则或习俗。" 造

周王朝国家实力的衰落,不仅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而且产生了新型国际领导。因此,这种变化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国际规范变化的动力。春秋时期的霸权型国际领导不同于西周前三位国王时期的王道型领导和最后周幽王时期的昏庸型领导。当周朝失去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时,所有的诸侯国变得平等,大诸侯国争夺霸权,而不是维护体系的秩序。没有国家对维护体系秩序承担责任,这标志着西周早期那种王道型国际领导的终止。由于较大的诸侯国是霸权型国家,其在外交决策中不可避免地遵循双重标准原则。用于解决联盟内部冲突的规范通常与解决非盟国之间冲突的规范不同。这种霸权型的双重标准原则,在向盟国展示霸主信誉的同时,也与西周后期盛行的恃强凌弱规范有所不同。

齐国和楚国是春秋初期的两个霸主,分别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成为促使以双重标准原则作为国际规范的一个重要因素。齐国和楚国各自建立旨在争霸的联盟,取代了西周体系的一极格局,形成了两极格局。在崛起过程中,为了争霸取胜,两个霸权国都扩大了与其他小国的军事合作,并将临时合作转变为持久联盟,这一战略相应地增强了对方联盟的稳定性。

公元前651年,齐国与宋、鲁、卫、许、曹、郑等国建立了"葵丘会盟",盟约包括内政、外交、意识形态及某些其他领域的内容。例如,盟约规定: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违这一规定限制同盟国之间兼并领土的行为。同盟强调尊重周王的重要性,即使他不过是国家间权威的政治傀儡。为具有国际合法性,同盟重申周王颁布的法律。例如,不可壅塞泉水,不可多藏粮谷,不可更换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政。 违这些规定增强了同盟的政治信心,减少了同盟内部的战争。因此,这些做法促使当时的国际

体系比之前恃强凌弱规范下的国际体系稳定得多。当然, "葵丘之盟"的规范并不适用于盟国与非盟国之间的关系。"葵丘之盟"的双重标准规范得到较长时间的遵守, 其主要原因是齐国作为盟主一贯遵守盟约。然而, 与西周主要时期相比, 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是暴力而混乱的。

国际体系向战国时期转变

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这两个时期的国际体系截然不同。虽然这两种国际体系的格局都是多极的,但行为体从诸侯国变为君主国,国际规范从双重标准规范变为强权政治规范。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充满暴力,国际体系的秩序混乱,这主要是因为该体系中既没有单一的国家作为国际领导,也没有集体的国际领导。

由于兼并成为一种盛行的国际规范,战国时期的国家数量急剧减少。起初,该体系中至少有26个国家,进但到了中期,大部分国家在兼并战争中被灭掉了,只剩下魏、赵、韩、齐、秦、楚、燕7个最大、最强的国家。进由于领土、人口和军事实力的急剧扩大,这些国家称其统治者为王,变诸侯国为君主国。公元前256年,秦国灭周,周赧王从天子降为西周公。进这标志着所有的国际行为体都是独立的国家,不再有诸侯国。兼并战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

秦朝的建立,使华夏国际体系从绝对无政府状态变为相对有等级的状态,国际行为体从多个君主国变为一个帝国加上一些非华夏的王国和部族,国际格局从多极变为单极。此后,华夏国际体系的类型成为众所周知的以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当朝贡体系巩固时,国际关系就井然有序,否则就是混乱的。

- 1. 杨宽:《西周史》,第871页。
- 2. 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 3. "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国际体系。 王城周围500里(1里=500米)为"甸服",耕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500里为 "侯服",提供劳役和边疆保卫。再向外2 500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 家。宾服地区每500里为一圻,次序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这些地区主要 负责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个地区,每个地 区为1 000里。要服和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否相同并不清楚。要服地区分为"蛮 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500里,部族遵循相似的政治规则,但可减少赋税。与 要服类似,荒服地区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500里,这些地区的部落 仅执行最基础的政治规则和规范,人员可自由迁徙。然而,五服体系在学术上有不同的 解释。参见叶自成:《春秋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第28页;杨宽:《西周史》,第453页;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组:《国语》,上海国 际出版社,1978年,第4页。
- 4.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组:《国语》,第1-3页。
- 5. 在武王和成王的统治下,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和部落之间都发生过军事冲突,但 是比昭王登基后爆发的军事冲突少得多。参见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第23页。
- 6. 同上。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后,将原文中的"1001年"改"995年"。
- 7. 杨宽:《西周史》,第453页。
- 8. 同上。
- 9. 同上,第840页,第841页,第849页。
- 10. 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杨宽:《西周史》,第842页。
- 11. 杨宽:《西周史》,第850页。

- 12.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杨宽: 《西周史》,第851页。
- 13.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21页;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页。
- 14. Kalevi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33.
- 15.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第285页。
- 16.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85页。
- 17. 杨宽: 《战国史》,第2页。
- 18. 同上,第278—283页。
- 19. 同上,第303页。
- 20. 同上,第719页。
- 21. 同上,第457—458页。

现代史案例

现代史上没有比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更具影响力的事件了。 这两次大战虽然同等重要,但各自影响的结果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战改变了主导国的情形,但它并没有改变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的类型。相比之下,二战改变了整个国际体系,包括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这主要是罗斯福政府提供了新型国际领导的结果。

一战没有带来国际体系转型

国际体系转型经常是通过战争实现的,但战争并不一定会带来国际体系转型。尽管一战在20世纪初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国际体系转型,因为既没有出现国际格局类型的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规范类型的变化。一战前后的国际格局都是多极的,国际规范的类型也都是强权政治规范。在一战爆发之前,全球主导国已不再建立帝国。中国和波斯帝国消失了,4个欧洲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大大削弱了。建所有新的欧洲主要大国都是帝国主义民族国家,战后依然如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主导国,实行专横的国际领导。它一贯采用强权政治原则,在全球实施殖民扩张,使强权政治规范遍布全世界。建英国的强权政治原则表现为对外政策缺乏诚信,而且不遵守国际条约。1896年,英国公开承认其"光荣孤立"政策,表明其外交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国际条约束缚。建这一政策使英国形成了不受任何条约约束的外交习惯。1898年,英国和德国签署了

英国不遵守任何承诺的政策导致其他国家也无视国际条约。因此,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违反国际条约是一种普遍现象。国际条约被用作某项政策的借口,而不是基础,并且外交欺诈和背叛盛行。例如,意大利是意德奥三国同盟的核心成员。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此后不久,意大利却退出了同盟,8月3日宣布中立。建7月9日,英国告知德国驻英大使,英国既不是法国的盟友,也不是俄国的盟友,不受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何承诺的约束。此外,一战爆发的两天前,英国表态称将保持中立,不卷入任何战争。由于背叛盟友是当时广为接受的国际规范,德国相信了英国背叛法国和俄国的表态。因此,当英国于7月29日宣布将参战时,德皇威廉二世大骂英国骗子。建

英国在拓展殖民地方面的强权政治原则被主要国家效仿。兼并他国领土或殖民地成为当时的国际规范,这与华夏体系战国时期的兼并规范很相似。在英国主导的体系下,发生了很多殖民战争,领土扩张和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情况经常出现,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7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1912年的意大利—土耳其战争、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1911年的俄国入侵蒙古战争、1912—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及1914—1918年的一战。建

一战后不久,美国便取代英国成了世界最强国。虽然美国已经开始从强权国向霸权国过渡,但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提供不同于英国的

国际领导。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表明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14点计划,后来被称为《国际联盟宪章》。《国际联盟宪章》中的条款包括保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建然而,美国国会最终决定否决《凡尔赛条约》,因此拒绝了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加入国际联盟的想法。因此,美国自己的决定使其领导失去了建立新的国际规范的机会,而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强权国家在一战后仍然主导国际规范。建换言之,一战后,强权领导继续存在,强权政治规范在国际政治中仍起主导作用。

一战后,违反国际条约仍是普遍的国际规范,以战争作为领土扩张的手段也仍然很常见。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尽管签署了许多限制使用武力的条约,包括《国际联盟盟约》(1919年)、《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22年)、《非战公约》(1928年)和《莫斯科议定书》(1929年),但是没有一个大国遵守这些国际条约。此外,包括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内的15个国际联盟成员国后来都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建这些事件表明,当时无视国际条约是普遍的,也是合法的。1929年大萧条之后,为了扩张领土,大国加剧大规模扩军。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于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德国同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于1939年入侵波兰,这标志着二战的开始。建

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国际体系的秩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同时,该体系的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都保持了相同的类型。一战前后都是多极格局,一战期间为两极格局。然而,这期间的国际格局变化没能带来国际体系转型。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史说明了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区别,以及国际格局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区别。

二战后唯一的体系转型

与一战不同,二战带来了国际体系转型。战争虽然没有改变国际 行为体的类型,但将国际格局从多极变为两极,将国际规范从强权政 治规范变为双重标准规范。这些构成部分类型的变化引发了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转变,而雅尔塔体系在冷战中幸存下来, 并一直维持至今。

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在学术上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其国际格局有所不同,分别为两极和一极。然而,自1945年以来,国际体系保持不变,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国际行为体和国际规范的类型都没变。冷战期间,所有大国都是民族国家,其中美国和苏联是超级大国。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霸权国家,都实行霸权式的领导,它们所建立的国际规范也相应地是双重标准规范。冷战后,所有大国都仍然是民族国家,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美国获得了最多的国际权力,但其政治性质保持不变。因此,国际领导的类型没有变,国际规范继续以双重标准原则为指导。

冷战时期的双重标准规范与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双重标准规范很相似,春秋时期的晋楚和冷战时期的美苏都是霸权国家,而不是强权国家。晋楚两国分别组建各自的联盟,支持战时的盟友,破坏敌国政权。美苏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多边同盟和双边同盟,为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同时进行代理战争,颠覆敌国政权。然而,在遵守不兼并原则方面,美苏两国比晋楚两国好得多。

在维护与盟国的和平关系方面,美国可以与晋国相比,苏联可以与楚国相比。与苏联和楚国对它们盟国的政策相比,美国和晋国对盟国政策的信誉比较高,这是美国和晋国的相似之处。楚国比晋国对盟国的军事干预更多。美国于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帮助其欧洲盟国,并在1949年建立了北约,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障。从那时起,

美国再也没有对其盟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 送关于对盟国的战略信誉,苏联远不如美国。1948年,苏联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同盟,并从南斯拉夫撤军。1958年,它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的援助条约。1956年和1968年,它分别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这两个国家都是华约的成员国。 送这些行为不符合荀子所说的霸权标准,即"结约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 送苏联不履行对其盟国的承诺,也是导致华约于1991年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送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违反与盟国的协议,不仅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而且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即通过战争解决争端,如20世纪70年代的中越战争和柬越战争。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对非盟国的行为都是以强权政治原则为指导的。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范围,它们不仅在军事上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理人战争,而且有时还参与战争,如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9年的猪湾战争、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1979—1988年的阿富汗战争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美国和苏联对非盟国的政策强化了敌对国家之间的强权政治规范。地区大国之间发生了许多战争,可见敌对国之间实行的也是强权政治原则,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三次战争(1948年、1965年、1971年)、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5次中东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中印战争(1962年)、柬越战争(1978—1979年)、中越军事冲突(1979年)、两次两伊战争(1980—1988年),以及南非对其邻国的多次军事入侵。

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有权加强双重标准规范。 例如,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分离主义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只支持非西方 国家的分裂主义运动。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相关的最新案 例是,根据公投结果和加泰罗尼亚135个席位地区政府议员的投票结 果,加泰罗尼亚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而美国、欧盟和许多西方国家 的领导人对此不予承认。 這同时,几乎没有西方国家领导人公开反对非西方国家的分离活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分离主义活动就引起英国议会与美国国会的政治同情甚至是支持。此外,在导弹不扩散和导弹技术控制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阻止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核扩散,而不阻止西方国家之间的核扩散。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缅甸的人权纪录同样糟糕,但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缅甸实施了制裁,但对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就没有实施制裁。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出一种"民主和平"的理论,用来解释西方国家为什么与非西方国家开战,而它们相互之间不开战。这一理论论据是否可靠暂且不论,它使人们注意到的是冷战后时期双重标准规范的现象。1990—2002年,在世界46个不同地区共发生58起重大武装冲突,其中没有一起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建1990年以来,发生了11次重大国际战争:波斯湾战争(1991年)、索马里战争(1992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战争(1998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2006年)、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1年)和沙特阿拉伯-也门战争(2015年)。其中大多数战争都是由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动的。在这11次战争中,只有3次是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余8次都与西方国家有关,其中7次有北约成员国参与。

^{1.} Stavrianos, World Since 1500, 322 n 431, n 457, n 472.

^{2. 1902—1911}年,英国的军费支出达到了顶峰,俄国、德国、法国这些二等军事强国的军费支出仅分别各占英国军费支出的2/3~3/4,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费支出不足其1/2。美国在1898年赢得美西战争,日本在1905年赢得日俄战争,随后两者的实力都大增,但仍不能与英国相比。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57—358页。

^{3.} 同上,第329页。

^{4.} 同上,第334页。

- 5. 同上,第410页。
- 6. 同上,第402—403页。
- 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将古巴、波多黎各、西印度群岛、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 7. 英布战争导致布尔共和国失去独立,并同意接受英国王室的主权统治; 大英帝国通过将 开普敦、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联合起来建立了南非联邦。日俄战争使俄国 将其对亚瑟港、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的租赁权让给日本,并使其承认韩国是日本利益 范围的一部分。1910年,日本正式兼并了韩国。意大利-土耳其战争导致土耳其承认的 黎波里塔尼亚和西里纳加是意大利的属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它 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土地,包括从爱琴海到黑海(阿尔巴尼亚除外)沿线以西,以及从克 里特岛到黑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希腊和塞尔维亚分 裂了马其顿,奥斯曼人重新夺回了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失去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 嬴得的土地,同时还失去了其原有的一些领土。八国联军侵华后,俄国占领了中国东北 三省,而且俄国、意大利、英国和奥匈帝国在天津获得了租界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后, 法国军队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领土。阿加迪尔危机后, 法国将其在刚果27 500平方 公里土地上的财产移交给德国,而德国则将乍得湖以东的一块土地割让给法国。在俄国 入侵蒙古后,俄国占领了在唐努乌梁海的中国领土。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1871-1918)》,第274-394页。
- 8. 1922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他们各国海军的比例为5:5:3:1.75:1.75。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第118页。
- 9. 同上,第90—91页。
- 10. 同上,第84—91页。
- 11.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本),第984页。
- 1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9—62,页,第83—86页,第148—149页,第184—187页,第277—380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页,第5页。
- 13.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本),第984页。
- 1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09—310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05—107页。
- 15.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第206页。
- 16. 王明修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91—1992)》,第846页。
- 17. "UK, US Reject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Rediffnews, October 27,2017, http://news.rediff.com/commentary/2017/oct/27/uk-us-reject-cataloniasindependence-from-

spain/f0f76bb3f0ce01d42fd00e5503091738; "Europe Rejects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En. Hberler. com, October 27, 2017, https://en. haberler. com/update-europe-rejects-catalonia-s-independence-1123115/.

1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27—130页。重大武装冲突是指造成至少1 000名武装人员死亡的军事冲突。

小结

本章讨论了古代华夏体系和现代全球体系的变化,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找出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古代华夏案例和现代案例都表明,国际秩序不一定与国际体系的类型相一致。任何一种国际体系都可能经历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这一事实表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国朝贡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现代全球体系的国际领导都青睐双重标准规范。这与邝云峰关于冷战后时期美国领导的研究所见略同。他说,"美国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或焦点与明清时期的中国如出一辙。"注

历史表明,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是由国际领导的类型决定的。由于国际领导的变化是朝着随机的方向,而不是沿着一条循序渐进的路线,因此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体系特征的变化也是不确定的。从西周时期到战国时期,华夏体系由一个相对王道的体系转变为强权政治体系,而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全球国际体系由强权政治体系转变为霸权体系。这些体系转型的方向是相反的,这表明国际体系不是只以一种方式或朝着任何预定方向发展的。

决定国际秩序的是国际领导的类型,而不是国际格局。二战结束以来,军事对抗时而较多时而较少,国际秩序随之摇摆不定,但雅尔塔体系的性质没有改变。该体系的特点是双重标准规范,而不是两极格局或一极格局。目前以中美为首的两极化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国际领导,它将带来与冷战后时期不同的秩序。然而,新领导是会维持双重标准规范还是会形成一套新型规范尚不确定。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秩序与冷战后时期不同,但国际体系仍将保持不变。

1.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no.1 (Spring 2013): 6.

第九章 结论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诗经》

通过阅读先秦哲学著作,笔者不仅认识到政治领导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而且认识到大国的国家领导作为自变量,可以把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分析层次联系起来。本章先总结本书的理论,然后将其应用于预测未来10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理论总结

如开篇所述,本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以解释为什么少数崛起国能取代主导国。其实这个理论也能用来解释主导国的衰落以及大多数崛起国的失败。本书对权力再分配的解释涉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改变机制。本书理论的核心自变量是政治领导,其变量值为国内领导或国际领导的不同类型。领导类型在改变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领导与不平衡增长

基于现实主义的假定,即追求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笔者认为,国家的客观战略利益是由国家综合实力决定的。由于每个国家的实力不同,其战略利益可以分别界定为:主导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保持其世界主导权,崛起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获取世界主导权,地区大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获得地区主导权,小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维护生存。

国家的实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政治实力是操作性要素,其他三个(军事、经济、文化)是资源性要素。换句话说,政治实力对其他三个要素起着扩大或缩小的作用。当政治实力降为零时,其他三个实力要素就不发挥作用了。因此,国家实力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该国的政治能力。国家的战略利益是根据国家综合实力的扩大或缩小来重新定义的。每个领域或具体问题的利益是根据与之相关领域或问题的实力来界定的。

国家领导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实力,而领导能力主要体现为改革能力。与倒退相反,改革是指随着形势的变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因此改革的能力是以改革的结果为评价标准的。与很少进行或不进行改革的国家相比,一国领导不断进行及时的改革,该国的实力就会增长得较快。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领导,一国领导比其前任进行更多的改革,该国的实力就能更快地增长,反之则更慢。在多数情况下,主导国的改革动机不如崛起国强烈,因为其领先的地位使其对本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有自豪感,而缺乏改革的欲望。于是,与崛起国相比,主导国实施的改革较少,这削弱了它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竞争能力,最终导致其衰落。

不同国家的领导能力永远是不一样的,这可以解释国家综合实力不均衡增长的规律。在所有影响领导能力的因素中,领导类型往往具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新领导在领导类型上的变化,对国家实力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领导类型的变化会加快或减缓国家实力的增长速度,也会使该国与他国的相对实力发生改变。当大国间的实力差距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格局将在单极、两极和多极之间变化。甚至建立道义规范也是由开明的自身利益而非利他主义推动的。这个机制带来推论1:国家领导力的提高或下降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终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化。

领导类型和战略偏好

基于现实主义假定,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体系,自保成为国家追求自身独特战略利益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政府道义不同于个人道义和国际道义,同时政府道义是普世的而非民族性的。国家领导是以它所统治的人民为基础的,因此政府道义是指对它所统治的人民的利益负责。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说,政府道义是指提高一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而从国际社会角度来说,政府道义是指提高一国的国际战略信誉。

根据政府责任感,国家领导可以分为4个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这个分类以两个变量的结合为基础:一是领导集团对本国国际地位现状的态度,二是对决策错误是否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无为型领导和守成型领导缺乏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动力,进取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则有强烈的扩大本国国际权力的意愿。守成型领导和进取型领导发现错误时愿意调整政策,而无为型领导和争斗型领导不愿承认错误,甚至当其错误政策严重伤害本国利益或国家实力时,他们仍不愿意承认错误。

鉴于国家领导的类型是由领导的政府道义观念决定的,不同类型的领导会导致国家实力增长速度不同。当崛起国政府比主导国政府有更强的责任感时,这种差别将表现为前者比后者进行更多的改革,从而逐渐缩小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十年,崛起国的综合实力将赶上甚至超过主导国,于是崛起国成为新的主导国。

由于政府的责任感不同,因此对于国际地位问题,不同类型的领导有不同的战略偏好。无为型领导对维护本国国际权力采取回避冲突或无所作为的策略,守成型领导倾向于通过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维持现行国际地位,进取型领导会通过政治改革和扩大国际支持提高本国国际地位,争斗型领导采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权力。领导类型和战略偏好的对应关系带来推论2: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原则都是自保,但采取的外交战略是不同的。

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

由于各国实力增长不均衡,崛起国的成功将带来国际领导国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再分配。 新的国际领导国将改革现有的国际规范,以便长久维持其领导地位。 从这一机制可以得到推论3:追求自身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也 是制定国际规范背后的压力。如果新的国际领导与前国际领导的类型相同,新领导国将完全按照它们与前领导国的共同价值观来改革国际规范的内容,否则它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改革规范,换言之,建立新型规范。

一般来说,领导国通过三个机制建立新国际规范:榜样-效仿机制、支持-强化机制和惩罚-维护机制。支持-强化机制是指对遵守主导国倡导的行为原则的国家给予奖励,而惩罚-维护机制是指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国家施以惩罚。这两个机制能起作用靠的是领导国的这些政策能使其他国家获得或失去利益。与这两个机制不同,榜样-效仿机制是一个使其他国家自愿效仿主导国的行为原则的机制,因为它们相信遵守该原则将有助于它们变得像主导国那样繁荣。这三个机制可以用于改革国际规范的类型和内容。

根据战略信誉和政策一致性这两个变量,国际领导可分为4种类型: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王道型领导或霸权型领导比昏庸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的战略信誉好得多,而王道型领导或强权型领导比霸权型领导或昏庸型领导的政策一致性强。与国际领导类型相对应,王道型领导倡导道义规范,霸权型领导实行双重标准规范,昏庸型领导奉行恃强凌弱规范,强权型领导遵循强权政治规范。如果新的国际领导类型不同于原来的国际领导类型,它便会建立一种新型国际规范,以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国际领导类型并不必然会变得更好,国际规范类型的变化方向也是随机的,而未必线性地从强权政治规范向道义规范变化。

由于王道型领导是根据道义原则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因此其行为有助于建立好于其他三种类型领导的战略信誉。随着战略信誉的提高,王道型领导能树立起良好的权威,获得更大的国际权力。权力和权威都是影响力的构成要素,但作为领导的资源,它们的功能不同。前者靠强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后者则依赖其他国家对领导国的

信任自愿遵循领导国的理念。因此,道义规范比其他规范能更有效、 更持久地维护领导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双重标准规范在维护一国国际 领导地位方面不如道义规范有效,但比恃强凌弱规范和强权政治规范 有效。然而,领导国的道义在维护国际秩序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 其强大的国家实力。也就是说,弱国的道义行为对国际规范类型的影响非常有限。

构成要素变化与体系转型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主导国都无法避免衰落或被崛起 国取代。国际领导的变化意味着大国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但主要是崛 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从它们之间的竞争可得出推论4:权 力的零和性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影响现行国际 秩序。无论是结构秩序还是规范秩序的变化,都会导致崛起国与主导 国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体系的不稳定。结构秩序通常受大国间权力 再分配的影响,而规范秩序则受国际规范性质变化的影响。崛起国与 主导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只限于物质利益领域,也发生在非物质利益领 域。当崛起国和主导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时,它们还会进行竞争,力图 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变成全球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对抗往往比单纯 的物质利益竞争更为激烈。

由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权力再分配往往会破坏国际秩序,但并不必然导致体系转型。虽然国际规范既是国际秩序也是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但规范只界定秩序或体系的具体特点,并不使它们成为同一事物。国际秩序是指国际体系所处的状态,主要是指体系内的国际行为体是否和平地解决它们的冲突,而国际体系是指由按规范互动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一个复合的社会。在行为体、格局和规范这三个体系构成要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体系的秩序可以被破坏,也可以得到恢复。因此,战争经常破坏一个国际体系的秩

序,但是这种国际秩序在体系不变的情况下仍可得到恢复。崛起国的成功往往导致权力再分配和秩序变化,但导致体系转型的较少。

当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一个伴随着国际权力再分配而变化时,不会发生整个体系的转型。体系转型是指复合体的类型变化,即体系变化,而不只是体系某一方面的变化。因此,体系转型需要三个构成要素中的至少两个发生类型变化。历史上,国家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如城邦、王朝、君主国、帝国和民族国家。每种国家形态都曾持续多个世纪。由于行为体类型变化所需的时间长于格局类型和规范类型变化所需的时间,体系转型经常伴随的是规范类型和格局类型的变化,而不是行为体类型加上另一个要素类型的变化。

国际权力再分配不同于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转移。前者是指某一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权从一国或一个集团转向另一国或另一个集团,后者是指战略竞争者的所在地以及战略竞争地区的地理位置的转变。如果崛起国和主导国分别位于不同的大陆板块,权力从后者向前者转移才会产生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否则不会。如果两个大陆板块的文明不同,领导权的转换经常伴随着文明冲突,这种文明冲突会掩盖崛起国与主导国权力竞争的本质。

新的两极世界

所有科学的理论都具有预测功能,反过来说,能够用来预测的理论应该是科学的理论。基于本书提出的理论,这一节将对未来10年国际政治的变化进行预测,这期间中国的崛起将引起国际政治的权力再分配。所有科学的预测都必须有明确的时间期限,否则它们是不可验证的。为了将来可以对预测进行检验,下面所做的预测期限为10年,即2019—2028年。

没有全球领导的两极化

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使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在未来10年内转变为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两极格局。与特朗普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实施改革计划的能力较强,或较少倒退。这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即在特朗普任期内中美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即使美国政府在2021年换个新领导,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持续下去,因为恢复国家实力通常需要比削弱它花费更长的时间。除了中国的崛起,形成两极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他大国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家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目前,没有哪个大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的1/4或中国的1/2。即使这些国家有幸在未来10年中出现比中国和美国更有改革能力的国家领导人,它们也没有机会在这10年内把国家实力提高到中国的水平,更不用说到美国的水平了。实际上,历史概率表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改革能力很可能与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相同,甚至不及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

目前的两极化将推动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东亚。在一个两极世界里,世界中心的位置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该地区是两个领导国之间

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而且一个领导国的地理位置在该区域。未来10年,将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多于在其他任何地区,包括欧洲。中国若不能成为东亚的主导国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同样地,美国如果失去在该地区的主导影响力,就无法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未来10年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将集中于东亚而非任何其他地区。因此,在未来10年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新的两极格局将使较小国家根据具体问题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 边,这与冷战期间它们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选边的动机不同。在全球化 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相互交织的关系,这使遏制战略失效。 由于遏制战略没有效力,美国不再有全面援助盟友的动机。与此同 时,中国出于避免卷入战争的考虑,也不太愿意向其支持者提供全面 援助。针对这两个大国对其支持者的政策,作为回应,小国在中美竞 争中采取的策略不同于在冷战时期针对美苏竞争的战略。它们不会在 每个问题上都站在同一个超级大国一边,而是根据与二者中哪个享有 共同的具体利益来选边。一些东盟国家已经对中国和美国采取了双轨 战略,在经济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而在安全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 这种平衡战略可能会在未来两极世界的小国中流行起来。

在未来10年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担当全球领导。作为全球领导的国家需要为小国提供单独或集体的安全保护。中国在未来10年内甚至更不可能放弃不结盟原则,这意味着中国不会为任何国家包括其邻国提供安全保护。虽然美国有50多个盟友,但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保护它们的全部责任。同时,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两国不能为世界提供所谓的"两超"或"中美"联合的共同领导。当美国和中国不能单独或联手担当全球领导时,我们无法期望任何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担当世界领导的能力。没有全球领导,全球治理将不可避免地停滞。因此,未来10年,

在气候变化、反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等问题上的合作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较小。

秩序不稳定却不会发生冷战

未来10年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极小。核武器有效防止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也将在中美战略对抗中发挥同样的作用。自1989年以来,中国从未卷入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美国也没有打破冷战以来不与核国家发生直接战争的纪录。自朝鲜核武器问题首次出现以来,美国政府甚至一直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该问题。这些事实表明,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勇气与对方展开直接战争。

在未来10年内,中美之间甚至连代理人战争都不太可能发生。与俄罗斯的战略偏好不同,中国并不注重代理人战争在其崛起中的作用。相反,中国将经济视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更倾向于通过经济途径扩大国际影响,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中国战略偏好的重点是经济影响,因此在未来10年内中国不太可能卷入与美国的代理人战争,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形成鲜明对比。

中美之间无战事可能意味着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也没有它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但这并不能确保未来10年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远离领导国的地区,当地区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领导国不愿卷入它们之间的安全争端便给地区大国带来优势。因此,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时,地区大国更喜欢军事解决而不是外交谈判,如俄罗斯、法国、印度、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尼日利亚、刚果和埃及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使不及美国领导,也远比中国政府更愿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

因此,下一个10年将有可能见证中东、欧亚大陆、南亚和非洲的安全 冲突加剧。

中美两极化可能会加剧未来10年的国际分化,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大公司能够比普通公司更有效地分配全球资源,因此,大公司多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有机会迅速增加其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份额。中国和美国的大公司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有132家美国企业、115家中国企业。 注 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家实力的分化将降低其他国家对领导国支持的重要性。因此,中美两国将更加愿意通过自己的实力而非战略伙伴的集体努力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国际实力的分化将促进政治上的单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

由于中美两国总体上能靠自己的实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未来10年里,这两个国家会更倾向于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这将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效仿的榜样。在安全领域,建立多边联盟是领导国在战略竞争中采取的传统战略。然而,中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没有采纳这一战略。特朗普政府比小布什政府更热衷于单边主义战略,这种做法使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年削弱了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而中国政府则全面拒绝结盟理念。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通过分别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双边谈判以《美墨加三国协议》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中国也未能实现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由于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冲突。只要中美主要以双边外交而非多边外交方式处理冲突,全球多边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减弱。其结果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未来10年中要在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只要中国在未来10年继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中美之间 的经济竞争就会加剧。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这是 他的继任者可能会持续的战略优先选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基于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可能在近期得到永久解决,而且或许会持续10年。中美在贸易摩擦中采取的战略不仅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新趋势,而且暗示着经济制裁可能成为各国在各个领域对抗的普遍手段。因此,这种战略的优势将诱使中国和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是其他大国在与弱于自己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可能照例采取的策略。因此,下一个10年可能会见证一个较不稳定的国际秩序。

尽管国际秩序不太稳定,但整个国际体系在未来10年可能保持不变。虽然目前的两极化可能会使国际秩序发生骚动,并且很可能在未来10年内形成两极世界,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难以在这一时期内建立新型国际规范,更不用说将民族国家转变为新型国际行为体了。因此,雅尔塔体系有可能在今后10年中继续下去,不会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就像冷战时期直至冷战后时期一样。

缺乏主流价值观与战略信誉

在未来10年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建立一套新的主流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来指导国际社会。自由主义与反建制主义之间的竞争使美国无法恢复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也不能建立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价值观。中国政府也不能向国外推行一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观,除非它在国内建立起一种政府和民众都认同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同时,目前的两极化意味着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都没有比美国或中国更大的能力建立新的全球性价值观。因此,在未来10年内,世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时代。

全球主流价值观的空位,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区域统治或对某种 类型国家施加影响留下了真空。由于中美两国都知道意识形态对抗很

容易升级为冷战,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出现如冷战期间那样两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的战略竞争。只要中国谨慎地避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美国就不能使模式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相反,世界可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看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万花筒般的竞争。中东可能被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竞争蹂躏;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可能在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中遭受挫伤;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陷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冲突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蒙受国家主义和公民主义的斗争之苦;共产主义国家可能面临共产主义与经济实用主义的争执;神权国家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可能会经历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

最近在大国流行的个人决策的做法将在未来10年使战略信誉贬值 并增加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机制在做出决定之前不进行制 度可行性研究,因此往往导致激进和感性的决策,包括关于政策调整 的决策。如果左右摇摆的政策调整频繁发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外 交政策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大国的个人决策机制可能在未来 10年继续存在,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往往 会压倒国家利益,包括战略信誉。因为领导者的个人利益是易变的, 所以由个人利益驱动的政策将不可预测。由于大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 盛行,猜疑和相互不信任可能成为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伴随着这 种情况,大国之间可能缺乏合作,而倾向于使用对抗战略来处理争 端。2018年年初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俄罗斯和美英法联盟在叙利亚 的军事对峙,可以说明这一趋势。

当领导国缺乏战略信誉时,多数国家可能会像冷战时期一样重视自己的主权,而且在未来10年中,各国的全球治理意识可能会减弱。全球治理是指国际责任的分配,以便减少对每个国家的共同威胁。如果领导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较小国家将对实现这一目标更有信心,从而愿意参与其中,否则它们将失去兴趣,因为全球治理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在即将到来的两极世界中,中国和美国

都不能担当全球领导,也不愿意负起全球治理的领导责任。由于中美都不能提高小国对中美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信心,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宁愿靠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事实上,国家主权是目前民族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可靠手段,因此它们可能极其重视主权,以至拒绝参与以主权为代价的全球治理。英国脱欧就是一个例证,表明英国更信任其主权而非与欧盟的合作。此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可能导致未来10年在气候控制方面没有国际合作。

在未来10年里,虽然由于没有全球领导,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将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可能不变,因此雅尔塔体系的霸权性质将相应地延续下去。特朗普政府接连从多个国际机构退出,这的确削弱了这些机构维护国际秩序的效率,但其他大国不会效仿美国的做法。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确信留在一个国际机构中会伤害本国利益时才会撤出该机构,而不会只因为不受益便退出。这意味着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未来10年将留在目前的国际机构中,因为这样并无损失。因此,即便美国退出国际机构,甚至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未来10年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范的类型也不会改变。

本书认为,政治领导在国际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不主张全球问题可以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不会超越人类的基本性质。世界政治的特点仍然是,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争斗。虽然全球化将地球变小,使世界事务的集中管理具备了可能性,但人类尚未建立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国际机构。当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艘漏水的船上而这艘船又没有自动操作系统时,其中一国应为整艘船的安全提供领导。如果领导国不领导,其他国家不能跟随,那么这艘世界之船就会迷失方向。笔者的理论主张以王道型领导来改善世界,因为这种类型的领导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好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的领导。即使这种类型的领导不能确

保建设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但笔者仍然相信它将提供最佳机会让世界 比今天更和平。

1.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财富中国》, 2017年7月20日, 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7-07/20/content_286785.htm。

参考文献

安国政、郭崇立、杨振武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比赛谁的核按钮大,世界本不该这样》,《环球时报》,2018年 1 月 4 日 ,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1/11495595.html。

《传承友谊是中朝共同受益的大战略》,《环球时报》,2018年3月 28 日 , 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3/11704002.html。

崔高维校点: 《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戴德:《大戴礼记·用兵》,见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5—237页。

俄罗斯战略形势评估课题组:《俄罗斯强势崛起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第19—24页。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事出

版社,2006年,第3-22页。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

侯露露:《发展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人民日报》 2018年2月2日,第3版。

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李维琦:《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1988年。

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11期,第36—38页。

林品石: 《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出版社,2005年。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刘鸣、黄仁伟、顾永兴:《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25页。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漆海霞:《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组:《国语》,上海国际出版社,1978 年。

盛广智注译:《管子译注》, 吉林文献历史出版社, 1998年。

石永之:《内圣外王新诠》,《周易研究》2015年第5期,第88—89页。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覃贻花:《王岐山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四川新闻 网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 http://news.ifeng.com/a/20171019/52708819_0.shtml。

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7—36页,第155页。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信出版社,2012年。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王常则译注:《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王红续:《新中国的外交价值取向与战略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9—16页。

王明修、肖扬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89—1990)》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王明修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91—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871—1918)》,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5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17—1929)》,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5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5年。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5年。

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 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吴兢:《贞观政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2017年

12月1日。

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译:《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 社,1995年。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 第1期,第1—32页。

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54—55页。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姚天冲、于天英: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刍议》, 《社会 科 学 辑 刊 》 2011 年 第 1 期 , http://wenku.baidu.com/view/75135a8dd0d233d4b14e6989.html。

叶自成:《春秋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

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2—38页。

赵丕:《关于新军事变革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战略研究》 2013年第2期,第9—19页。 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朱峰:《俄格冲突的国际政治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 第11期,第6—1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网,2018年3月22日。

Allison, Graham.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7, 80-89.

Al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Amstutz, Mark R. *International Ethics: Concepts, Theories, and Cases in Global Politics*. 2nd e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Appelbaum, Yoni. "Is the American Idea Doomed?" Atlantic,
November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11/is-the-american-ideaover/540651/.

Baker, Peter. "Souring World Views of Trump Open Doors for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8. http://www.wral.com/souring-world-viewsof-trump-open-doors-for-china-and-russia/17268302/.

Beckley, Michael.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no. 4 (Spring 2015):7-48.

Bergsten, C. Fred.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asia/2008-06-01/partnership-equals.

Börzel, Tanja A.,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Coming Together or Drifting Apart? The EU's Political Integration Capacity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4, no. 2 (2017): 278-96.

Brostrom, Jannika. "Moral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ward a 'Moral Realist' Research Agend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8, no. 4 (2015):1624-39.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 Beij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Castles, William R.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Affairs 95, no. 1 (1932): 47-49.

Choi, Seung-Whan, and Patrick James. "Are US Foreign Policy Tools Effective in Proving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3 (Autumn 2017): 331-56.

Clough, Shepard B.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Cooley, Charles Hort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 2009.

Cope, Edward Meredith. An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s Rhetoric: With Analysis Notes and Appendices. London: Macmillan, 1867.

Cosmo, Nicola Di.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e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Maximes et Reflexions Diverses*, ed. Jean Lafond, 2nd ed. Paris: Gallimard, 1976.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Longman, 2001.

Fang Xiangming and Phaedra S. Corso. "Child Maltreatment, Youth Violenc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ative Medicine* 33, no. 4 (2007): 281-90.

Ferguson, Niall. "Not Two Countries, but One: Chimerica." *Telegraph*, March 4. https://www.telegraph.co.uk/comment/personal-view/3638174/Not-twocountries-but-one-Chimerica.html.

Finnemore, Martha.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153-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s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887-917.

Fiorina, Morris, and Kenneth Shepsle. "Form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In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ed. Bryan D. Jones, 17-40.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9.

Fitzgerald, Sandy. "North Korea Media Mocks Pence for Not Interacting with Delegation." Newsmax, February 17, 2018. https://www.newsmax.com/newsfront/north-korea-vice-president-mike-pence-olympics-kim-yojong/2018/02/17/id/843971/.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3-18. George, Steve, and Anish Gawande. "China and India in War of Words over Bhutan Border Dispute." CNN, August 25,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7/03/asia/bhutan-india-border-dispute/index.html.

Gilpin, Robert.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O. Keohane, 301-2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Goh, Evelyn.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Goldgeier, James M. "The U.S. Decision to Enlarge NATO: How, When, Why, and What Next." *Brookings Review* 17, no. 3 (1999): 18-21.

Gordon, Philip. "A Vision of Trump at War: How the President Could Stumble into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2017): 10-19.

Graham, Jesse, Jonathan Haidt, Sena Koleva, Matt Motyl, Ravi Lyer, Sean P. Wojcik, and Peter H. Ditto.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2012): 55130. http://ssrn.com/abstract=2184440.

Gurowitz, Amy. "Mobiliz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Actors, Immigrants, and the Japanese State." World Politics 51, no. 3 (1999): 413-45.

Haas, Mark L. and David W. Lesch, "Uprising in the Arab World: Tyranny, Anarchy, and (Perhaps) Democracy." In *The Arab Spring: The Hope and Reality of the Uprisings*, ed. Mark L. Haas and David W. Lesch. Boulder, CO: Westview. 2017.

Hamilton, Alexander,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eds.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Harris, Peter. "China in British Politics: Western Unexcept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0, no. 3 (Autumn2017): 241-67.

Hermann, Margaret G., and Joe D. Hagan.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Leadership Matter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ecial ed. (Spring 1998):110-28.

Hoffmann, Stanley.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tate of War—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 StanleyHoffmann, 88-122. New York: Praeger, 1965.

Hogeveen, Jeremy, Sukhvinder S. Obhi, and Michael Inzlicht. "Power Changes How the Brain Responds to Oth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 no. 2 (2014): 755-62.

Holsti, Kalevi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

Ikenberry, G. Joh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2017): 1-7.

Ikenberry, G. John,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 3 (1990): 283-315.

Jackson, Robert H., and Carl G. Rosberg. *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Prince, Autocrat, Prophet, Ty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2nd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Jepperson, R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 Peter J. Katzenstein, 33-7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agan, Donald. Pericles of Athens: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Kagan, Robert.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no. 111 (Summer 1998):24-35.

Kagan, Robert.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Kang, David.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Kazianis, Harry J. "The North Korea-China Summit: Did Kim Ask Xi for Help with His Trump Meeting? Here's What May Have Happened." Foxnews, March 28,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3/28/north-koreachina-summit-did-kim-ask-xi-for-help-with-his-trump-meeting-here-s-whatmay-have-happened.html.

Kegley, Charles W., and Gregory Raymond. "Networks of Intrigue? Realpolitik,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Reconstructing Realpolitik*, ed. Frank Whelon Wayman and Paul Francis Diehl, 185-9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Keltner, Dacher, Cameron Anderson, and Deborah H. Gruenfeld.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no. 2 (2003): 265-84.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ohane, Nannerl O. *Thinking about Leader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Khong, Yuen Fo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no. 1 (Spring 2013): 1-48.

Kitschelt, Herber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1, no. 4 (1995): 447-72.

Krabbe, Hugo. Jindai Guojia Guannian [Modern concepts of the state]. Trans. Wang Jian. Beijing: Commercial, 1957.

Krasner, D. Stephen.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Krasner, D. Stephen.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Stephen Krasner, 1-2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1994):62-78.

Kuan, Eric Koo Peng. "The US as Benevolent Hegemon." Asia Times, September 23, 2004. 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I23Aa01.html.

Lake, David A.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Layman, C. Stephen. "God and the Moral Order." Faith and Philosophy 19, no. 3(2002): 304-16.

Lebow, Richard Ned.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Leonard, Mark.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Mackinder, Halford John.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42.

Mahbubani, Kishore. "How Strongmen Coopted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13/opinion/strongman-world-democracy.html?mcubz =0& r =1.

McDonald, Joe. "China Retaliates against Proposed US Tariffs by Targeting \$50B in American Soybeans, Other Goods." NBCDFW.com, April 4, 2018. https://www.nbcdfw.com/news/national-international/China-Vows-Same-StrengthMeasures-Against-US-Tariffs-478730033.html.

Mearsheimer, John J.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1994/1995): 5-49.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update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Mettler, Suzanne. "Democracy on the Brink: Protecting the Republic in Trump's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May/June 2017): 121-26.

Modelski, George,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 Manus I.

Midlarsky, 23-54.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Monterio, Nuno P.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ed. Kenneth W. Thompson and W. David Clinton, 7th ed.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5.

Mundell, Robert A., and Alexander K. Swoboda, eds.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Murray, Williamson,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sbitt, Francis Njubi. *Race for Sanctions: African Americans against Apartheid*, 1946-199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Niebuhr, Reinhold.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2.

Niebuhr, Reinhold.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Human Natur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6.

"North Korea Canceled Planned Meeting with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elegraph*, February 21, 2018.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8/02/21/north-korea-canceled-planned-meeting-us-vice-president-mike/.

Nye, Joseph S.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York: Basic Books, 1990.

Nye, Joseph S.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Nye, Joseph S. *The Power to L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Organski, A.F.K.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Owen, David, and Jonathan Davidson. "Hubris Syndrome: An Acquired Personality Disorder? A Study of US Presidents and UK Prime Ministers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Brain: A Journal of Neurology*, February 12, 2009, 1-11.

Paulson, Steve, et al., "The Moral Animal: Virtue, Vice, and Human Natur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39-56.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nyas.13067 /epdf.

Peck, Jamie. "Remaking Laissez-Fai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 no.1(2008): 3-43.

Przeworski, Adam, and Fernanda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 (1997): 155-83.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id, Susan E. "Who Will Beat Whom? Soviet Popular Recep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9, no. 4 (2008): 885-904.

Reus-Smit, Christia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no. 4 (Fall 2017): 851-85.

Roemer, John 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se, Gide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no. 1 (1998): 144-72.

Ross, Robert S., and Øystein Tunsjø. "U.S.-China Relations: From Unipolar Hedging toward Bipolar Balancing." In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and Politics in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Russian Tankers Have Smuggled Oil to North Korea, a Breach of U.N. Sanctions." NBC News, December 30, 2017.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 /russian-tankers-have-smuggled-oil-north-korea-breach-u-n-n833531.

Schelling, Thomas C.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chlesinger, Arthur M.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1933-1935,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3.

Scoll, Christopher. "N Korean Media Coverage of Kim's Trip to Beijing, in English." *Asia Times*, March 31. http://www.atimes.com/article/n-koreanmedia-coverage-kims-trip-beijing-english/.

Smith, Graham, and Corinne Wales. "Citizens' Jurie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8 (2000): 51-65.

Snyder, Richard C.,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ed.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rev. ed., 21-15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Soederberg, Susanne. "From Neoliberalism to Social Liberalism: Situating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 within Mexico's Passive Revol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8, no. 3 (2008): 104-23.

Stavrianos, Lefton 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PrenticeHall, 1966.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p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Sun Xuefeng. "Rethink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and China's Ris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no. 1 (2013): 9-30.

Swan, Jonathan. "How Trumpworld Is Winging a Trade War." *Axios*, April 9, 2018. https://www.axios.com/winging-a-trade-war-donald-trump-d5a36398-22e84428-8a53-54095e0 4d759. html.

Tanay, Efe. "What's behind Turkey's Sudden Rapprochement with Russia?" Russia Direct, August 10, 2016. http://www.russia-direct.org/opinion/whats-behindturkeys-sudden-rapprochement-russia.

Tunsjø, Øystein. *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Walt, Stephen M.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June 26,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83.

Wang Yi. "Exploring the Path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 10 (Autumn 2013): 10-23.

Wattles, Jackie, and Jethro Mullen. "Trump Threatens China with New \$100 Billion Tariff Plan." CNNMoney, April 6, 2018. http://money.cnn.com/2018/04/05/news/trump-tariff-china-trade-war/index.html.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77-1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Weber, Max.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1043812.pdf.

Wike, Richard, et al. *U.S. Image Suffers as Publics around World Question Trump's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6, 2017.

Wohlforth, William. "Unipolar Stability: The Rules of Power Analysi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2007, 44-48.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no. 2 (Summer 2014): 153-84.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no. 3 (Autumn 2010): 263-92.

Yan Xueto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2011): 233-64.

Yan Xuetong. "The Shift of the World Cent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0, no. 4 (2013):217-35.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2 (2012): 105-27.

Yarhi-Milo, Keren. "After Credibil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68-69.

Yazdani, Payman. "Prof. Baker: US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pportunity for China, Iran." MEHR News Agency, October 25, 2017. https://en.mehrnews.com/news/128939/US-withdrawal-from-intl-treatiesopportunity-for-China-Iran.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no. 1 (Spring 2013): 1-47.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Zhang Fe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1(2012): 73-103.